

S. C. VAN,
Ordrup Jagtvej 54
Hattenlund,
Denmark



Ligger godt i maven...

春卷的童话

——大龙创立者范岁久传

[丹麦]迪特列夫·塔姆○著
艾晰 肖卫华 京不特 译

DALOON



序

前言

第一章 | 中国 |

士农工商.....	003
中国的新生.....	005
末代皇帝.....	009
社会变革大潮中的袁仲符.....	009
绅商——中国的新精英阶层.....	013
范岁久的童年.....	014
摩登上海.....	018
丹麦模式.....	023

第二章 | 丹麦 |

到达丹麦.....	029
范岁久眼中的丹麦.....	030
国际民校.....	034
负笈求学.....	035
阿科瑟尔·欧伦森.....	037
《沿着中国的蓝色大河》.....	039
中华故国.....	040
阿斯蔻夫民校.....	043
丹麦和中国.....	047

父与子	050
中国的战争	054
农业大学	059
证书学生	064
伊丽莎白·纪兰德-布兰德	065
丹麦还是中国?	068
家庭生活	072
中国的命运	075

第三章 | 大龙 |

竹园餐馆	083
创业者	084
“范的产品”——春卷	089
创立大龙	093
纽堡的新工厂	095
重回故土	099
大龙的危机	102
一次访谈	108
范岁久基金会	109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龙	110
大龙精神	118
资料文献	122
附录一	123
附录二	124

拿到介绍范老生平的《春卷的童话》一书，高兴之余，不禁浮想联翩，范老的音容笑貌，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在一九六四年，当我刚刚高中毕业，便作为留学生来到丹麦，就读于哥本哈根大学，学习丹麦文。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每天骑着上海产凤凰牌自行车到市中心的圣母广场旁的教室上课，中午到学生食堂午餐。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金黄色的炸春卷。丹麦的同学告诉我，这是一位姓范的中国人生产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范老先生的大名。当时在哥本哈根生活的华人和华侨，总计不超过一百人。但范先生的名字在当地已小有名气了，他是华人的代表性人物。我心中不禁油然生起敬佩之情，希望早日能与范先生见上一面。

结束了在丹麦的学习后，我成为了一名中国外交官，曾多次到丹麦工作，并有机会多次见到范老先生。二〇〇二年八月，我出任中国驻丹麦王国大使后不久，便专程到纽堡大龙公司拜访范老先生。此时，他已到耄耋之年，但却精神矍铄，步履轻盈。他亲自开车到工厂迎接我和同事，楼上楼下地带我们参观各个车间，如数家珍地向我们介绍工厂的历史和发展。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促膝长谈，谈留学丹麦的经历、创业的艰辛、华人华侨融入当地社会的体会、丹麦的变化和中国的发展。他那炯然有神而慈祥的目光，艰苦创业的乐观精神，无不透露出他对学习、生活、创业和人生道路上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的欣喜和自豪的心情，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还有那乐于助人的高尚品德。这些都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范老虽不是最早来丹麦访问、逗留或定居的中国人，但范老是第一个来丹麦留学的人，是第一位在丹麦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丹麦高等学府的中国学者，也是第一位在丹麦成功创业的华人。范老不仅是我们一代又一代留学生的老前辈，更是我们的学习榜样。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受人欺凌。二十多岁的范先

生怀着父辈的嘱托和求知的欲望，以及一颗改变中国任人欺辱面貌的赤子之心来到丹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国外学习、获取知识，就如同上战场一样，为拯救处于危难之中的国家一样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范先生未能回国孝敬父母、继承家业、为国服务。但是他刻苦学习，以惊人的毅力、谦和的人品、严谨的作风、高超的技艺、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还有那孝敬父母、尊重同辈、关爱和提携后代之心，赢得了丹麦同学的尊敬与支持，长辈的同情与关爱，从而为他融入丹麦社会，创造令人尊崇的业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从大学时代开始走进丹麦社会，一瓶酱油是他的创业新起点，生产春卷是他步入成功之路的开端，而成为丹麦千强企业的大龙公司则是他事业的高峰。

事业有成的范老先生从未忘记他的祖国，也未忘记使他成功的丹麦，更未忘记给他带来一生幸福的丹麦同学、朋友和家人。成功的他在一生中资助、支持了许许多多的丹麦友人、华人社团和中国留学生，陈列在丹麦华人总会的范老先生铜像，面带长者的慈善笑容，迎接着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华侨、华人和丹麦朋友。在他们的心中，范老先生是人们学习的榜样、令人尊敬的父辈、可信任的同事和伙伴。范老先生在中丹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长河中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也永远留在了奔走在龙的中国与安徒生的丹麦之间的人们的心中。

曾经在哥本哈根大学学习的原中国驻丹麦大使

甄建国

二〇一二年五月

|前言|

范岁久于一九三五年来到丹麦，之后创立了众所周知的大龙食品厂。这家食品厂生产的中国春卷在丹麦全国范围内销售，为丹麦人的饮食传统注入了新鲜的元素。一九九六年，一条大龙电视广告短片使得范岁久在丹麦尤其知名。当他在短片中说到春卷吃起来“佳肴置腹”时，作为商标的一条红色的龙腾飞而出，发出“大……龙……”的声音。于是，“佳肴置腹”和“大龙”在一定时期内成了丹麦语中的固定用语。

范岁久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拥有大龙食品公司的多数股份，其宗旨是推广宣传大龙品牌。同时，基金会为在丹麦留学的中国人提供资助，并支持丹中文化交流。多年来，该基金会为数百名中国青年提供了在丹麦学习的机会。基金会原名“大龙基金会”，自范岁久二〇〇三年去世之后，更名为“范岁久基金会”（S.C. Van基金会），以纪念其创立者。

一直以来基金会都希望出版一本范岁久的传记。范岁久曾经接受过许多采访，在一些有关大龙的书籍中也能找到他对自己生活点滴的叙述。但是，这些材料并不能组成一部完整的记录，去追踪他从中国到丹麦的足迹，呈现他在丹麦的生活。范岁久为人谦逊，对为自己写传记这个提议并没有全力支持。时至今日，我们才终于得以实现这一计划。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里，他协助了传记的写作，但他对于自己童年的回忆已经模糊，他也不曾留下真正的个人档案。因此，要重现他的早年生活并非易事。

我们找到了范岁久与他父亲的通信以及家人的一系列回忆材料，将之用于传记的写作。这些资料极大地帮助了我们去勾勒范岁久在中国的生活，并以此为背景去理解他在丹麦的工作。特丽娜·林登硕士（cand.mag. Trine Lindén）依据一些书面材料撰写出这部传记的初稿，之后，迪特列夫·塔姆完成了本书的写作。塔姆是范岁久基金会的资深成员，与范本人相识多年，在本书中他向我们全面展示了范的一生。范岁久的女儿丽生·斯德哥尔摩·彦森任部门助产士长，同时也是基金会主席，她为这本书的完成做出了孜孜不倦的努力，她协助搜集了许多相

关材料，例如，父亲的家族背景以及在丹麦的生活记录。京不特先生翻译出中文初稿，艾晰女士和肖卫华女士完成了中文译本，并做了校对、注释和图片编辑等工作。基金会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范岁久基金会希望这位移民创业者的生平事迹不仅能获得那些熟悉他的人们的关注，还可以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范岁久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人性本善，自觉向榜样学习，并肩负着对他人的责任和义务。在一生之中，他一直感到一种极大的责任。当年他来到丹麦是为了尽可能全面地学习丹麦现代农学，以期能够为改革中国的农村生活作出贡献。然而事易时移，他最终成为了一位丹麦企业的领导人，对数百名员工负有责任。在一生之中，他一直保持着对故土的炽热情感，通过基金会，他帮助了数以百计的中国年轻人，使他们能够像自己一样在丹麦接受教育。他的人生哲学是：有所得就要有所回馈。

中国人喜欢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范岁久也是如此。他很喜欢阅读这位伟大丹麦作家的作品。得益于非常好的中文翻译，除了《卖火柴的小女孩》这篇经典故事以外，中国人也能够读到安徒生的其他童话故事。不过，安徒生笔下那则有关中国的《夜莺》事实上却并不为中国人所关注，因为这篇童话中的描写不太符合中国人眼中皇帝的形象。相较而言，那些在困境中出奇制胜的故事则备受欢迎，与大克劳斯作对的小克劳斯、笨汉汉斯和其他以机智取胜的人物形象和中国人的生活智慧相呼应。范岁久的生平故事虽然不是安徒生童话，但却有着童话的元素：他来自中国，却成为了丹麦人，并且在丹麦成功建立了一家大型企业。这样的人生与他睿智的父亲对他未来轨迹的设计大相径庭。出于机缘巧合，他的企业正好坐落在安徒生故乡的海岛上。但他的成功却不能说是偶然，作为一个外国人，范岁久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要在丹麦广交朋友，要坚定意志学会丹麦语并完成学业，要发挥才能和创造力把自己的产品做成品牌。范岁久初到丹麦时，白手起家，许多事情的发生发展常常出人意料，但每一次他都能面对和接受挑战。

范岁久基金会希望借本书来表达对基金会的创立者范岁久先生的感激之情。

范岁久眼中的丹麦并不是一个顾影自怜的小国，相反，这是一个农业发达、和平兴旺的民主国家。丹麦虽然成为了范岁久的第二故乡，但范岁久曾是并且一直是中国人。如果说有一些人利人、利己、利国，那么，范岁久就是其中一员。

范岁久基金会理事会：

丽生·斯德哥尔摩·彦森 (Lissen Stokholm Jensen)

卡尔·君特-彼特森 (Carl Günther-Petersen)

汉斯·纽兰德斯特德 (Hans Nylandsted)

迪特列夫·塔姆 (Ditlev Tamm)

第一章 中国





民国初年的上海

士农工商

“……人各不同，人的德性、品质、才能是无法平齐的。企业家的责任与政治家相似。政治家要保卫国家的安全，使人民安居乐业，给大家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无论农民、工人、工商企业家、知识分子皆能安心发展，各施所长，贡献出各自的才能，从而服务社会与国家。企业家身负众多人的生计与就业责任。办企业有莫大的风险，办不成功会一无所有，办得好则对国家有缴税或外汇之贡献，对股东有盈利分红之职责，对员工及其家属有给予福利与薪金之责任。现代的企业要求员工尽职尽责，紧密合作。”

范岁久的表弟斯颂实用这些话概括出了商业的意义。范岁久曾收集家族回忆编成一本书，用以纪念父亲袁仲符。这段话正是出自此书。我们援引此语是因为它简明地概括出了中国人对社会各行各业之间关系的基本理解。人不是只为自己而活着的孤立个体，每一个企业都是社会的一部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个社会的贡献。每个个体都是一个更大的整体中的一部分，他们在宇宙中、社会中以及家庭里都承担着义务。这是一种生活观，范岁久就是在这种生活观中长大成人的。

在中国传统中，从事不同行业的人主要分为四类。博学之人被称作“士”，耕地种田的人被称作“农”，手工艺者叫“工”，做生意的人叫“商”。尽管这种分类很难在中国古典哲学家孔子和孟子的学说中找到踪迹，但它也许可以说是延续千年的中国社会观的基本组成部分。对于中国人来说，代表军事的“武”并没能成为一个行业类别，这一点很说明问题。儒家传统认为，文明的社会应当通过道德楷模的模范作用来实现，而非通过暴力，所以武力在主流思想中并没有太高的地位。诚然，武力是存在的，中国历史也是一部战争史，但中国的“文人”——文学家或者哲学家们——不愿意给予它一个特定的名分从而使武力合理化。

中文的“人”字有着深刻的含义，作为一个人，做出真正的人的行为，这在传统哲学里是最高的美德。本书的主人公范岁久也许首先是一个“土”，一个想要学习探究事物之渊源格理的人；然后，他研究农学，并因此接触了“农”；再后来，他用自己的双手制造了一个产品，在某种意义上也有着“工人”的特点；最后，他创立了一家大企业，尽管他自认为没有“商”的才干和运作生意的能力，宁可让别人去做，但他仍是一个“商人”，运作企业成为了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范岁久绝对不是一个军人，他身上没有任何“武”的成分，倒是有很多文人学士的特质。范集“土、农、工、商”四种社会角色于一身，这也可能是他成功的原因。完美融合这四种社会角色正是中国人的传统理想。

一九一二年底，范岁久在中国出生，九十年后他在丹麦去世。他本来计划在丹麦短期学习后回国，但却成为来到这个国家的第一代中国移民。他的故事真实展现了一位移民成功创业的经历。速冻春卷不仅在丹麦人所皆知，而且成为国际市场中的成功产品。他的企业名叫“大龙”，这个名称源于中国文化，表达了他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中国有十二生肖，它们对应着十二地支，龙位列第五，是皇家的标志。龙强大、诚实、敏感，无论石刻瓦雕还是作为商标，龙的形象都很富贵庄严。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政治家周恩来对于“如何看待法国革命的意义”这一问题是这样回答的：现在评价这场革命还为时过早。在中国人看来，他的回答很有道理。周恩来参与推进的共产主义革命，虽然于一九四九年取得了胜利，但当时的中国正经历着急剧的变化。今天，中国仍然是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自邓小平于一九八四年推行新的经济方针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范岁久出生的那一年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延续了几

千年的帝制被中华民国取代，而范岁久就成长于这个新诞生的民国。多年之后，在共产党领导下，革命的中国发展成为如今的经济强国，这位年逾九旬的老人虽远隔重洋却始终关注并感受着中国的变化。

中国的新生

如果随祖父姓，范岁久应姓袁。范这个姓来自浙江慈溪的祖母家族。范原名袁椿年，“椿年”的意义是长寿，“椿”和“春”同音，与春天有关。范的父亲有三个兄弟，七个姐妹，他排行第四。后来比他年长的两个人去世了，他便排行第二，在他的外甥或者外甥女口中，他是“二舅”。因为他母亲的家族里没有男性继承人，于是范岁久的父亲曾一度随母亲姓了范。

一九一二年年底的某一天，范岁久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他不知道确切的出生日期，因此选择了一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作为自己的生日。儿子出生时父亲让儿子随祖父姓袁，后改为祖母家的范姓，有鉴于此，儿子的名就从“椿年”改为“岁久”，两个名字含义相同。姓是家族的传承，名也有着特定的意义，中国人的姓名承载着非常多的含义。

在中国，姓作为最重要的部分置于名前。本书中我们直呼范的父亲的名字——袁仲符。袁仲符的父亲，也就是范的祖父，曾是位受人尊敬的教书先生，也在当地政府中任职。家人说，他负责的大仓库失火后，他认为全是自己的过错，深深自责，以致因此去世。范的父亲出生于一八七二年，即清朝的光绪年间，这已经是中国封建帝制的晚期。其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动荡时期，这正是范岁久来丹麦前的历史背景。“清”是中国北面满洲里部落的名字，这个部落逐步强大，于一六四四

年入关，从自尽的明朝末代皇帝那里接手了“天朝”的名分。对汉族人来说，清朝的统治者们是外族，他们以征服者的身份强制汉人留辫子作为臣服的标志。

中国悠久的历史是大多数中国人自我理解的重要根据。在“中央之国”的漫长历史中，这个国家孑然而立，自给自足。为了保持自身的完整统一，她不断地经历着内部纷争。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此后的两千年里，皇朝更迭，虽然中国有时处于分裂状态，但却总能成功统一。



一八九八年，中国戊戌变法失败后，英、德、俄、法以及日本瓜分中国。图片出自法国刊物Le Petit Journal。

在一些有才干的清朝统治者的治理之下，十八世纪的中国文化相当繁荣。甚至到了十八世纪末，乾隆皇帝仍然垂问英国使节，英国到底能为中国进献些什么。相对于其他国家，当时的中国有着很强的优越感，她并不认为欧洲国家能与自己平起平坐，这些国家只有在大清浩荡的皇恩许可之下才能通过港口城市广州与中国进行贸易。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中国已不再有能力抵抗来自西方的进攻，无法把外国人阻止在境外了。这一切从鸦片贸易开始，中国试图限制鸦片进口，而这损害了英国的利益，英国人想要让中国对其贸易和印度鸦片开放市场，中国试图抵制，从而导致了英国的武力进攻。英国当时的舰船技术已经领先于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战败，英国强迫中国于一八四二年签订了《南京条约》，此条约以及之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授予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特别的贸易权，人们称其为“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使得中国的中央集权逐步衰弱，五个港口被迫打开，英国人割占了当时还鲜有居民的香港。虽然在此之前中国也曾遭受过侵略，与其他国家也有过诸多贸易关系，但是一八四二年之后，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个国家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被迫开放，外来侵略导致割地，欧洲的贸易利益和文化影响直线上升。

一八五八年中英法的战争导致了又一个条约的诞生，这次俄国也参与其中。一八六〇年英国人和法国人占领北京之后，清皇朝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大厦将倾，风光不再。中国已不再是能够向他国规定贸易条件的优越方。中国被卷入世界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条约签署各方在形式上虽然具有同等资格，然而条约的内容往往是由战胜方制定的。中国是弱势的一方，她被迫对西方的贸易和文化打开国门。最初只开放了五个港口城市，渐渐地，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中国八十多个城市里立足，外国人在租界里生活，遵循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

鸦片战争拉开了西方侵略的序幕，清政府的软弱日益暴露，皇帝被迫向欧洲人开放更多城市，到十九世纪末，情况彻底恶化。顽固的慈禧太后和她的幕僚们极力扼杀每一次试图改变现状的努力。一八九五年，战败的中国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内容包括割让台湾。政权内部曾尝试改良，却遭到铁腕镇压，改良运动者们被处决，参与改良的年轻皇帝甚至都遭软禁。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爆发，“灭洋”的旗号成为西方武装干涉中国的借口。几年之后，皇朝时代结束了。

一九〇〇年之后不久，一场轰轰烈烈的抵抗运动使这个国家开始觉醒。清皇朝已经失去权威，很明显再也没有能力领导革新，然而革新在与西方相遇之后变得尤为迫切。清政府失去了统治基础，许多变革正在由私人自发推动，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官僚和传统贵族的新阶层出现了。

一八六〇年之后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导致了中国人口和经济的剧变，袁仲符所属的阶层因此获益良多。受过良好教育并且富有的袁仲符很快就意识到新时代正在来临，开始积极参与变革，希望成为时代政治的先锋。他属于人称“城市改革精英”的社会阶层，该阶层认为中国的未来需要工业化，而工业化可通过改良现存体制来实现，袁仲符便是这一主张的积极倡导者。

许多有识之士从日本得到了启发，袁仲符也是其中之一。几百年来，中国和日本都与外界隔绝，又都被迫打开国门与欧洲和美国进行贸易。一八五四年日本向西方开放，日本天皇以西方为榜样迅速发起改革，开创了明治时代。日本使节在欧洲各国学习先进知识，并将之带回日本。除了以德国宪法为样板制定出日本新宪法之外，日本还展开了一系列行政和军事改革，比如废除武士阶层，日本因此得以在短短几十年里迅速变身为现代国家。较之日本，中国统治者的反应则大不相同，备受传统教育熏陶的官僚领导下的陈旧僵化的行政体制拒绝改革，并且企图把现代技术尽可能久地抵制在国门之外。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泱泱中国败给了小国日本，中国的问题清晰明了地摆在眼前。十年之后的一九〇五年，日本击沉了俄国的东海舰队，上升的太阳之国逐渐成为了东方的绝对榜样。从来都是中国文化向东影响着日本，现在局面却反了过来。

日本的现代教育于是也成为了榜样。和其他留学日本的人一样，范岁久的父亲在日本认识到了新的时代要求。至于他什么时候去日本，在哪里学习，我们并不知道，估计是在一九〇〇年之前，那正是中国的新兴力量努力追求变革的时候。

义和团起义之后，清朝统治阶级也认识到改革无法避免。一九〇五年，陈旧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一九〇六年，人们试图通过选举和设立议会改革国家体制。清政府派出了赴美国和德国的代表团去学习其政治形式，也派出了赴日本、英国和法国的代表团。该代表团见识到一个新的政体制度，它由一位强有力的皇帝和一个能自由地公共辩论的议会组成。一九〇八年，立宪改革方案出台，该方案包括通过选举和国民协商大会来任命和组成地方协商会议。

早在一九〇五年，上海就已经有了市政议会。借助于地方自治政府

的改革，渴望变革的精英们获得了改变税收体制、消灭腐败的良机。为了开办新学，电气和供水等公共基础设施被建设起来。虽然中央政府也试图巩固自身统治地位，但是新变化与旧体制的共存却绝无可能，何况清政府并没有尽力去赢得民心，国家的政体无法满足新兴商业精英阶层的要求，它终将崩溃。

末代皇帝

一九〇八年，慈禧太后去世。年幼的溥仪被推上了权力的舞台，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地方政治势力与改良后的现代军队以及地方精英结盟，逐渐强大，很多省份纷纷与清廷脱离，宣布独立。清廷帝制摇摇欲坠。革命者们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宣告中华民国成立，革命领袖孙中山当选为临时总统，他的领导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那时人们普遍认为，能够完成从旧中国到新时代过渡的只有一个人：袁世凯，中国军队的领导者。基于一系列协议，孙中山于一九一二年二月辞职，清帝退位，同年三月，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这一系列事件避免了中国内战及外国势力的介入，因此一九一二年，也就是范岁久出生的这一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

社会变革大潮中的袁仲符

杭州和上海这两座大城市对范岁久的成长来说非常重要，他是在这两座城市里长大的，父亲在两地都有企业。和今天一样，当时的杭州和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尤其是上海，它的城市规模、重要的国际地位和活跃的贸易，令它被看做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末代皇帝溥仪童年时的照片。



范岁久的父亲袁仲符（一八七二—一九五二）是一名律师。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他投身经营位于杭州和上海的企业。范岁久于一九三五年远赴丹麦后，一直与父亲保持着书信往来，但他此后再没见过父亲。

杭州是一座古都，早在公元六世纪就有了一条巨大的运河，到了十二世纪的宋朝，这个城市已然颇具规模，直到十九世纪，它一直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人口逾百万的城市之一。杭州周边区域的人口快速增长，以致人多地少，耕地缺乏。茶叶和棉花是杭州的主要产品，杭州也是中国丝绸制品的中心，而丝绸生产曾是范岁久的父亲所办企业的一个重要部分。

相对于杭州而言，上海是一个“暴发”城市。从十九世纪中期，即欧洲殖民之后，上海才开始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文化意义。这是一个开放的城市，港口边坐落着风格各异的欧洲建筑，城区被分割为不同的欧洲住宅区，居住着外国上层阶级，当地无数的中国工人为他们提供着廉价劳动力。作为连接中国和欧洲贸易文化的纽带，上海成为了一座国际大都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海迅速发展，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它已经不仅仅是座大都市，而且成为东方最大、最重要的贸易城市之一。

在上海成为新贸易文化典型的同时，杭州在极大程度上还属于传统中国。杭州周边有着美丽的自然风光，她的美景常常出现在中国的历史故事和诗歌作品中。西湖被寺庙和堤桥环拥，美丽精致，仿若一颗珍珠。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天神的完美居所是天堂，而在人间的苏州和杭州简直是可与天堂相媲美的地方，这就是把天堂和人间相呼应，赞美这座美丽古老的城市。范岁久在这里长大，这里有他的根，古老中国的根。不过在十九世纪末中国刚刚对外开放的时候，杭州也是深受新思想、新观念影响的地区之一。

袁仲符是参与推动社会向新制度过渡的地方精英中的一员。从浙江政法大学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律师，之后远赴日本留学。我们不甚清楚他当时的政治倾向，他也许为腐败的清廷不再成为进步道路上的绊脚

石而感到高兴，但同时也对过于激进的改革持怀疑态度，因为他担心这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失衡。袁仲符没有参政也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曾有人给他了一个政府职位，但被他谢绝了。他只参与过一次政治事件，那是在一九二〇年，他以“范袁萃大律师”法律顾问的身份筹划了一场针对当地军阀的谋反，这次谋反最终没有成功。袁仲符的一个侄子谈起他在杭州和上海从事律师事务的点滴。

“一九二〇年，我们迁居到杭州城站附近的金刚寺巷，我们家的客厅在上午多半是舅父的会客场所，客人很多，有些迟来的便要等待很久，可见他的律师业务是很受欢迎的，当然收入也很丰厚，不过他仍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当时家境富裕的人家都有一辆漂亮的人力车，称为‘包车’，雇专人拉，车上踏脚处有一只踏铃，遇到路上有人或有车时，主人便叮当叮当踏个不停，叫他们闪开，拉车人就可以跑得快些。人力车就像是一种财力的夸耀。舅舅以前也有一辆，可是早就不用了。长期以来不管晴雨寒暑，他出门总是一袭长衫，一顶礼帽，一把阳伞，极少见他坐车往来市区。他在沪杭两地均有业务，来往乘坐的一定是火车四等硬座。车内极拥挤，车速也慢，陈旧的硬板凳很不舒服，可老人家却习以为常，丝毫不受影响。”

除了律师事务，袁仲符也参与启动了一系列工业项目，岁月荏苒，它们逐渐成为了他的工作重心。在从事律师事务的同时，他开办了武林铁工厂、萃盛蚕种场以及位于杭州的纬成丝绸厂。他经手的生意也涉及茶叶生产，此外，他还投资了一家黄包车出租公司和煤炭产品生产等等。他参与了许多商业活动，比如，他曾与人在上海联合创办了一家银行和一家化工公司。

丝绸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之一，而浙江是丝绸生产的中心。为了推进和提高丝绸生产的效率，中国在那段岁月里建立了许多相关企

业。日本当时在丝绸出口上占据优势，这令中国人十分担忧，认为这个产业亟须革新，革新的方式之一就是改善蚕卵孵化以及缫丝的条件。一九一二到一九二四年间，在浙江诞生了约二百家机械企业，它们既能够维修又能够生产机械和其他设备。袁仲符是个技术革新的领跑者，他的机械厂不仅为丝绸生产制造各种机器，而且还向别家提供机械支持，同时培训技术人员以帮助其他企业。中国缺乏技术劳动力，因此培训技术人员是对中国复兴的重要贡献。

一个研学渔业技术的侄子记得袁仲符曾这样对他说：“要实业救国，要学好科学技术，要多做少讲。既然选择了水产专业，就应该热爱这个事业，长期从事，做到‘矢志弗渝’。”

丝绸产业革新也得到了日本专家的协助，他们教中国人养殖丝蚕。袁仲符一个侄子对这段经历的回忆让人不禁想到范岁久后来的企业。他说：

“……乃于一九三〇年初在艮山门外创设了萃盛蚕种场，投入资金之庞大难以估计。搭建了许多育种室、饲养室以及用于吹干桑叶的大棚厅和蚕种冷冻库，配置了吹风机和在当时不多见的冷冻机器设备，并建造了供百余人使用的宿舍和大饭厅。大片的桑田也是必须购置的。蚕种场成立不久，以‘天官牌’为商标的蚕种广受江浙蚕农信任与欢迎。因为蚕种健康，蚕宝宝长得快且壮，很少生病，丝量增加，收益就多，所以纬成公司的产品更加良好，国家的外汇收入与税收都增加了，农民收入可观，技术人员与员工们都有丰厚的薪金与工作保障，足证一位有才能智慧并自我廉俭的企业家可以造福家邦，良非虚言也。”

为了管理这些产业，范岁久的父亲在上海和杭州之间往来奔走。他总是穿着朴素的棉布袍，脚上穿着绒毡鞋，拿着把作手杖用的雨伞，背一

只包。他对食物也不像美食家那样讲究，喜欢吃肉干蘸酱油、鸡蛋和椒盐花生。无论冬夏，他都洗凉水澡，还说：“正因此我一辈子从不曾着凉感冒。”家人记忆中的他便是这样的。范岁久写道：他知道任何东西都不会无中生有，金钱自有好用处，不要浪费在多余的奢华上。袁仲符的家族有进取心，只是苦于变幻的时局。人们回忆道：他总是想方设法去照顾那些落难或者困苦的亲戚们。关于袁仲符的企业，我们没能了解到更多细节。范岁久后来写道：“在我建立丹麦大龙食品公司的时候，父亲作为探路者的精神和他的忍耐力曾给了我不可思议的鼓舞。”

日本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动的侵华战争和四十年代的战火逐渐地毁掉了袁仲符所建立起的一切。一九四九年新政府开始执政，袁仲符和他的家族代表了那个共产主义体制试图消灭的经济阶层。

绅商——中国的新精英阶层

在丹麦人看来，中国人选择来丹麦留学是件很有异国情调的事，但从中国当时的处境看却并非如此。自十九世纪中叶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之后，在许多城市里划出了外国租借地，中国人开始与西方人做生意，这刺激了贸易的发展。一个新兴的中国社会阶层开始从商务活动中破土而出，逐渐成长为新的精英阶层，即人们所说的“绅商”。他们不再附庸于陈旧的官僚等级制度，他们既是商人，同时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由于广泛的对外联系和迅速发展的贸易，这一阶层首先在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地区出现。国家政权缺乏支持和推进新兴工业和商业的能力，相反，私人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并支撑着中国的工商业。作为绅商的私人企业家们认为朝廷腐败无能，因此放弃了对皇朝的支持，这就是一九一一年结束清王朝统治的辛亥革命的社会背景。

工业产业建立是新兴精英阶层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范岁久的父亲经营的机械生产属轻工业，而轻工业是整个工业产业中最重要的部分。通常这类产业由地方上的手工艺人建立，但从上海起家的袁仲符是一个例外，他是那些在浙江有产业基础继而要在上海寻求成功的人的典型代表。这些新兴工业实业家们参与建立商会和行会，并与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保持着良好关系，这些关系至关重要。这一阶层的价值观，诸如“忠义”的观念和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理解等，源于传统儒家的经典价值，根深蒂固地保持着清晰的民族意识，饱含着工业救国的愿望。稳固的家族结构是这个阶层的典型特征，这就是说，自己和儿子、兄弟或者其他家族成员一同经营产业，生意做大的同时权力也不会旁落，这一点对他们而言非常重要。袁仲符对儿子未来角色的定位正是合作者兼继承者。

投身工业建设的人群中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注意到中国经济的失衡之处在于农业极其滞后，甚至无法满足国民的三餐之需。中国农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经历了一场严重危机，像范岁久的父亲这样目光长远的人意识到了通过农业机械化改良生产条件的重要性，这便是范岁久被送来丹麦的时代背景。因此，要回答“范岁久到底为什么来丹麦”这个问题，我们的答案很大一部分都必须涉及当年中国华东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

范岁久的童年

尽管历经革命风雨，时局动荡，范岁久的大家族仍然遵循着传统儒家价值观：与人相交，以身作则，道德为重。臣民敬重君主，子女敬重父母，年轻人敬重年长者，男人走在女人前面。这些稳固的传统价值至关重要，一旦被冲破，那么和谐的社会秩序也将荡然无存。每一个人立于天地之间，有着自己的位置，子女要服从父母，长子相对于弟妹有着各种特

权。范岁久谈起自己的父亲时说道：对中国的语言文字，对中国的哲学家孔子、孟子，以及中国古代历史著作——以《论语》、《孟子》、《春秋》简以代之，他有着广博的知识，能背诵许多奇妙的唐诗宋词。范的名字“椿年”就出自哲学家庄子所写经典篇章之中。

袁仲符有过几段婚姻。他的第一任妻子早在一九〇一年就去世了，去世时年纪很轻，没有留下孩子。范岁久的母亲是施夫人，娘家姓沈，出生于一八七八年，与袁仲符结婚前她曾有过一次婚姻，并育有一双儿女。她的前夫亡故得早，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经济处境很艰难。按习俗，她的两个孩子该由父亲的家族养育。据孙女丽丽讲，施夫人（她的前夫曾是范岁久父亲的雇员）在婆婆的建议下搬到了袁仲符家住，之后生下小儿子范岁久。范岁久说母亲并不是父亲真正的妻子，她类似家中的女管家，身份更像是妾而非妻，父亲并不曾把施夫人看作正房妻子。关于范岁久在杭州的成长经历，我们没有收集到足够多的材料，只知道袁仲符离开他们母子俩去了上海定居。之后许多年里，母子独居，母亲拉扯范岁久长大，让他接受初级学校教育。父亲在上海与第二任妻子彭夫人还有其他家人住在一起，其中包括范的弟弟椿一。范岁久后来和这个弟弟关系亲厚。

彭夫人于一九一八年生下了椿一。因为母亲的出身优于施夫人，椿一在家里的地位高于岁久，但他却没有岁久那种继承并发展家业的能力。父亲决定将宝押在岁久身上，让他来上海。他在上海父亲家中继续接受教育，几乎与母亲断了联系。在父亲写给岁久的一封信中，他说椿一“在出生的时候受了伤，因此没有力量去做事，他没法协助我”。^①家里人谈起椿一，都说父亲对这孩子很严格。椿一大后，仍住在上海父亲家里。父亲回家的时候，他的任务就是去开门，如果门开得不够快，



范岁久的母亲施夫人（一八七八—一九四二）。范岁久幼年与母亲住在杭州，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父亲将他带去上海生活学习，与母亲极少联系。一九三五年范岁久赴丹麦留学之际，她没有机会与儿子告别。施夫人在一九四二年战争期间去世。

^①本书中所引中文信件的内容是由丹麦语原书中的丹麦文字再次翻译成汉语的，并非原函文字。

就会挨一通骂。其实范岁久受到的教育也很严格，一旦没有达到父亲的期望，他就得受体罚。

施夫人和彭夫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双双去世。范的母亲施夫人逝于一九四二年，彭夫人逝于一九四〇年。她们去世后，范的父亲与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张启明结了婚。张启明出生于一九〇六年。

和大多数人一样，范对自己儿时的回忆很模糊。他记得他那时精力充沛，胆子很大，被称作“孩子王”。他还记得父亲很严厉、母亲很慈爱。他对丰富多彩的神仙世界非常着迷。他的家位于杭州城里环境最好的区域。城里时有火灾发生，大多数情况下房屋被完全烧毁。他说：

“我和伙伴们都很好奇，经常跑去看热闹，每次我们都能看到躺在地板上被烧焦的尸体。”在当时的中国，孩子们从小就知道了“死亡和死者并不遥远”。范岁久还记得在掩埋穷人的墓地里，死者被埋在很薄的一层泥土下，有些骨架甚至发着光。那时人们对他解释：这些人是矿场和金属厂的工人，因为金属中毒导致死亡，所以骨头被氟化。这一解释是否正确，我们搁下不论。

在家上完六年小学后，范岁久接着在杭州蕙兰中学上完了初中。之后他先在浙江的一所高中念了一段时间的书，又转到上海念完高中。范岁久说自己当时是个很懒惰的学生。有一次他因为打老师，差点被赶出学校。他说之所以打老师是因为这位老师指责他不好好念书，只花时间酗酒和找不正经的女人。这件事是真是假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凡是认识范岁久的人都知道他学识渊博，通晓中国文化。正因为如此，他非常了解中国和丹麦之间的文化差异，熟悉丹麦人的性格特点。

中国教育强调死记硬背。中国的许多古典诗词范岁久都熟记在心，他也曾学过书法，应当算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有教养的人。工作之

余，他喜欢吟诗，写写书法，范岁久还记得他曾通过临摹父亲的来信来练习书法。

父亲严密地监察着他的学习，要求很严格。幼年时他在家由教书先生教四书五经，这是中国教育的必修课。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某天，父亲把他从杭州的家里带到上海，之后便严格督促他学习。家族里曾有这样一种说法，说父亲预先不打招呼就粗暴地把儿子从母亲身边带走，是因为他认为母亲的溺爱和温情会宠坏孩子，从此施夫人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儿子，也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儿子的消息。因为不愿和她牵扯，袁仲符与她也没有什么联系。在范岁久的书信中关于母亲的内容很少，只在一封一九三五年来自日本的信中我们可以略见一瞥。在信中他问道，母亲是否仍然有鸦片瘾。我们还知道她曾是缠小脚的，行走艰难，在去掉了裹脚布之后仍是如此。我们对施夫人施以极大的同情。第一场婚姻的两个孩子在亡父家中长大，施夫人之后与他们没有什么来往，当她心爱的岁久从她身边被带走的时候，不难想象她深切的悲哀和思念。

孙女丽丽长大后搬来和祖母住在一起，这对年迈的施夫人而言是个莫大的安慰。不幸的是，丽丽得了伤寒并传染给了年老虚弱的祖母。祖母被送进杭州医院不久后便去世了。家里人说，施夫人总是唤着自己的“小猫”，这是她给岁久起的小名，直到最后一刻她都以为儿子就要走进家门与她团聚。按照中国的习俗，安葬母亲是儿子的责任，然而这却无法实现，她的长子和范岁久都不在跟前，最后还是范岁久的弟弟到场，代理主持了葬礼。

因为种种原因，范岁久在事隔多年之后才得知母亲已经亡故的消息，他为此极度悲恸和消沉。

摩登上海



十九世纪初的上海港。摄影：Burton Holmes。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乃至远东地区的大都市，一九一〇至一九二七年间，上海的人口从一百三十万增长到两百六十万。当时的中国有四亿多人口，其中绝大部分居住在农村，因此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上海与他们的现实生活实在是太遥远了。

从地理位置上看，上海位于黄浦江的出海口，城市的国际区域即贸易中心位于黄浦江的西岸和北部。主要街道南京路上百货商场林立，黄浦江畔的外滩上聚集着银行、酒店、海关大楼和极具西方情调的建筑物，其中包括香港汇丰银行、上海银行及其他银行大楼。国际城区的南边是城市的中心即中国城区，西边是法国的势力范围，即所谓的法租界。在国际城区和法租界居住着欧洲人和许多中国商人，后者也将他们的办公室建在了这里。东边是造船厂、仓库和工业区。外国人居住区执行欧洲的法律，建筑风格深受英法两国的影响。范岁久的家位于国际城区——上海公共租界，它实际上属于英租界，设计得就像一个小小的伦敦，这里有沥青街道、公共交通、商店和照明，给人一种身在欧洲的错觉。

受许多权力机构和势力的影响，这里结构复杂，鱼龙混杂，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散发着令人迷醉的国际氛围：富有传奇色彩的商业和犯罪活动，灯红酒绿的夜生活，操控着走私买卖的帮会，社会各个层面的人群毗邻而居。有许多描写当时上海的书，例如，罗伯特·比克斯（Robert Bickers）根据一位公共租界巡捕房英国警察的传记而写成的《帝国造就了我：一个英国人漫游在上海》。

今天人们提起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总是会联想起黑帮、夜生活、赌场、妓院、易得之财、犯罪、暗杀、放荡招摇的新贵等等。大多数联想其实正与当时的实际相符。渐渐地，上海城有了超过三百万的居

民，这相当于当时丹麦人口的总数。所谓的“青帮”控制着上海的地下世界，腐败的警方对它无可奈何。几乎没有一个生意人能避免与这个黑帮组织打交道，作为一个普通商人，袁仲符也无法规避。在上海生活不容易，范岁久记得自己就曾在大马路上遇见刺杀事件，绑架和撕票（如果被绑架者的赎金没有付）也司空见惯。在上海生活几年下来，人必定变得坚强，具备应对剧变的能力。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近五百名丹麦人住在上海，他们大多很年轻。其中大约有八十名换工住宿（au pair）的女孩，她们在丹麦人家里工作。至于其他的丹麦人，有些受雇于丹麦或者国外贸易公司，有些自己开公司，也有一些人任职于中国的公共部门。税务和邮电机构等重要的基础部门大规模地雇用外国人。威尔海姆·梅耶（Vilhelm Meyer）就是一位很有名的丹麦商人，他自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三五年居住在上海，开了慎昌洋行（Andersen, Meyer & Co.）。我们不知道范岁久和他的父亲是否曾遇见过梅耶。也有一些丹麦海员来到上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每年有近百艘丹麦船只停靠在上海，丹麦的红白国旗在上海的口岸边并不稀奇。当时中国境内显然已有了丹麦人的身影，那么，范岁久会到丹麦来也许就并不像人们直觉得那样不可思议，丹麦从来不是某些人口中那个微小穷困的国家。丹麦在上海有一个总领事和一个领事，随后来上海的有丹麦大企业的子公司或分部的领导人，此外还有许多丹麦人来此定居。在最初几年里，丹麦人已经多到足以在一个丹麦教堂里举办活动了。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三年间，在上海有一座丹麦教堂和一小群丹麦教区会众，宝隆洋行或大北电报公司的驻华丹麦员工去那里做礼拜和聚会。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情况有了变化，一部分丹麦公司及其员工被撤回，而许多人对牧师（后来的教授）斯宇（N.H. Søes）的职责看法不一，最终致使教堂关闭。

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实际上由两个部分组成，这两部分各自为政。当



大北电报公司铺设了从丹麦到中国的电报线路，一八七一年开通了上海与日本长崎间的线路。图为一九〇〇年左右上海的一间电报局办公室。



一九二六年的上海，人们在咖啡馆里跳着时髦的欧洲交谊舞。

时的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军阀统治之下，军阀混战持续十余年，中国被分割成许多势力范围。而在被迫对外开放的那些城市里，欧洲人和中国人相邻而居。上海就是这类城市的代表之一。这里有现代银行、工业、企业、大学以及其他教育场所。与中国大部分地区相比，这里相对安宁有序。西方国家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给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好处。对于像袁仲符这样的人，上海有着各种机会，有好的生活和与外国人建立联系的可能性，在这里袁仲符才有机会送儿子去丹麦。袁仲符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们接受新兴的现代教育体制并且有能力利用与欧洲交往所得来的便利。如果一个有事业心的中国人，既能与欧洲人打交道，同时又扎根祖国，坚定自己的文化传统，他将会大有作为。我们对范岁久的父亲所知甚少，无法完全准确地了解，但我们可以推测他是工商业精英，参与选举市政代表，认同新的教育原则，阅读上海早期的报刊以掌握市场信息，总之说他是个有远见卓识的人并不为过。在这一时期，领导阶层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即社会责任感和照顾弱者的道德考虑。在一个中央政权极其虚弱的国家，这一自我意识显得尤为重要，用一个现代词语来讲，就是发展公民社会。上海是个反差巨大的城市。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毛泽东一九二三年曾在上海居住过。

范岁久的青年时代并非完全在上海度过，他在那里住了差不多十二年，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他去了日本。一九三〇年后，他曾被送去日本的一所学校。因为当时人们觉得日本这个新兴的现代社会能让中国人学到不少东西，于是在学会了英语之后，年轻的范岁久进了一所讲日语的学校。有关范岁久留学日本的过程、时间长短、学习收获等，我们已经无法得到确切的信息。范岁久曾谈起过那些严苛的学校纪律和虐待学生的老师，他回想起自己曾和一些同学在房间里点煤油炉做饭，结果酿成大祸。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因此被召回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护照相片里，他身着日本校服。他不常聊起在日本的那段时光。虽然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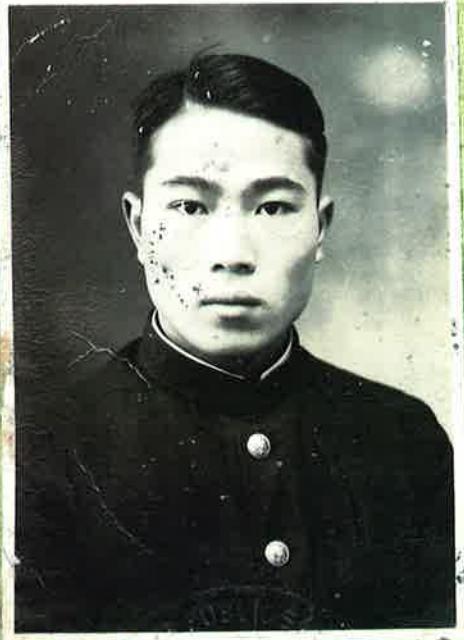
们无法得知为什么偏偏选择日本，以及留日的具体目标，但我们猜想，范岁久的父亲一定坚信儿子在日本会学到与现代社会有关的东西——就像自己当年一样。那时的日本已经暴露出了攻击性，一九三一年日本占领了满洲里。我们有太多的理由相信，日本学校的纪律必定严苛到不允许有任何差错，当初在日本的留学经历一定令范岁久不堪回首。

从少年时期起，范岁久就给父亲帮工，把蚕卵从杭州的养殖工厂送到农户家里，这些小农户负责把蚕卵养成蛹。蚕卵被放进许多小布袋，再装入纸盒，然后范岁久带着盒子坐上黄包车去农户家，他因此非常熟悉杭州的周边地区。留日归来后，他已经到了能参与父亲生意的年纪。想起当年的上海，范岁久有一段关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一场婚礼的记忆。那次袁仲符代新娘的父亲出席了婚礼，那人曾是一位富有的船主，也是范岁久父亲的客户，但他遭绑架之后遇害了。婚礼上宾客很多，其中就有声名狼藉的杜月笙——前文提到的人所周知的上海黑帮组织“青帮”首领之一。

袁仲符在上海的国际圈里交际广泛，和丹麦的宝隆洋行也有来往。袁仲符给许多公司做法律顾问，这些公司中有一家做大豆饲料饼，而宝隆洋行则从这家公司购买豆饼，凭着这层关系，范岁久首次结识了丹麦商人。当袁仲符开始考虑儿子是否应当再次出国留学时，宝隆洋行正好促成了这件事。袁仲符认识一位在宝隆洋行做事的中国人，这人的儿子曾在赫尔辛格的国际民校（Højskole）待过，对其评价很好。在当时的上海，人们虽然对丹麦所知有限，不过对其先进的农业发展倒是有所耳闻，认为丹麦应该能教人许多关于现代农业和农业合作方面的知识。范岁久的表弟周世南有一段叙述，详细地说明了范岁久去丹麦留学的背景。因为范岁久的父亲排行第二，所以他把袁仲符唤作“二舅父”。

“一九三四年，与二舅父有交往的立德洋行告诉他有两个去北欧丹

2



姓名
年歲
職業
籍貫
身量
相貌



250665

3

外交部

發給護照事茲有

民廿二年

取道俄德意

應請

友邦地方文武官員當為照料遇事襄助

須至護照者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十日

此照限用年全無共拾陸頁

照費國幣貳元
留學工人減半

發照機關長官簽印

一九三五年，范岁久带着这本护照来到丹麦。
照片中他身着日本学生制服。护照上的丹麦签证为期两年，后多次延期。

麦学习的名额，二舅父对此非常感兴趣。丹麦当时就以农业发达而闻名，中国也是个农业国家，去丹麦学习正好作他山之石。他一方面发信给在日本学习的长子岁久表哥，要他回国，转而再去丹麦，一方面又来看我父母亲，要我也和岁久表哥同去。我父亲倒是赞成，我母亲却持保留态度，她觉得到那么一个路途遥远、又没有多大名气的小国去学习，很渺茫。这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岁久表哥已从日本回来，二舅父就带了他到我家来，要我父亲为岁久表哥推算八字（当时我父亲常以此为消遣），记得推算的结果说岁久表哥大器晚成，这话算是说对了，因大龙公司跻身世界食品行业时，岁久表哥已年过不惑了。就在那天，我母亲坚持不让我去丹麦。”

于是，在一九三五年，范岁久独自踏上了赴丹旅途。

丹麦模式

“忠义”和“以身作则”这样的概念，在儒家思想里非常重要。不能强求别人向自己学习从而进步，而是要以身作则，要求自己时刻向榜样学习。范岁久留学丹麦两年后的一九三七年，当他回答“为什么来丹麦”这个问题时，他所想到的就是这些道理。他最初来丹麦求学的目的是否从一开始就很明确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他在《阿斯蔻夫书1936/37》中写于民校学期末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有明确目标的。这是范岁久第一次尝试用丹麦语写作。

“丹麦以出色的农业为世人所知，我们因此对丹麦很感兴趣。中国政府的统计显示，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的中国人口直接或者间接地以农为业，也就是说，农民阶级是中国社会里意义最重大的阶级，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安全。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去改善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

条件，由此才能振兴国家。”

然后，范岁久谈到了中国近代极具戏剧性的历史，谈到了日本侵占满洲里，谈到自然灾害，还谈到了身处地主压迫之下的农民。农民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毫无组织可言，这导致了严重的危机，仿佛“一个熟睡的人头上的一道闪电”。范岁久写道：“能干的青年们到农村去鼓励农民甩掉身上的重负，学习知识，争取自由。”范岁久笔下“能干的青年们”毫无疑问是指那些共产党人。思及共产党为赢得农村的民心所作的努力，他继续写道：

“政府也认识到了开展农村合作运动的必要性，建立了各种农民银行来改造农村经济体制。在中国西北建立了人民学校来传播相关知识，比如怎样更好地使用土地和从事生产。但是，要完成这样巨大的工作，中国缺少经验，我们需要好榜样，需要有能力、有知识的人来指导。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就无法满足这个时代要求。指南针原是中国的发明，现在我们却得向别人借指南针来导航，我们必须向进步国家学习，比如美国、俄国、丹麦等。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立刻推行大规模农场化或使用大型现代农业机械，我们拥有的是小型产业和小农场，所以我们需要的是适合这类小农场的小型农业机械。我们缺少的不是科学理论，而是实际的操作技术。我们无需把重建农业的责任推给国家，它应当通过共识与合作来实现，这样我们就能建立起一种健康的农业产业组织，它将会是世界农业系统的一部分，可以与任何先进国家合作。

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既不在美国也不在俄国，而在丹麦。早在十九世纪丹麦就已经实施了农业改革：废除隶农制和什一税制，取缔农产税，兴建小农场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重振中国农业的绝好模式。”

至于当时丹麦在中国的形象，他写道：“最近的五年里，中国人对丹麦的谈论很多。在报纸杂志和讲座中，人们经常能看见和听见丹麦的

名字。中国谦虚地尊重和吸收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因此我来到这里学习，我的许多同胞都很想访问这个美丽和平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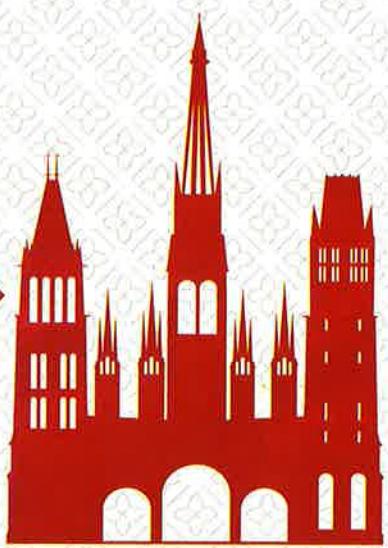
迥别于中国的丹麦社会、在丹麦民校（højskolerne）里接受启蒙学习的时光，以及在农业合作社中的亲身体验，无疑是范岁久初到丹麦这几年里获得的宝贵经验。当父亲袁仲符决定让儿子去欧洲时，他也许已经预感到儿子的丹麦之行将会受益匪浅。他并没在这件事上过于纠结，只要认定范岁久会获益，那么这事就定下来了。

如果我们对上海的国际生活和丹麦驻华代表有所了解，再想想袁仲符希望中国富强的强烈愿望，那么，我们就不会觉得他把儿子送往丹麦这件事有多么稀奇了。如果一切按计划发展，两年后范岁久就会带着农业机械化知识回国，成为诸多从海外求学归来的中国人之一，继续在父亲的企业里工作。这是一九三五年的事，范岁久时年二十三岁。中国和世界都在出人意料地变化着，范的原定计划也随之更改。“两年”变成了三十七年，而范岁久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父亲，再也没能见到他所熟悉的一切。父亲的产业沦为了战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牺牲品，最终消失殆尽。无情的历史并未体恤像袁仲符这样为建设新的中国而努力的人。



■ 年轻时的范岁久

第二章 丹麦





范岁久曾多次在丹麦农场里实习，直接参与农业生产，了解丹麦农业发展情况。照片摄于一九三六年，当时他在欧登斯的布兰斯特德皋农场实习。

到达丹麦

去丹麦的旅程是漫长的，范先坐轮船从上海行至天津，再到北京乘火车去满洲里的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坐上横跨西伯利亚的火车到莫斯科，然后一路旅行到柏林。他在那里短暂停留，除了在城市观光拍照，他也亲眼目睹了当时欧洲的“瘟疫”——纳粹分子的游行队伍。这趟旅程共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而哥本哈根并不是范岁久接触的第一座欧洲城市。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范走下从柏林到哥本哈根中心火车站的火车，然后直接去了宝隆洋行总部。父亲已做了安排，通过宝隆洋行范岁久能拿到家里寄来的钱。离开洋行后，他去了希勒若普的中国公使馆，那里有人接待他。他住在帕尔科夫街的布雷斯多夫（Bredsdorff）夫人家，布雷斯多夫夫人与宝隆洋行有来往。范岁久对哥本哈根的第一印象非常好，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他对看到的一切都感到兴奋。他曾提到从斯特律街（Strøget）到国王新广场的这一路让他欣喜不已。不过他并没有将时间都浪费在游览哥本哈根的美景上。通过宝隆洋行，他被安排暂居在西兰岛上的基勒莱尔（Gilleleje）附近的一个农庄里，在那里他对丹麦的现代农业有了初步了解。农庄的名字叫伦德巴克，农庄主是阿斯哥尔·伦德巴克（Asger Lundebæk），他是当地颇有影响力的路德教会的成员。回想起当初的农庄生活，范岁久仍记得空气中散发着粪的臭味。上海这座大都市和丹麦农庄之间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尽管上海不能自夸是地球上最干净的地方，但毕竟那里散发着都市的气味。另外，范岁久不是孤身一人，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中国人，除了姓林（音译）之外，我们并不了解他的情况，也不知道他在丹麦做些什么。但不管怎样，范岁久身边有个能用中文交谈的人是件好事，因为当时丹麦语对于他们来说，必定是一种极其不同而且难学的语言。

在暂居伦德巴克农庄的时候，范曾与一位牧师有过来往，这位牧师



一九三五年三月，范岁久为了换乘火车在柏林短暂停留。当时纳粹冲锋队的仪仗队行进在柏林街道上，他感受到了那种特殊的政治氛围。

邀请他参加在哥本哈根基督教青年会所举行的关于中国传教团的会议。会议介绍了中国的贫穷和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吸收西方文明。范岁久仍清晰地记得，他是怎样在事先没有得到通知的情况下被当做一个例子来说明：只要传教方法正确，就能让中国人接受西方文明和基督教。范岁久不是基督徒，他对于自己被人以这样的方式利用而感到愤怒。另外，他们还展示了一张歪曲事实的图画来说明中国需要什么以确保其繁荣，这也让范岁久非常生气。自此之后，他对一切带有传教意味的东西都看不惯。



一九三五年，范岁久在伦德巴克农庄。

当然，作为一个外国人遭遇各种偏见是很正常的。除了知道中国人口众多之外，丹麦人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人们经常引用拿破仑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中国醒来，世界将会颤抖。”（Quand la Chine s’ éveillerat, le monde tremblera）以二十一世纪初的形势再来读这句话，真是先知先觉的预言，但这与范岁久的想法并不吻合。他一贯反对中国威胁世界、威胁和平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曾是并且继续会是一个和平的国家，不管从其领土大小、贸易能力，还是从其丰富的矿产资源等角度看，中国都不会威胁西方。他说：“不，中国想要的是建设世界和平。”他认为儒家关于道德、和谐、人性和公正的思想将会对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产生深远影响。这一看法是否正确，时间会作出评价，对于许多其他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也是如此，如同我们上文援引过的一个例子，在谈到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周恩来“下结论为时尚早”。

范岁久眼中的丹麦

范岁久一九三五年抵达丹麦的时候，这个国家正经历着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一九三五年，百分之七十六的国土面积都用于农业生产，而到了二〇一一年，全国只有不到四万家农场，预期在接下来的几

年里会降到一万家以下。因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丹麦被称作农业国家是有其现实依据的。当时丹麦农业的发展井井有条，但由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相当一部分农业产业也陷入了困境。

范岁久初到丹麦的时候，欧洲正处于经济危机之中。这场经济危机一九二九年在美国爆发，一九三一年波及丹麦，很多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城乡失业率急速上升。各种产品的价格降低，作为丹麦最重要出口商品的农产品价格也在下跌，尤其是向英国出口的黄油和熏肉。范岁久在农庄学习的时候，失业和价格下跌是大家谈论的主要话题。

丹麦农民大多数都拥有自耕土地，他们的阶级意识很早便已觉醒。十八世纪末期，丹麦就开始了农业改革，到二十世纪初，农民已有机会接受教育，农业迅速发展。农民组建了自己的政党，并成立了各种组织来确保本阶级的利益。这一切得益于牧师格隆德维在十九世纪中期发起的“民校运动”，该运动的核心思想是在基督教教会的框架之下，基于丹麦农村生活特点为农村人口量身订做一个坚实的教育机制。格隆德维（1783—1872）是位神学家、诗人和教育家，是十九世纪对丹麦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对当时的精英教育和大学教育持保留态度，转而给予广大农民的教育问题以更多关注，他认为在正规教育体制之外，所有人都应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格隆德维开始著述“民校思想”，极力推行民众教育体系，他主张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博学者，而应培养学生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民校运动推动了丹麦民众文化，尤其是农村文化的发展。

丹麦文化深受基督教影响，每一个村庄都有一座教堂。丹麦国土面积很小，一九三五年，四万四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大约三百七十万人口（二〇一一年达到五百五十万）。上海比丹麦小，面积仅有六千平方公里，但居民人数几乎与丹麦总人口相同。丹麦由诸多岛



德国占领丹麦时期，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每天早晨骑马经过哥本哈根的街道，这一举动使他成为艰难岁月里丹麦国民心中团结的象征。

屿组成，其中包括西兰岛和日德兰半岛，首都哥本哈根位于西兰岛上。初到丹麦的几年里，范岁久在各地旅行，他游览的城市比大多数丹麦人去过的还多。和现在一样，自行车在那时也是很流行的交通工具，范岁久很快就学会了骑自行车。当然，人们通常也需要坐火车或者乘轮渡。

随着时间的推移，范岁久对丹麦的历史越来越感兴趣，他读了很多书，这方面的知识不断增长。他了解到丹麦与英国一样是王国，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九百年。丹麦引以为豪的传统之一就是同一个王室家族的统治延续了一千多年。一六五〇年之前的一段时期，瑞典的南部曾属于丹麦。一三八〇年到一八一四年期间，丹麦和挪威是统一的。位于联邦德国最北部的斯莱斯维希—霍尔斯坦地区在一八六四年之前也属于丹麦。对于国土面积变得越来越小这一事实丹麦人是很清楚的。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开始，丹麦在民族意义上结成了统一体，所有居民都是丹麦人，因此来自中国的客人显得尤为稀罕。

作为一个外国人，范尽量不去讨论有关丹麦政治的话题，但他旁听了年轻人和年长者之间有关丹麦政治关系的各种课堂讨论。当时丹麦的执政党是工人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它刚刚取代了代表农民利益的左翼党。一九三三年，丹麦实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变革，包括对病人、老人和生存困难的人提供社会援助。丹麦的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二〇年，因为党员人数少，在丹麦并没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不过，他们积极地参与并领导工人运动。社会党和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有着不同的看法，在课堂讨论上，这也是大家热议的话题。受到德国纳粹主义的影响，丹麦也有极少数纳粹分子。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丹麦的外交处境艰难。边界线以南，希特勒纳粹统治之下的德国开始重新武装起来，令人胆寒。相较于德国，丹麦是个非常小的国家，在政治上，丹麦尽量不去冒犯德国，而在地理位置

上，丹麦位于波罗的海出口处，是各方势力在北欧对抗的一个战略要地。紧邻波罗的海的苏联的国内形势以及苏德关系对丹麦来说也意义重大。对战争的恐惧以及对于“欧洲战争会为丹麦带来什么后果”的忧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直接影响着丹麦人的生活。

范岁久原本打算在这里做短期居留，丹麦只会是他生命中的一段插曲，但历史的发展改变了他的命运。丹麦历史像中国历史一样，成了范岁久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九三九年丹麦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同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随着战事的发展，丹麦感到了来自德国的威胁。一九四〇年德军通过海路进入丹麦，首先占领哥本哈根，随后占领了整个丹麦。德国的占领虽然只持续了五年，但对丹麦影响巨大。不同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德国入侵丹麦时所遇到的抵抗微弱且短暂。直到一九四三年丹麦政府和警署仍正常运作着。当时也有反对德军占领的抵抗运动，范岁久和他的一些同学都亲身经历了这些。与其他国家相比，丹麦被占领的时期是平和的，战争死亡总数大约只有三千人。当然，对丹麦人来说，被占领是一种耻辱。人们至今还在讨论：我们是不是过于轻易地就被德国人占领了，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应当作出更多的抵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丹麦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个国家在面对强敌时难以作出防卫，很容易受侵害。

在被德国占领期间，丹麦的大学和其他社会机构所幸都没有受到影响，仍能正常运转。范岁久在学校里学习农业科学，并很快获得一份工作。一九三五年三月范岁久从哥本哈根中心火车站走下火车的时候，他绝不会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己将会创建大龙公司。



德国占领丹麦时期，常有英国飞机为了飞向位于德国境内的轰炸目标而越过丹麦领空，每当此时，丹麦就会拉响防空警报。图为哥本哈根国王新广场中心位置的防空洞。摄影：Erik Petersen。

国际民校

一九三五年五月，范进入位于赫尔辛格的国际民校，参加为期两个月的丹麦居留介绍课程。该学校是彼特·曼尼希（Peter Manniche）于一九二一年成立的，范岁久在校期间，曼尼希是校长。曼尼希曾去过中国，并在一九三四年到访过上海。范岁久或袁仲符是否在上海见过曼尼希，我们不得而知。范岁久对国际民校的课程很满意，那里的人对他的印象也非常好。该校的课程目标是把来自不同国家，常常是敌对国家的人们聚在一起，在丹麦民众教育的传统氛围中推进国际理解。这所民校设施虽然很一般，但气氛非常国际化，范岁久很喜欢。学校开设的课程有国际关系、工人运动、社会学、语言、自然科学和当代政治等。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是大家经常讨论的重要话题，在这里范岁久第一次从欧洲人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范岁久记得他和一个非洲人（或是美籍黑人）合住一间宿舍。当时人们都觉得这所学校很“右倾”，因为学校里有许多失业的学生和同情共产主义的学生。另外，学校对于男生到女生房间拜访这件事持宽容态度，这在当时非常前卫。一九三五年范岁久刚入校时，学校内部因为一些事情看法不一正在进行着激烈的辩论。



赫尔辛格的国际民校于一九二一年由彼得·曼尼希（Peter Manniche）建立。范岁久于一九三五年在此居住学习，为期数月。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具有丹麦特色的民校文化。

在中国的时候，范岁久就对共产主义比较熟悉，而这位年轻人在当时不可避免地对这一意识形态充满同情，因为共产主义的方针就是团结中国的穷人，其最终目标就是提高中国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他回忆道，在这所学校里也有一些关心着中国状况的共产主义追随者。

在上海老家的父亲正盼望着来自儿子的消息，他想知道范岁久是不是收到了家里寄去的两百元钱，丹麦人对外国学生的看法如何，范岁久除了学习语言之外是否还学到其他东西，在国际民校上学的情况如何等等。钱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范岁久的学业，父亲写道：“如果你能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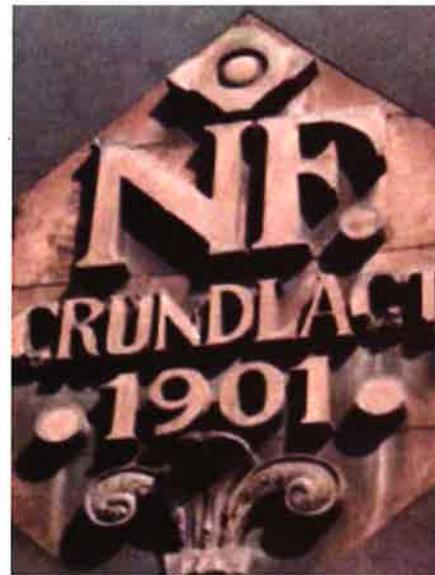
力认真学习，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是我对你的唯一期望。”

负笈求学

一九三〇至一九五〇年间，中国驻丹麦的荣誉总领事是北欧羽绒（Nordisk Fjer）的创建者兰格（H.O. Lange）。北欧羽绒于一九〇一年在丹麦斯文堡建立，它在中国成立了一家分公司，从中国进口羽绒。兰格曾在中国逗留过相当长时间，他认识袁仲符。袁仲符当时为了儿子留学丹麦的事情找过总领事兰格。范岁久隐约感觉他去民校上学的事也许并不讨总领事喜欢，因为这会让人以为他对社会主义有好感，然而这并没有破坏兰格对范岁久的正面印象。留学的事并未按照计划发展，和兰格的良好关系在后来若干年里对范岁久有着莫大的帮助。

上海是个工业商贸城市，而在丹麦，农业则处于核心地位。通过兰格，范岁久被安排到位于罗兰岛普利欧斯寇的一个农庄里实习居住，这个农庄的主人曾在中国传教。范岁久需要支付住宿费，也必须参加生产，干些体力活。在农庄干活的还有许多波兰劳工，他们做的都是些重活、累活。范岁久除了体验迥别于城市的农庄生活之外，最大的收获无疑是与过渡时期中的农业部门相接触。所谓过渡，就是说，尽管当时人工劳动仍具规模，但农业生产已经开始机械化。范岁久对那些在中国不为人知的农业机械有了了解，他对农业的兴趣被极大地唤醒了。范岁久的父亲认为，儿子还没有成熟到能够接手父亲产业的程度，在丹麦自己动手做几年事对儿子有好处，这让年轻人有时间去认识自我，思考未来。袁仲符也许还有一层更深层的考虑，那就是中国农业改革的需要。范岁久对农业产生的浓厚兴趣对他后来的创业有着极大的意义。

范曾与亘托夫特的布雷斯多夫夫人谈到了对农业的兴趣。这位女士



| 照片摄于北欧羽绒公司的哥本哈根总部。

是范岁久在哥本哈根逗留期间的房东，他曾向她租了一间房，从普利欧斯寇实习回来后，他也曾向布雷斯多夫夫人租过房间。在与这位夫人的谈话中，他最关心的问题是，自己如何才能继续留在丹麦学习农业知识，这个问题很自然地就与语言障碍联系到了一起。在丹麦农民那里，中文和英文根本不通用，他必须得学丹麦语。布雷斯多夫夫人帮他联系了位于南日德兰半岛的著名的拉德伦德农业乳品业学校，这是学习乳品专业知识的绝好机会。可惜那里的人并不愿意接受一个不会讲丹麦语的外国人，布雷斯多夫夫人的联系无果而终。她支持范岁久学习丹麦语，范岁久回忆说，布雷斯多夫家的儿子艾历阿斯却认为不值得为这事费劲，毕竟范岁久在丹麦的居留时间太短，要掌握丹麦语几乎不可能。艾历阿斯·布雷斯多夫在很久之后写道，是范岁久自己认为时间太短而无法学丹麦语。不过现在看来这并不属实，因为范岁久学丹麦语进步很快。艾历阿斯·布雷斯多夫后来成了有名的北欧文学学者，在英国住了很多年。在范岁久租住布雷斯多夫夫人房间的那些日子里，他与范岁久相识，之后便失去联络，直至二〇〇〇年重逢。重逢之际，范岁久邀请布雷斯多夫去中国旅行。

之后，范岁久来到菲英教区的小农学校。校长雅科布·E. 兰格 (Jakob E. Lange) 是位重要人物，他是后来的教授兼议员莫顿·兰格的父亲。范岁久也是在这里认识莫顿·兰格的。菲英岛上的人们并不担心语言会成为多大的障碍，一九三五年十月，范岁久成为了小农学校六十九名学生之一。与之前紧凑的学习安排一样，接下来的一年也没有任何时间被浪费。范岁久记忆里的这所学校像一个大家庭。他还记得，学期结束后自己这个外国人曾继续在校居住过一段很短的时间，其间他遇见了许多可爱的女学生，她们即将在新学期开始接受家政培训，这在范岁久看来简直像是对自己勤奋学习的一种酬报，是他生活中的一抹亮色，多年后他仍然怀念那段时光。在这里范岁久认识了学习做家务的学生朗希尔德，后来朗希尔德和她的丈夫维果·斯科夫曼牧师与范岁久成

了终生的朋友。小农学校的学居生活结束后，范岁久又来到欧登斯的布朗斯特德皋农庄实习居住。在这里的一件事让他记忆犹新，他当时就住在马厩上面的房间里，他去问农庄主能否换房，庄主却对他说这种居住方式本身就是农村教育的一部分。

如果范岁久事先没有询问父亲的意见，他是不会就这样直接投身农庄事务的。对此父亲虽然觉得有些差强人意，但还是同意了，父亲认为“实习致于实用，我国亟需此项人才”，从工作角度看，回国后这也将是一技之长。同时父亲说，留学时间再长一些的话，范岁久能够学到更多理论知识，他本人十分愿意出资支持，可惜目前经济状况不甚稳定，所以儿子归国后可能得另找工作。当然，这是范岁久在丹麦的学习已经有所斩获之后的事了，眼下还不成问题。

阿科瑟尔·欧伦森

考岭曾被喻为“小布斯考普”——布斯考普是座荷兰城市，因有各种植物学校而知名，在网络上我们可以读到有关考岭地理花园的介绍。这是一个巨大的植物园，园内根据世界各国的植被特色来布置安排，中国的树木和灌木是其名胜之一。阿科瑟尔·欧伦森于一九一七年创立了这座花园。他的父亲曾打造了许多植物学校，可以说是植物学校王朝的奠基者。阿科瑟尔·欧伦森生于一八八七年，比范岁久年长，他在丹麦和德国学习，成为园丁后开始建立自己的产业。他在考岭地区的冯斯尔德和茨威德之间开辟出了一块面积达7.7公顷的土地，取名“西伯利亚”，并在这里种植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阿科瑟尔·欧伦森的学校里有一小群学生，范岁久得以在该校学居一段时间，这是他留学经历的又一个部分，也是他人生中的高潮之一。他与阿科瑟尔·欧伦森结下了终生的友谊。一九八二年阿科瑟尔·欧伦森去世，终年九十五岁。范岁



阿科瑟尔·欧伦森（一八八七—一九八二）是一位园丁，也是植物学校的校长。他于一九一七年在考岭创立植物学校，并于一九二五年创建地理植物园。照片摄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图为欧伦森（左）与一位记者在一起。

久在他那里学到的植物学知识让他获益良多。阿科瑟尔·欧伦森从中国进口过许多树和灌木，他还是位著名的杜鹃花专家，有一个品种甚至就以他的名字命名。

阿科瑟尔·欧伦森平生不曾到过中国，但他对中国所知甚多，和范岁久在各方面都很投机。一九三〇年他出版了《沿着中国的蓝色大河》，书中对中国花卉的描述栩栩如生，仿佛他曾身临花前，亲眼所见一般。

关于阿科瑟尔·欧伦森，范岁久在一九三七年的《阿斯寇夫书》中写道：“我认识了好几个学生，他们下了很大功夫想要深入了解有关中国的知识和信息，考岭的园丁阿科瑟尔·欧伦森就是其中之一。他从不曾到过中国，然而却比我更了解中国的地理民风。他极同情和理解当今中国，他认为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中蕴涵着力量和机遇，中国必定会走出危机。”

在阿科瑟尔·欧伦森学校的那段时间里，范曾给一位唤作“老黄”的人写信，信中提起阿科瑟尔·欧伦森的植物学校就像是“一个天堂”，阿科瑟尔·欧伦森待他“如自己的胞弟”，并且阿科瑟尔·欧伦森知道那么多关于中国的事情，他甚至从不觉得范岁久的行为方式有什么稀奇的。

范岁久极有效率地利用了他在丹麦的时间，先是在国际民校上学，继而在小农庄务农实习，然后去了小农学校学习，最后又去了先进的植物学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丹麦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范岁久获得的农村印象让他比许多丹麦人更了解丹麦的农业生活。他遇到许多卓越的人物，他们帮助他更好地认识了解丹麦人。这之中有一些人，比如阿科瑟尔·欧伦森一家，与他结成了一辈子的朋友。两年的留学计划如今已经只剩下半年多时间了，范岁久想去——所以丹麦语为教学语言的民校学习，这便是坐落于日德兰半岛上的威恩的阿斯寇夫民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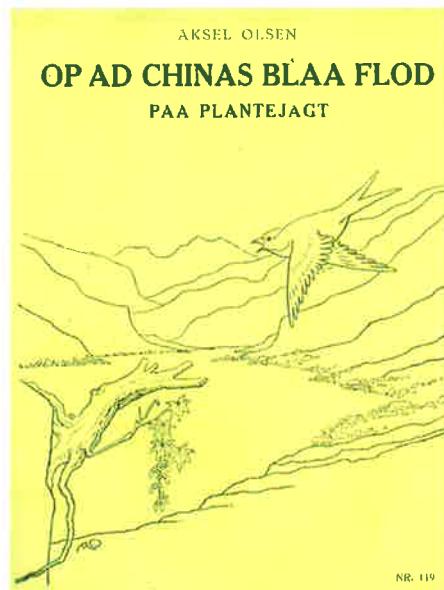
《沿着中国的蓝色大河》

有些作家假装自己曾经去过某地，写出来的文字往往令人难以信服。可是，当阿科瑟尔·欧伦森描述起他那虚构的“中国之旅”时，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想象力，这位从未到过中国的作者对艰难旅途的描述让我们身临其境。

“现在我们才留意到，轿杆在轿夫的肩上深深地啮咬出硬痕，那肩上满是旧疤痕。最年轻的那个小伙子肩膀上血迹模糊。司各特先生接着说：‘中国的工人们以苦力换碗饭吃，只要他们还没有成为布尔什维克，他们就想不到这种状况可以改变。我对他们的勇敢坚韧一向极为尊敬。’在沉闷宁静的早晨，轿夫们的感恩目光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足以补偿旅行艰辛的酬报。打伞的人们原本郁闷的脸也明朗了起来，他们开心地闲聊着，我们猜想他们正在用方言谈论我们，听上去并非不友好。

‘不合时宜的放纵与温和会破坏尊敬，’司各特先生说，‘但是，像旅行书上所说的那样，用鞭子把当地人镇住，那等于是在堆积炸药，为善才能让人走得长远。我们都是人，中国人并不比欧洲人低等。到了生死攸关的那一天，你不大可能会从你曾用鞭子镇住的人那里得到好处。’稍后，年龄最大的轿夫把司各特先生叫去，跟他商量时间。司各特先生为我们翻译说，考虑到我们付的工钱，轿夫们很犹豫，想提议我们下轿从这里走一段，直到进入峡谷后山路开始陡起来的地方。我们倒是不反对，因为这样可以欣赏沿途的风景。

我们在轿子上摇摇晃晃地穿过迷宫一样的峡谷。峡谷里的山壁有的破碎，有的陡峭，风蚀过的岩壁上满是裂纹和断层，呈现出古怪神奇的形状，峭壁上到处都是石灰。很多地方都有溶洞，传说古老的龙在里面休憩，直到国难当头才会现身。难道现在这灾难还不大吗？难道这灾难还会变得更深重吗？与可怕邻居的战争、与国人的战争连年不绝。你争我夺的军阀、咄咄逼人的警察，还有数不胜数的盗匪、新旧时代的碰



一九三〇年阿科瑟尔·欧伦森著《沿着中国的蓝色大河》。本书通过描写一次虚构的中国之旅介绍中国花卉。欧伦森本人从未到过中国。

撞，难道还有比这些更大的灾难吗？救世之龙出山的日子必定不远了。

有时候峡谷变得很窄，轿夫们不得不走在小溪里才能通过。也有一些地方很宽阔，就像咧嘴笑的谷地，里面的村庄院落和淡绿色田野沐浴在朝霞之中。花花草草上闪着露珠，空气里氤氲着玫瑰沁人的香味，散发着麝香和木香的两种玫瑰从峭壁上长长地垂下来，仿若鲜花绣边的绿色帘幕。可惜它们太脆弱，无法在丹麦存活，不过我们很快就会找到一些适应我们那里气候的玫瑰了。”

中华故国



孙中山（前）任命蒋介石（后）为黄埔军校校长。照片摄于建校日——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

中国的近代史是残酷的，二十世纪的欧洲史也同样如此，范岁久在柏林就曾经历过一些危险警报。然而相较而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欧洲并非风雨飘摇，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然过去多年，丹麦在这位来自中国的访客眼中就如一片和平绿洲，显得无忧无虑，很难看出有什么麻烦。范岁久来丹麦是为了学习知识武装自己，以期将来建设现代中国，可当时的中国却已无力给海外归国的莘莘学子一个明确的未来。欧洲享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短暂和平，而此时中国屡受战争侵扰，范岁久失去了归宿。自己的命运被这些他无法决定的事件所左右，范岁久受到相当大的冲击，他独特性格的塑成或多或少也与此有关吧。

范岁久年纪轻，对孙中山博士他并没有什么真实印象。孙中山是发动中国革命的同盟会的核心人物，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后，他被看成是当时中国的象征。范岁久自然知道并崇拜他，想来他和当年许多中国年轻人一样视孙中山为当时新生中国的国父。一九二二年，孙中山逃到上海，与共产党合作，开始重建以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为建党原则的国民党。孙中山于一九二五年去世，时至今日他仍然被敬奉为努力维护国家统一的新的中国的奠基人。孙中山所作的努力受到各方尊

重，他们由此暂停纷争，团结合作。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认为他是新的中国的奠基人。不过，继他之后的领导人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作出决定，与共产党决裂。

奉行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反对强大的外来势力——英国及其在中国的殖民活动尤为突出地体现了这种外来势力的影响。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另一项重大任务是统一中国。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间，国民党军队打败地方割据势力来到上海。一九二七年四月，国民党与上海黑社会组织“青帮”一起铁腕清扫了上海共产党工会。在这个深陷分裂泥沼的国家里，蒋介石选择南京作为新首都。他从上海北进并占领了北京，于是，一九二八年的中国至少在书面上是个统一的国家了。不过，外强中干的国民党政府内部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上海的大银行家们以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利息借钱给南京政府，大量敛财。政府在极高的程度上参与商业贸易，到处充斥着官员腐败和工作低效的现象。不过无论如何，一九二八年之后，南京政府几乎达成了国家统一，这也是中国人多年来的奋斗目标。表面上看，新政府似乎很现代，也愿意进行国家机制改革，行政部门被重组，新的政府大楼拔地而起，独立的立法、司法机构、监督国家机器的机关以及培训公务员的特别部门都一一设立。司法改革虽然已经启动，但政府系统却有着先天的弱点，那就是官员素质和管理机制低下。

最致命的问题无疑是政府对于改善农村生活水准和生存环境的重要性缺乏认识。自一九二七年起，国民党就定义其自身为反共政党，它虽然早已注意到了改革的需要，尤其是农业改革的需要，但该党已失去了本来的革命精神，同时缺乏一个可操作的社会改革方案。蒋介石的个人存在越来越明显地变成这个党和这个国家的中心，这事实上是一种独裁政治。

日本于一九三一年占领了满洲，一九三七年开始向中国内地进犯。



末代皇帝溥仪（后排中央戴眼镜者）与家人和大臣的合影。照片摄于一九三二年左右。日本人入侵满洲后，溥仪投靠了日本人，沦为傀儡皇帝。



蒋介石。约摄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伐之后。

国民党负有保卫中国的责任。尽管中国政府和德国有联系，但德国更愿意和日本结盟。国民党对日本人开展常规战，而共产党则组织广大农民进行游击战。沿海地区和大城市都被日本人占领了，而中国剩余的国土，所谓的自由中国，原则上由国民政府统治，共产党当时控制的地区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不久之后美国成为中国的同盟国，站在国民党这一边，越来越多地参与中国内政。

很快，国民政府就面临着双重挑战：日本人和共产党。共产党此时正在积极开展新运动。从长远看，这一双重挑战将逐步左右中国的政治命运。国民党的力量在抗日战争中被削弱，它推行的政策极其保守，以至于许多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对政府实施改革的能力失去了信心，转而投奔共产党。事实表明，即使只是面对那些地方割据的军阀，国民党也没有足够的能力维护其政权。

一九四五年，日本人被打败，此时的共产党已经相当强大。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夺得中国大陆并宣告中国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党原本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它不但有美国人的支持，还控制着大城市，但一系列的失误让蒋介石丢掉了统治地位，败给了共产党。反之，共产党的斗争基础则是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逃往台湾，在岛上建立了由蒋介石领导的几乎可以说是独裁的政治体制。在台湾，人们仍然能够研究老式的中国国家机器，只不过这个国家机器在今天有了新的民主内容。

家里传来的消息不曾间断，远在千里之外的范岁久体会着在祖国发生的一切。他和家中的老父亲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这是一个孝子应该做的。尽管一封信要用差不多三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到达，但这种有规律的联系仍能让他在重要的事情上获知父亲的意见。很多信件，我们甚至可以说，所有来自父亲的信函都被保留下来了。除了那些从回信中推

测出来的东西外，很可惜我们并不知道范岁久写给父亲的信的内容。间接猜测信函内容并非易事，而我们正是试图透过这些信函追踪中国的那段历史。只有一部分信件写有日期，但我们无法获知所有信函的确切发信时间。根据信件内容，我们尽量依时间顺序排列出以下事件，这个顺序应该是最为合理的。

简而言之，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父亲劝儿子不要在原定的时间回国。战争持续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五年间往来于中丹的通信被中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爆发了内战，范岁久一个人身处他乡，根本无法作出什么决定，在丹麦的留学继而变成了他一生的旅行。

阿斯蔻夫民校

范岁久在城市里长大，但他了解农村生活，很清楚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明白中国广大农民参与社会发展和积累财富的重要性。即便他在来丹麦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在丹麦的最初几年里也已经对之有了深刻的认识。丹麦的民校机制为农民接受教育提供了保障，从而确保了他们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近代丹麦有一段独特的历史，十八世纪丹麦废除了隶农制，取消了归属关系，之后的民校运动开启了文化启蒙运动，推动了教育的普及，一八四九年后官册不动产被取消，丹麦向私有制过渡，这一系列变革激发了农民的自觉意识，促进了经济发展。从有着地主和无地农民的封建社会逐步和平过渡到以平等为基础的现代农业社会，范岁久认为丹麦可以成为中国的榜样，中国能从丹麦近代改革中学到很多东西。那时他曾把丹麦社会和中国社会进行对比，认为丹麦模式在中国是适用的。即使受到一些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他在根本上更认同和平演变而非军事革命。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其发展必须通过农民来完成，而不是像马克思所宣传的那样通过工人阶级来完成。不过，在丹麦最初的几年里范



阿斯蔻夫民校。摄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岁久对丹麦工人运动及其所取得的成果还是充满着敬佩。

在丹麦，农民和工人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在中国，几乎一无所有的农民和工人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在饥荒的威胁下被迫工作着，这一对比非常强烈。范岁久认为必须要发起一场启蒙运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社会责任感的那些人首先需要意识到这一点，然后着手在农村展开启蒙工作，为农民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而斗争。这项艰巨的任务事实上正是范岁久在丹麦的最初几年里准备要做的事，他的想法听上去像是受到了些许共产党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团结和发动农民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国民党虽然也有一个民族性、全民性和社会性的方案，但是国家机器效率低下，而且该党的实力在长期抗战过程中消耗很大。

虽远离中国，但范岁久注意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原则上都是革命党，都希望建立一个新社会，而且国共两党在一九二七年决裂之前曾合作过，因此他仍然没有放弃两党和平发展的愿景。他希望中国可以像丹麦一样，在社区意识、合作运动和民校教育思想下去启蒙和创造财富。因此，在民校的学习对范岁久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他接触到了那曾经有所耳闻的思想，并且认为这一思想对于祖国的发展将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于像范岁久这样一个来自不曾经历过复兴的农业社会的人来说，格伦德维所倡导的民众教育绝不是高谈阔论，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丹麦第一所民校创建于一八四四年，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间，许多所民校纷纷成立。学校里开设丹麦语言、历史、宗教、艺术、手工等短期课程，许多大学讲师和艺术家们定期来学校教课，学时从一周、一月、一年到两年不等，课程结束时无需考试^①。民校向所有人开放，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学员们在学校里住宿，参加各种讨论，收获社会经验。

^①在当今更讲求竞争的社会里，民校不设考试的主张变得越来越难以实行。不过，对很多人而言，抽出一段时间去民校学习知识、结识朋友仍非常具有吸引力。民校是一种极具丹麦特色的教育机构，它也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教育模式。

阿斯蔻夫民校建于一八六五年，是当时丹麦最大最有名气的民校，可以说是民校中的楷模，其教育理念基于格伦德维关于启蒙和基督教的思想：先做人，再做基督徒。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之间的冬季学期，范岁久有幸就读于阿斯蔻夫民校。当时在校生由一百五十八名女生和一百二十八名男生组成。男女分住，范和前文提到的中国人林杰仁（Lin Jen Thney）住在一个房间。学校有一系列普通课程和专题讨论课程供学生选择，其中之一是“中日关系”，范岁久在上这门课时，讲述了很多个人见闻和见解。就远东时事，学校进行开放式讨论，当谈到中国问题时，学生们所表现出的开放和兴趣，是范岁久这一生在丹麦经历过的最正面的东西。课堂上的现场讨论最受欢迎，课前准备反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作息时间从每天早上八点到晚上七点，包括吃饭和课间休息。早上八点吃早餐，之后是早歌，然后是一个小时的手工劳动，十一到十二点上大课，十二点到十二点半吃午餐，一点钟自习，三点半到五点是咖啡时间和小组活动，六点半晚餐，七点之后是讨论时间，可自愿参加。

关于丹麦，范岁久要学的东西很多，其中包括理解《民校歌集》^①的文化含义。范岁久还记得他是怎样背出耶伯·奥凯尔的《我是燕麦》的，这首诗在当时是一个人了解丹麦文化的标志。另外，范岁久学丹麦语也很有成效，他在听和理解方面没有问题，但还不能进行很长的对话。通过在阿斯蔻夫民校的学习，他对丹麦有了初步的了解。校长阿尔恩弗雷德（J.Th. Arnfred）在他的阿斯蔻夫民校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的学生们：“当我回想起形形色色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那群人时，我觉得最能适应学校生活的恐怕就是中国人，要么是因为他们有着最强的适应能力，要么是因为他们的文化真的与丹麦文化有很多相通之处。”范岁久

^①歌唱和音乐是民校重要的教育活动之一，学员们唱的歌主要来自《民校歌集》，书中收录了很多著名丹麦歌曲。许多丹麦家庭都有这本书，人们在聚会时常会齐声高唱歌集里的歌曲。时至今日，对《民校歌集》的修订仍没有停止，不断有新歌被收录其中。

一定非常赞同这一说法，因为他认为丹麦和中国很相像，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回去以后都用得上。他说：“北欧人和中国人在根本上有着相似的道德观。丹麦社会看起来非常健康，所有阶层都相互尊重，人们明白什么是正确的生活方式和个人义务。”

值得注意的是，范使用“义”、“生活方式”和“义务”这些来自儒家的中国概念来描述丹麦的生活哲学，他用“和平”、“平衡”、“博爱”、“诚实”和“尽责”这些褒义词来形容北欧人。虽然丹麦人也用这些词来描述自己的民族特征，但是当一名外国人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出相同的意思，它听上去便更为真实。换言之：“如果所有国家都像丹麦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会有多么幸福！”

在档案馆里我们找到了一封信，这很可能是范岁久在阿斯蔻夫学习的时候写的，他在信里强烈抨击了在中国的美国教会学校和大学，说它们是美帝国主义意识的代表，只要是爱国的中国人就不应去那里学习。他厌恶那些受洗者，他写道：“我希望他们再也站不起来。”他认为中国人不应当美国化，他批评那些教会学校的学生穿西服、学跳舞和打高尔夫球，而不是花时间培养自己成为中国领路人。在他看来，除了个别例外，在中国的外国人都是坏人。他的理想是所有中国人团结起来正直地互相帮助。他在信中提到自己试图向丹麦人解释中国文化并与他们达成共识。“丹麦人，尤其是年轻的工人和学生都很踏实。”他写道。他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义愤填膺，也预见到日本即将侵华。当然，作为旅居丹麦的外国人，他是很有礼貌的，并不会言辞激烈地批评西方和日本，只在与亲人的通信中才会表达出自己真实的想法。

前面所引用的文字出自《阿斯蔻夫书1936/37》，书中他没有流露真实感情，而是以外交措辞讲述了他对丹麦的印象。他说：“我是一个外来者，刚到这里的时候，一点儿也不懂这个国家的语言、传统和习俗，自

然会觉得在这里生活非常困难，但是我把一切都处理得很好。我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向我微笑、非常友善和礼貌。是的，我说，住在这里我感觉很好，我把丹麦看成是我的第二个故乡。”“友善”是他对丹麦的第一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范岁久在丹麦发展得越来越好。在阿斯寇夫的学习完成后，他开始考虑回国的事情，认为现在应该是把两年来在丹麦学到的知识带回中国实践的时候了。在上面所引的那封信里他写道：

“……我的计划是唤醒人民。睡狮醒来时，它有着巨大的力量。我没有时间怯懦或置身事外，我要展示勇气并且在这一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将中国的学生召集在一起。”

如果不是因为中日关系恶化，也许事情就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一九三六年年底，家书中的担忧之情溢于言表，袁仲符在信中说此刻范岁久不应当回国，战争临近，政府开始征兵，范岁久是产业继承人，最好还是留在丹麦静观时局发展，不应回国做炮灰。在很多情况下，“稍安勿躁，切莫操之过急”都是一句箴言。

丹麦和中国

关于丹麦人对中国的态度，范岁久在《阿斯寇夫书1936/37》中这样写道：“然而在丹麦，我也经历了一些让我感到悲哀的事情，那就是丹麦人对我那遥远的祖国茫然无知，这仿佛是北欧人的一个祖传缺点，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中国古老、封闭、神秘，或者有多少奇妙的传说，可悲的是人们不认识、不尊重、不关注中国文化的价值。某些人关注中国的弱点，这在所有文明国家都很普遍。那些不顾及他人感受的猎奇材料只能引来人们的好奇，勾起一丝同情心罢了，这类东西只会对文化交

流、人际交流产生负面作用。反之，如果人们对外来的东西感兴趣的同时还能奉献出自己的价值，则是很有促进作用的。”

范岁久描述的丹麦人对中国的这种认识具有普遍性，许多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差不多都是这样，甚至在今天仍然如此。语言固然是一种障碍，可是就算抛开语言不谈，从总体上讲，要深入了解中国文化，要读懂那些名著诗词，要领会水墨画的意境，或者要认识儒家伦理的基本特征（这些对当今中国仍然很重要），都需要非凡的投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欧洲，中国的形象仍然非常模糊。中国艺术风格的物品于十八世纪进入欧洲，瓷器为人所知，除个别了解中国的人士外，大多数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也就到此为止了。在丹麦，瓷制的能点头的扫烟囱工和牧羊女，还有《夜莺》中那位说“早上好”的皇帝代表了中国。此外，中国还和米饭、黄皮肤、丹凤眼、红灯笼以及其他遥远的民俗关联在一起。这个国家离丹麦非常非常远，远到以至于人们无法对她产生什么看法，这正是范岁久所遇到的丹麦人对中国的态度：中国人有他们的东西，正如我们有我们的东西，如此而已。甚至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存在这样的想法，当时，那位在别的事情上都挺伶俐的前首相保罗·哈特陵访问了中国，并和毛主席进行了他称之为“知识分子水准上”的交谈。在这位前首相的回忆录里我们发现那其实只是场相当平常的、没有什么思想深度的谈话，这反映出他对于交谈对象为巩固自身的领导地位而做的事完全没有任何反思。

历史让范岁久成为来到丹麦的第一代移民，虽不是最早来此定居的中国人，但他仍是当时丹麦社会中的极少数。一九三六年年初，范岁久在丹麦迎来了第一个新年，庆祝新年的晚会上只有二十到二十五个定居丹麦的中国人。丹麦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在稍早前刚刚建立，一开始连固定的外交办事处都没有设立。最初的官方接触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个中国代表团来到哥本哈根，希望丹麦接受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中国人属于最早移民丹麦的人群，若从全球角度来看，他们其实来得很迟。丹麦人在自己的国家与中国人的第一次接触是在一场纯粹的娱乐节目里，这类节目利用“如此这般的中国人”来强调东方的异国情调，而不是由中国人参与协助去推广人们对这个大国的了解。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九〇二年五月，一个由三十四名中国人组成的团体在广东登上了宝隆洋行的船，被运往丹麦，之后作为真人展品被安排在趣伏里游乐园的中国展场中。这种在游乐园里展览不同人种的想法来自汉堡。在世纪之交，汉堡人哈根贝克（Karl Hagenbeck）进口中国人在动物园里作展览。丹麦人于是也有模有样地在趣伏里游乐园布置起了一座中国村庄，有庙宇、房子、旗帜、灯笼，以及其他营造中国气氛的东西。在这里人们可以坐黄包车，可以与真正的中国人合影。十三万五千多名游客到访了游乐园的这个新景点。这个景点中有一位可爱的小脚女士，她和村里的“画家”结了婚。一九〇二年六月五日的《政治报》报道：“画家很有吸引力。他那位妻子可是典型的中国美人，有着乌黑亮丽的长发，细致修剪过的长指甲，还有一双畸形的玩偶一般的小脚……她非常出色，即使在品位截然不同的欧洲人眼中，她依然充满魅力。”《政治报》的记者还简略提到了中国民间的信仰生活，写道中国人在庙里“……请求善的神灵护佑他们去抵制恶的神灵……”。

从移民统计角度看，这个中国展团的到访造成了一些社会影响。欧洲风情看来也很合中国访客的胃口，展团里有一半人留在了丹麦，有的在娱乐行业中签约成为雇员，有的则找到了丹麦情人，尽管这在当时是备受丹麦报纸警告和反对的。并非所有丹麦情人的父母都会为自己添了个中国亲戚感到高兴。多年后歌剧女歌唱家文孙邵玖（音译：Teijoh Wung-Sung）和范岁久谈起了一段家族往事。文孙邵玖是歌手雨果·西本（Hugo Sieben）的妻子，而范岁久曾有一段时间在雨果·西本那里学唱歌，因而彼此相识。一九〇四年文孙邵玖的丹麦母亲顶住了家人的强烈反对与文孙叁（音译：San Wung-Sung）结了婚，他正是那些被展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侨胞在中国驻丹麦公使馆前合影。

的中国人之一。邵玖（音译：Teijoh）十一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他没有教过她中文，于是范岁久成为了她了解中国文化的主要途径。每次演唱会即将结束之际，她都会唱一支短小的中国歌曲，这已经成了她的习惯。作家耶斯贝尔·文孙是文孙叁的曾孙，他在埃尔岛上的马尔斯塔尔长大。就像这样，来到丹麦的中国人开枝散叶，分布世界各地。

中国移民在之后的那些年里陆续进入丹麦，其中大多数是与丹麦人结婚并很快融入丹麦社会的中国商人、演艺家或者海员。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有更多的中国人来到丹麦，很多人从事服务业，比如开餐馆或者开商店，大多通过“家庭团聚”的签证手续留了下来。对于后来的中国移民而言，融合并不简单，许多人每天在餐馆或者烧烤店里辛苦工作，换取微薄的收入，与丹麦社会少有联系。中国人被认为是模范移民，他们不强调自己、不拖累别人，把注意力放在勤奋工作、适应社会和照顾家人上，不向国家提要求，并且对那些接受自己的人们展示出热情友好的态度。如果我们将其视作一种德行的话，那么他们的确是模范移民，不过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父与子

“有一次，老伯久候岁久兄的家信而不得，心烦忧急。他对我说，子女对父母有三种心：第一种是开心。子女能有所建树，光大门楣，处处能得父母之心意，所谓光意承志，爷娘满怀欢喜，而心为之开。第二种是使父母放心，也即是事事使爷娘安心，不为子女忧虑。第三种是担心。子女不能孝养爷娘，还在其次，反而在外面吃喝嫖赌，招摇撞骗，爷娘就要为子女的前途和结果担心。凡此三心，第一心不易得，第三心不愿得，取法乎中，还是第二种心，不失为中庸之道。”

这是范岁久的同学徐屏淮记忆中袁仲符曾说过的话。袁仲符认为，这么些年下来，范岁久已经是一个让父母开心、放心的儿子了。

父亲热切地关注着范岁久的丹麦世界。范岁久在中国的表弟周世南曾讲到袁仲符收到儿子来信时的反应。“岁久表哥去丹麦，他的学习和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但每次有来信时二舅父总是详细介绍，还把信拿来给我看，有时信内叙述不够清楚，就要百般推敲，多方猜测，真是人在国内，神驰海外。他对岁久表哥确是无限关怀，寄予厚望，而今岁久表哥在海外获得如此卓越的成就，如二舅父九泉有知，亦当引以为慰。”

尽管相隔万水千山，父子间仍有许多要谈论的事情。一封封家书说明了父亲对这个传承家族香火的长子的重视和关怀。钱是许多信的主题。一九三七年战争开始荼毒中国，父亲不得不停止寄钱，这令他忧心忡忡，接下来会怎么样？父亲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写道：“近国内与日本已入全面作战趋势，以后金融紧迫势所难免。”这迟早会影响到范岁久在丹麦的处境。他给了儿子两个建议：“汝宜早决，取决之途不外二种，一，汝在丹麦有暂能维持生活之策，二，不如趁我此次汇到之一千元即作返国旅费。”当然，如果范岁久继续留在丹麦，父亲自然也会设法筹款：“仍当为汝再汇寄，但须筹措到手方可算。”

类似这样关于钱的内容出现在很多书信中，有时候他责备范岁久用钱太多，有时候他寄钱过来，有时候则对儿子的开销用度提些忠告，又或者为范岁久找人借钱的事情担心。父亲不喜欢向人借钱，他非常在意还钱这件事，在一封信中他写道：“因余每一想到汝欠人之款究竟实数多少，在何时可筹还，必心猿意马、坐立不安。”欠债不还会严重损害一个人的信誉，父亲因此十分担心。

父亲也担心儿子的伙食够不够好：“你要吃好！”他感到范岁久在



一九三七年，日本军队登陆上海港口。

语言上不下功夫，非常生气地指出他的来信中“白字总不能免，如孰之孰字下无四点，汝竟加四点……汝犹白字乱写，无怪作文或记述”，这样的文字若是寄往报社，难免会遭到拒斥。这事让父亲很失望，他要求儿子多加注意，类似错误切勿再犯。我们也听说范岁久的父亲曾寄来茶、丝绸衣服和其他中国物品以及园艺和农艺书籍。在战争岁月中，有一次父亲写道，范岁久在国外的学习“对于救国来说就和那些在战场上苦战的人们一样重要”。关于范岁久的母亲，信中提到不多。有一次父亲提及她花钱太多，所有人都为此抱怨，他不知如何是好。



通过宝隆洋行范岁久收到从家里寄来的钱。图为一张250美元43美分的汇票。

父亲还提到为了答谢校长兰格（H.O. Lange）的帮助，应当赠他一幅国画作为礼物。椿一能帮他画一幅，但他拿不准校长是否会喜欢，于是在信中问儿子的意见，如果校长不喜欢，那就作罢。画的事情最后怎样我们不得而知。

范岁久在信中谈到参政的可能性，父亲有些担心和迟疑，因为参政就意味着加入国民党，可是国民党的公共形象并不好。他认为儿子最好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还在信中警告范岁久无论如何不要参加任何共产党的活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一封信中父亲谈起亲戚颂德因参与共产党活动在英租界被捕，自己于是拼了命去救他。人虽然是救出来了，但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因此父亲明确忠告：“尔当自知自觉对此种党派无论如何不许参加。”

在一九三七年的另一封信中父亲因为儿子来信里有抗日言论而警告他说：“事实昭告我辈是如此，徒事矜夸无益也。汝以后来信不必徒作血气之谈。”



DANSK RØDE KORS
CROIX ROUGE DANOISE
AMALIEGADE 18
COPENHAGUE

LUFTPOST
PAR AVION

Til Røde Kors' internationale Komité, Genève.
A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Genève.

FORESPØRGER — DEMANDEUR

Navn - nom *Van*

Fornavn - prénom *Sai-chiu*

Adresse *Strandboulevarden 32, Copenhagen,
Denmark.*

Meddelelse

(Ikke over 25 Ord. Indholdet måa kun
vedrøre personlige Familleforhold).

Dear father :-

*Have you any past-connection with
my mother? Are you well, and my brother
too? I have had a nice sommer.
your son.*

Dato - date *20 SEP 1943*

ADRESSAT — DESTINATAIRE

Navn - nom *Yean*

Fornavn - prénom *Chien-fu*

Adresse *5/125 Lire, Park Road,
Shanghai
China.*

Svar paa Bagsiden
(Man bedes skrive tydeligt).
Form. III-8-43

Message à transmettre

(25 mots au maximum, nouvelles de caractère
strictement personnel et familial).



reponse au verso
(Prière d'écrire lisiblement).
21 SEPT. 1948

一九四四年范岁久与父亲通过红十字会保
持书信往来，在上面这封信中范岁久向父
亲询问母亲的近况。

Meddelelse til Forespørgeren

(Ikke over 25 Ord. Indholdet måa kun
vedrøre personlige Familleforhold).

Gennem Røde Kors' internationale Komité, Genève.
Par l'intermédiaire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Genève.

Dear son

*I'm happy you have good conceteions
I'm sonry Miss Nielson is dead
Have you any girl friend now family
friends use very well
afyoun*



Dato - date



DANSK RØDE KORS
21 AUG 1948
CROIX ROUGE DANOISE

-7. JUL 1944

中国的战争

范岁久当然对日本人的攻击行为深恶痛绝，这种憎恶在阿科瑟尔·欧伦森那里得到了共鸣。对于交战的两个远东国家，阿科瑟尔·欧伦森完全同情中国一方，他是中国独裁者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她也是孙中山夫人的妹妹）的热情景仰者，他几乎将这两个人的结合看做是统治国家的理想范例。我们有理由相信，阿科瑟尔·欧伦森受到了当时一种政治风潮的影响，即崇拜那些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和能凝聚民心、振兴国家的政治强人。下面这封欧伦森的信体现出的可不仅仅只是少许政治天真，信中他表达了对命运多舛的中国的关切，然而世事的发展方向与他的预想完全不同。这是一封圣诞节前写给范岁久的信，日期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亲爱的范岁久：

谢谢你的那些来信，请原谅我很久没有回复。这个秋天实在太忙。我们最终还是没有卖掉往常所销售的那么多。不过让我忙碌的倒不是生意上的事情，我做了几个关于中国和日本的讲座，为了准备它们我花了很多工夫，所以很难得闲。

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医生曾说日本有精神病，遗憾的是，我可以说是欧洲的强权和美国把日本搞成了精神病。和所有的精神病人一样，日本人异常聪明，甚至可以说是狡猾了。日本的狂暴显示出她自己都感觉到她无法长久持续，日本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必须马上进攻，一年后就迟了。可是我敢说，就是现在也已经太迟了。只要蒋介石和宋美龄还活着，中国就会胜利，而且胜利应当属于中国。中国很幸福，这样的政治联姻在世界上前所未见。也许世界上曾出现过一个比蒋介石更伟大的政治家，比宋美龄更伟大的？也许吧，我不知道。再过五十到一百年，我们也无法得知。但无疑世界从不曾见证过这样一对奇妙的夫妇。日本也有些聪明的政治家，当中有一些甚至在某些方面比蒋更聪明吧，甚至



一九三七年日本飞机轰炸上海，遭到轰炸的有著名的上海饭店和部分公共租界区。

可说是狡猾诡诈了。不过他们目光短浅，肉眼凡胎，却竟然以为自己是某种神（从中可以看得出精神病！）。蒋介石和他的妻子虽然有着强大的能量，却深知自己不是神，认识到自己的不完美。他们与神生活在一起，了解神，得到了神的审视力。神看得长远，能看见千年之后的事，能看到时间的尽头。蒋介石和他的妻子虽然无法像神一样看得那么久远，不过他们从神那里学会了预见未来，比日本的那些个政治家们预见得更长远。日本有一位非常有远见的人，他叫贺川（音译：Kagawa），也许你多少知道他？他在日本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从不畏惧牺牲自己的生命。日本政治将导向何处，他看得很清楚，那就是导向毁灭。但是他对日本的军事党派没有什么影响力，也许过不了多久日本军阀们就会杀死他。这个人也在用神的眼睛看，看到了日本的错误和中国的正确。他坦言：我首先是上天的公民，然后才是日本的公民。有很多日本人和贺川想法一致，但无疑他们中没有人具备足够的力量。现在，如果日本军官们立刻认识到扑向中国的愚蠢，并且有军官切腹自杀，那么日本的军政氛围就会转变，这样一来，贺川这类人就会当权。但如果战争长期持续，以致日本的工人农民大规模饿死，那么共产党就有可能在日本赢得优势，血腥的革命便会接踵而至，这是很危险的。若真那样我们将彻底无法预料会发生什么事了。只要蒋介石、宋子文和孔祥熙活着，我认为日本要战胜中国就绝无可能。万一日本真的不可思议地胜利了，那事态也会向着蒙古族和满族当年的命运轨迹发展。日本从中国借来的文化要低级得多，所以，即便中国所有伟大的政治家都死掉了，日本好不容易赢来的胜利也会在五十到七十五年内被华夏文化征服，到了那个时候，日本就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了。历史一次次地重复着这样的事。

时机已到，日本将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从洋洋自得走向毁灭。据我所知，蒋介石现在正在广东组织军队，日本人怕这个。他们在香港附近公开聚集起一支舰队，目的就是要震慑广东。然而，日本这样做只会强化中国的防卫意志，正如最近空袭轰炸南京和广州之后发生的事情。日本算计着中国的心思和中国的军队，却总是打错算盘。恐怖政策是日



一九三七年九月，日本军队在上海附近展开攻势。

本做的最愚蠢的事，而现在空袭轰炸之类的恐怖策略却正是日本总参谋部的重点之一。日本肯定会一如既往地实施恐怖策略，直到全体中国人抗日卫国的意志变得灼热，直到全体中国人凝聚成坚不可摧的整体，而这正是孙中山毕生追求的。这证明了大师老子的话：坚强者死之徒。日本就很坚强，日本想通过恐吓把中国弄‘柔弱’，但这样做只会实现孙中山的计划：把中国人民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地团结到一起。莱西尔特（Reichelt）对一个采访他的记者说：现在日本把中国逼得要‘拼命’，可就算打败了中国的军队、毁坏了大城市，日本也断然无法把中国那巨大的生命力压制在自己的指挥棒下。一口吞下一大块能把人噎死，中国是打不垮的，中国醒来了！

你去年说，蒋介石准备把政府迁往重庆。如果他在广东的部队被日军打败，也许这事真会发生。现在政府暂时驻在汉口。很明显，蒋介石从一开始就预见了日军的进攻，而他的策略是拖延战争直至日本经济崩溃。日本人对他的恼怒证明了这个策略是正确的。日本视他为真正的敌人，单凭这一点，他就已经胜利在握。”

关于当时的战争形势以及“伟大舵手”蒋介石，阿科瑟尔·欧伦森先写到了这里。信的后半部分谈到了范岁久在中国的家人以及自己考虑提供给范岁久的帮助，这些帮助是他这个在位三十年的植物学校校长力所能及的。

“杭州的情况怎样？日本也轰炸了那里。你写道，也许你不会再收到父亲的家书，难道杭州和香港之间没有航船来往吗？筹钱继续学业的事情怎么样了？中国公使馆会帮你吗？如果你哪天完全没钱了，我可以借你一些，但数目不大，不够支付学费。我们装修浴室时太轻率，花的钱超出目前的支付能力。这个秋季的销售额比通常少，而植物学校的人却比往常多。但有件事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如果你父亲没能寄钱给你，你也没法筹集学费的话，欢迎你来我们这里住，愿意住多久就住多久，



蒋介石和妻子宋美龄。宋美龄曾在美国学习，是蒋介石的得力助手、顾问，负责政治宣传工作。图为蒋介石夫妇与外国随军记者。摄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南京。

完全免费，你来这里我们会很高兴的。如果你能来听讲那更好，只是我怕这些讲座对你来说太难，有很多生僻词，丹麦人都觉得难懂，何况是外国人，而这些词恰恰正是重点所在。

圣诞节你不过来我们很遗憾，本想着你来我们家还能安心读书。不过我很理解，眼下你不用把钱耗在这趟旅行上，旅费毕竟不便宜。

谢谢你借我孙中山的书。等我找时间让艾拉·劳格森把书带给我。
问候克里斯蒂安斯闵德路的拉尔森家。
我们全家祝你圣诞暨新年愉快。”

阿科瑟尔·欧伦森接着在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给范岁久的信里评论了当时的政治狂人，这段话多少带些宽慰的意思。

“历史上常有一个男人或者女人手中攥着好几百万人的性命，最近的十年里这种事屡屡发生。墨索里尼不疯狂吗？斯大林不疯狂吗？希特勒不疯狂吗？日本的将军们不疯狂吗？绝顶聪明的人总有些疯狂，常常超越极限。所以说理性虽是一种天赋，但它若不服从于另一个天赋的话，理性就会把我们引向毁灭。这个更高的天赋就是信仰。”

从一九三七年底开始，形势走向日趋明显，中国的情况不允许范岁久回国。战火纷起，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共同抗日，国民党正规军队与日军交锋的同时，共产党发动农民组织游击战，与农民的关系更加紧密。日本侵华扭转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我们当然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战争历史会怎样发展。日本侵略在中国造成了极其惨重的人道灾难。抗日战争中，中国的一些力量被削弱，而另一些力量则发展壮大。国民党政府接连犯错，导致了如今的历史结局。袁仲符在一封信中对儿子说，蒋介石有“好的意愿”，但是他“被地方官吏愚弄了，无法准确了解民情”。我们必须承认，蒋介石无法回应人们对他这位理想的

国家领袖的殷切期望，一九四五年之后，他成了大输家。他曾经手握王牌——国民政府、军队还有美国那近乎过分的推崇和支持。唯一能为他开脱的借口是，他并不是唯一一个错估形势的人，美国人也搞错了，他们原以为单方面支持国民党就能够在中国促成联合政府，从而调和国共两党的对立。没有充分了解中国情势的美国人高估了蒋介石，低估了共产党的突破力。一九四九年，美国不得不承认争取中国的政治目标落空了。



一九三九年的袁仲符。

这是一段漫长的历程。中国的抗日战争于一九三七年拉开序幕，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日本人占领了中国东海岸。一九三七年八月到十一月，持续四个月的轰炸对上海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中国军队最终撤退。城里的欧洲租界免受日本人的侵扰，范岁久的父亲在这里得以避祸。

杭州也难免遭到战火的荼毒，袁仲符的丝绸产业被毁，万幸的是，他的机械厂仍在继续运转。厂里约有三百名雇员，有段时间人数甚至更多。机械厂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间曾经历危机，重新组建之后又继续开了下去。日本人占领杭州后要使用厂里的一部分机器，工厂因此被迫关闭。抗战结束后，这家工厂缩小了规模，其产品用于制造丝织品和牙医用椅。一名早先的雇员说，一九四九年之后，工厂更名为“统一钢厂”。

一九三七年九月，父亲和他的一个外甥逃离上海，在於潜的丝场里躲了两个月后才得以返家。他回来后，化工厂这边又遇上了麻烦，日本人把硫酸产品列为军需品，禁止销售，袁仲符大量投资该厂的计划因此搁浅。范岁久的一位同学记得，袁仲符提起这件事时引用了古典小说《三国演义》里的一段话，诸葛亮想把某人烧死在葫芦口，但一场大雨让计划泡了汤——“这就像诸葛亮在葫芦谷”。对那些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能做的只有冷静对待。

在当时的首都南京，日军施虐屠杀了几百万中国贫民，从此臭名昭著的日本暴行在中国泛滥开来，造成了中国方面对日本根深蒂固的仇恨和持久的不信任。尽管存在着大量无法否认的证据文件，日本人仍然难以承认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令人发指的反人类侵害。

从中国传来的消息令人担忧，范岁久知道父亲仍在上海，而母亲在杭州的境况则不是很清楚。外甥女丽丽曾讲述范岁久的母亲施夫人在日本占领杭州时如何逃往乡下。母亲在浙南的时候，父亲也跑进了浙西的山里，夫妻间原本就极少的联系彻底切断了。母亲的日子过得极其贫苦。一九四二年她回到了杭州，后来在那里去世。

我们不知道袁仲符失去两个妻子后有怎样的反应，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得知范岁久的母亲已去世，他到底有没有在儿子面前谈起她的逝世。基于一些材料，我们觉得，在这种事情上他不会向外表露出自己的感情。大丈夫能承受损失而不屈不挠。虽然我们没能了解到袁仲符得知妻子亡故时的反应，但我们可以从他宽慰徐屏淮的话中略见一斑。徐屏淮是范岁久的同学，当他为自己年纪尚轻的亡妻深感哀伤时，袁仲符对他说：“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犹可补，手足断，不可续。男子汉不能以小误大，要自强振作，万万萎靡不得。”

农业大学

中国动荡的时局让范岁久无法回国，面对这一现状，对范岁久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利用在丹麦的羁留时间多学一些东西。通过在农庄的实习，范岁久对丹麦的农业有了初步的了解，接下来他希望进入农业大学，系统地学习农业理论知识。范岁久在申请入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小问题。根据这所学校的录取要求，申请者需要有两年的农场实习

经验，显然范岁久没有达到这一要求。在开明的兰格校长的帮助下，他最终被录取为全日制学生，但作为一名外国人，他每学期需支付二十克朗的手续费。学校生活不容易，范岁久的丹麦语能力有限，因此他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课前预习。范岁久所在的班级里大约有七十名学生，其中只有一名女生。范岁久注意到学园艺教育的女生要多些，他回忆道：“那里有三四个女生，我常常与她们在一起。女生们对我这个外国人很感兴趣。”范岁久显然对西方女孩也很好奇。



范岁久（第二排最左）和农业大学的同学们在鹿苑测量土地时合影。

农业大学组织的远足活动让范岁久受益匪浅，这些远足包括实践和参观全国各地的农业展览会。范岁久每每回想起在鹿苑调研时的那些轻松时光，心中就充满愉悦。需要实践的课程还包括饲养学、畜牧学和常规农业学等等。他觉得植物学很难，也不喜欢病虫害学。后来他开始创业时也尽量远离昆虫这类东西。

范岁久对歌剧和古典音乐非常着迷，因此他的课余时间基本都花在了这两件事上，他甚至去学过唱歌。每周六在斯卡拉^①吃午餐也是他周末的固定安排。当然，头等大事是学习丹麦语和专业课，练习语言和读懂教科书占据了他很多时间。学习按计划进行着，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是：毕业考试后又该做什么？

范岁久在与父亲的通信中谈及了农业大学毕业之后自己的各种打算，到底是回中国还是留在丹麦，这需要父亲定夺。父亲对范岁久选修的课程很满意，他认为这些知识在中国将会非常实用。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父亲写道：“你问我明年考试结束之后你该干

^①斯卡拉（Scala）是一栋著名建筑楼，位于哥本哈根西桥街，趣伏里游乐园的对面。斯卡拉始建于1882年，当时作为歌剧院使用。1957年拆毁，之后于1989年重建，内设电影院和购物中心。2012年斯卡拉大楼再次被拆，将在原址建设一栋集图书馆、会议中心和酒店于一身的新型大楼。



| 一九三八年夏，范岁久在农业大学。
图中背景为骨骼和标本。

什么，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重要问题。我的看法如下：一、我本来计划让你回国，开始做生意，可以先从小生意做起，然后扩大，这样你就不会依赖于别人。但现在处境完全不同了，没人帮助什么都做不了。如果战争近期结束，比如说明年，那么我们还是按这个计划办。二、如果战争继续，那么考试之后你仍需留在丹麦一段时间。只要有战争，中国就没有一块和平之地，而没有了和平和安全，你就不可能在任何地方找得到固定工作。你得赚些钱，把借校长的钱还给他。这就是我根据你叙述的情况所能说的，但我不知道丹麦的法律是否允许你工作。”

考试日期是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一九四〇年四月三十日，范岁久通过了考试并获得农学硕士学位。尽管土壤栽培学、工具机械学和普通农学的考试都按期进行，但丹麦当时被德国占领，这对在春天举行的毕业典礼多少有些影响，给打算庆祝的人们的欢乐心情蒙上了一层阴云。总体而言，考试进行得很顺利，只出现了两个小问题。因为语言理解上的错误，范岁久将“消化”和“吸收”这两个词混淆了。而在经济学的考试中，当主考官提议考生可使用第二语言答题时，也许是紧张的缘故，范岁久没问老师是否可用中文。但这一切都过去了，他以平均分6.66的好成绩通过了考试，成为名副其实的农学硕士。



1940年5月1日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毕业合影(前排右二)为范岁久

一九四〇年四月三十日，范岁久从农业大学毕业。翌日，教师和毕业生们合影。范岁久位于第一排右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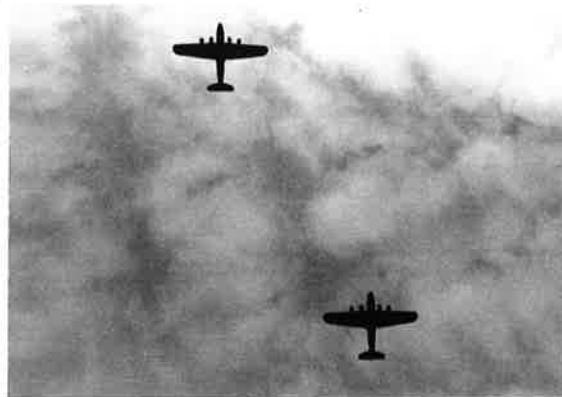
父子间的通信没有因为战争而中断，范岁久知道家里的情况。正经历着战争的父亲为儿子身在战火蹂躏下的欧洲而担忧不已，中国的战乱使他无法想象在丹麦人们竟然可以相对舒适地过日子。听到丹麦投降被德军占领后，他在信中流露出极大的担忧：“我闻丹国噩耗精神骤受刺激莫名痛苦，知意大利拟加入作战，又受一刺激，所以近日身体又如十年前之今日如生大病。”想到自己无法知道儿子将如何度过战争时期，父亲内心备受煎熬。父亲焦虑的另一件事情是儿子要如何筹还所借钱款。在德国占领丹麦的时候，范岁久正在寻找工作。儿子未卜的前途令父亲心中焦灼万分。

范岁久毕业之后首先受雇于FDB在托斯特鲁普的实验农场——欧托夫特皋农场，做实验和育种助理。在离职的时候，他得到这样的评语：“一个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有才华的年轻人，具有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极强的工作技能，性格友善合群，招人喜欢。”

父亲曾为范岁久是否能找到工作而忧虑。范岁久告诉他，在被德军占领下的丹麦，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干扰。一九四一年，范岁久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父亲终于松了口气，在信中写道：“知汝已到丹京就新职位，并欣知此合作社所设之化学实验室设备先进且齐全。”他觉得这份工作可以丰富儿子的知识和经验，感到很欣慰。

范岁久在国家植物培植实验室得到了一个临时职位，主要从事青贮饲料的研究工作。因其极强的工作能力和专注力，他得到了极高的评价。他很擅长绘图，他所画的图被称为“农学考试中的最佳作品”。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范岁久受雇于丹麦国家土地发展局，并在这里工作了两年时间。工作内容就是骑着自行车在丹麦各处巡视排水工程、河流和沼泽，控制寄生性的土豆根线虫的产生，他在学校学到的有关害虫和植物病的知识在这里派上了用场。父亲在信中除了嘱咐他照顾好自己，骑自行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外，还写给他一些忠告：要学会吃苦耐劳，做事要善始善终。伴随着父亲的关爱和叮嘱，范岁久顺利完成了这份工作。雇主对于他“适应完全陌生环境的非凡能力”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在推荐书里这样写道：“（他）非常善于交际，有不服输的精神，擅长于他所从事的工作，尤其擅长绘图。”



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范岁久和其他哥本哈根市民经历了德国飞机的轰炸。军机飞过城市上空时，范岁久拍下这张照片。当时，没有人知道德国的占领将意味着什么。丹麦很可能被吞并，成为大德意志国版块里的一部分。德国战败的可能性在当时看上去微乎其微，因为德国已经占领了除英国之外的绝大部分欧洲。在那段艰难岁月里，丹麦人民经受了许多社会管制，好在没有人挨饿，也没有出现物资短缺，人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范岁久从农业大学毕业后，本打算回国，帮助中国的农业发展，但他最终留了下来，作为一名农业顾问在丹麦工作。

证书学生

在国家土地发展局的工作使范岁久增长了见识，但从长远看，他并不满足于骑着自行车四处巡视，而是希望学到更多农业理论知识。一九四三年一月作为一名证书学生（相当于今天的博士生），他再一次进入农业大学继续深造。早先借兰格的钱已经还清，但这次他不得不再向兰格开口。对方又一次慷慨相助，并安排范岁久住进了北欧学生宿舍（Nordisk Kollegium）。考虑到范岁久的经济状况，在兰格的帮助下，宿舍负责人同意范岁久延缓支付租金。北欧学生宿舍由北欧羽绒（Nordisk Fjer）在一年前资助建立，主要用来接待和安置从其他北欧大学来的访客们，范岁久能住在这里可说是非常幸运了。作为回报，他帮总领事翻译中文电报和寄往中国的邮单。通过总领事馆，他有机会读到有关中国的报纸。



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间，范岁久住在北欧学生宿舍。宿舍楼位于海滩大道，由建筑师坎普曼（H. J. Kampmann）设计。

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美国的帮助。一九四二年初，中国的局势开始变得光明起来。袁仲符认为，现在又该考虑范岁尔回国这件事了。在一封可能是写于一九四三年的信中，他写道：范岁久最好能在四十岁之前在中国为自己的事业打好基础，否则就难以立足创业。同时父亲提到，儿子也可以考虑在丹麦定居，“但我们中国人应将中国作为我们的根基”。范岁久也很想回国，然而战争在欧洲扩大，通往中国的陆路交通中断，他只得留在丹麦。父亲很清楚乘船回国极其危险，他写道：如果英德法间的战事延续，坐船航海回国会很危险。他在许多报纸上读到，不少中立国的客轮遭到了袭击。他告诉范岁久：与其明年考试前回国，还不如等到战争结束后再做考虑。

范岁久不可能再收到家里寄来的钱，幸亏有兰格慷慨解囊，靠着从他那里借来的钱和自己工作时攒下的一点点积蓄，范岁久可以养活自己。父亲对于儿子借钱这事很是担忧。

北欧学生宿舍的监管人是著名的教会历史学家、神学家哈尔·考克。对于德国占领丹麦，他毫不畏惧地宣传自己关于民族责任的观点，但他对武装抵抗持怀疑态度，因此是政治合作主张的支持者，在他看来这是挨过战争的唯一现实的做法。在丹麦被占领的最初几年里，他作为“丹麦青年合作会”的主席而闻名，他的演讲和他组织的歌唱比赛成为反抗德国占领的民族抗议活动之一。哈尔·考克经常去学生宿舍，参与学生们的讨论，范岁久因此有幸近距离接触当时这位丹麦的风云人物。

哈尔·考克和几名学生引起了德国人的注意。因为怀疑有学生参与抵抗运动，德国人会对学生宿舍进行突击搜查。范岁久没有积极参与这些活动，他说：“我是不敢去试的，作为中国人，我太容易被人认出来了。”他记得一天早晨“听见走道里的靴子声，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被子完全拉过头，假装正在睡觉，奇怪的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这次搜查很可能发生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三日，搜查的理由是德国人怀疑一些学生参与了枪击事件。其余的时间里，学生宿舍里的生活和大多数丹麦人的生活一样，没有受到德国人的太多影响。学生们讨论时事、和女孩子约会、参加聚会。某天凌晨，一场聚会结束后，有些学生意犹未尽，竟跑到鹿苑坡地的游乐园里，想要坐过山车。范岁久没有去，但他听说游乐园的工作人员穿着睡衣匆匆忙忙跑出来，与警察合力才把这些醉意阑珊的学生们送回了宿舍。

伊丽莎白·纪兰德—布兰德

“他在丹麦待了八年，因此他的丹麦语讲得很流利。让我感到非常吃惊的是，一个中国人居然知道在威勒的郝茵·胡勒有一些大坡路，人们可以骑车上上下下。后来我才得知，他在农业部工作过，曾骑着自行车去过日德兰半岛的很多地方检查土豆根线虫。”

这是阿格尼丝·伊丽莎白·纪兰德—布兰德对范岁久的第一印象。她那时刚刚从师范学院毕业，正在威勒的一所学校做临时代课教师。一九四三年的寒假，她回家过圣诞节，顺便探望了她的哥哥约尔根·纪兰德—布兰德。约尔根在学生宿舍认识了范岁久，他邀请范岁久一起徒步旅行，妹妹也来了，就这样结识了范岁久。一九四四年一月，伊丽莎白结束了代课教师的工作，回到家中便看到一封范岁久的来信，信中间他们是否可以再见面。两人的交往由此开始。一九四五年他们决定结婚。伊丽莎白的家人很喜欢这个有魅力的、讲着一口流利丹麦语的中国年轻人，但他们对这对新人的未来有些担心：范岁久也许很快就要回中国，也会把伊丽莎白带走。范岁久决定结婚之前征询父亲的意见。父亲在回信中写道：并不反对儿子娶丹麦媳妇，只是她应是个谦恭贤淑的女孩，因为只有这样的女子才能和谐地与中国文化共存，但她若不懂得节俭，只知挥霍，那么早晚会有招致麻烦。

在后来的一封信中父亲这样写道：“汝已与丹女子成家立室，并道及家庭生活甚为欢乐，然何学校毕业、年龄、家族状况均未提及，下次来信时务宣告知为妥。”看来范岁久在信中很少谈到伊丽莎白。

袁仲符也许希望儿媳妇能符合中国女人的理想标准：勤俭持家，不抛头露面。很显然范岁久并没有告诉父亲，这位年轻的丹麦妻子受过良好教育，还有一份工作。

婚礼于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八日举行。当时丹麦仍处于德国占领之下，纪兰德—布兰德家与抵抗运动组织联系密切，伊丽莎白嫂子的哥哥在不久前刚被德国人处决。三月二十一日壳牌大楼被炸，而在对法国学校的误炸中有许多人丧生。在这些事件的阴影下，婚礼悄然进行。

范岁久和伊丽莎白搬进了东桥区一所三室一厅的公寓，他们用了其

中两间房，伊丽莎白的一位女性朋友租住了第三间。范岁久和伊丽莎白每天骑车上班，伊丽莎白在希勒若普的玛格勒皋学校教书，范岁久在农业大学学习。他们一起经历了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晚上的欧洲解放庆典，任何经历了那一夜的人都终生难忘当时的情景。

同年，范岁久结束了学业。

“除了小麦之外，稻米是谷类中最古老、最重要的食品，几百年来它满足了世界上差不多一半人口的营养需求。”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范岁久提交了遗传学专业课的论文，该论文相当于如今的博士论文，只是篇幅稍短。论文的标题是《稻米植物的遗传条件和细胞学的研究现状综览》，这个课题属于微生物学和遗传学的学科范畴，研究主题是水稻。范岁久以已有的资料为基础，对一系列不同类型的稻类植物及杂交品种作了彻底的研究。在德国人占领时期，要找到相关文献非常困难，这篇论述翔实的论文因此得到了很高的分数。

当年他获得的这个文凭被称为“证书学位”，相当于今天的博士学位。学生时代已经结束，现在要开始找工作了。

或者，该回国了？

一九四五年父亲在信中又提到这个话题。

“八年抗战使我血汗经营之事业毁于一旦，生活费用比战前涨了千倍。椿一不自奋斗，我只能终日奔走，幸而身体还能支撑。汝已刻苦学成一面，又能孝心对我，这乃是最近我心中最引以为慰的事。汝若能归家，我即把所有生意产业交付于汝，袁家和范家的继承人当汝莫属。目

前一家人变卖家产过活，情况虽有好转，但并非长久之计。我不愿变卖所有财产而济汝一次之用，望汝明白此心，即便能购来一张单程船票，奈何媳妇的川资无有着落。每思及此，我便觉自己应不以一己之身为念，该当多多努力。”

父亲的精神状态很好。一九四五年后的一段时间里，范岁久的一位表弟常去看望住在上海梅福里路的袁仲符。表弟回忆道：

“……因而经常进去坐一二十分钟，谈话内容广泛。他有时也到我家来闲谈，我总留他便饭，并特地买来黄酒款待，这是我父母在世时的惯例。二舅父一喝酒，话就多了，什么都谈。我知道二舅父有时虽然很严肃、不苟言笑，但有时却是妙语连珠，谈笑风生。”

范岁久父亲当时已年逾七十，仍奔波于上海和杭州两地之间，显然已力不从心。他一方面希望儿子早日归来，另一方面又困惑于儿子回来后到底能干些什么。

丹麦还是中国？

取得学位后，范岁久马上在梅地希纳尔科（Medicinalco）的微生物实验室谋得了一个职位。父亲得知消息后为儿子终于能自食其力而感到高兴，他也开始为范岁久留心国内的工作机会，他写道：“汝回国旅费一节，我每日觅方想法，半月前由颂熙转来邵力子君复言。”邵力子建议给范岁久在农林部里谋个职位，然后借赴任之名由农林部出资召范岁久回国就职，这与教育部出资有所不同。邵力子“嘱我再写一信与张群先生，此信我亦写去，且看下文如何”。

对于让中国教育部支付范岁久的归国旅费，父亲十分怀疑其可行性，因为接受这样的资助就像是“喝盐水止渴”，他宁可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父亲在信中提到，一九三五年范岁久离开中国时，并不是正式登记在册的出国留学生，可能因此会在教育部遇上麻烦。与此相比，父亲更热衷于他去农业部工作的想法，他想动用一切关系设法办成这事。范岁久计划于一九四六年春天回国。

弟弟椿一对未来的憧憬也被唤醒，一九四六年一月他来信说很高兴将和哥哥重聚：“沪上生活较战时高千万倍……弟今与双亲大人住一起，弟媳及侄女均好，最近并无固定职业，到处贩货但运气欠佳……故衣食仍依累双亲，愧甚。”

后来弟弟得到了一份办公室的工作。他的妻子也在工作，父亲不喜欢，觉得她“不听话，不像个媳妇样，惹我烦”。中国内战结束后，椿一家境况艰难，他不得不在工厂里做工，过着和范岁久完全不同的生活。一九七二年范岁久第一次回国的时候，椿一费尽周折才获准去见自己的哥哥。

回国计划最终不了了之。中国形势持续不稳，这之后的书信不再言他，均在讲范岁久应当留在丹麦。如今他在这里有了家庭和稳定的工作，在奥德如普还有自己的房子。一九四六年八月份父亲来信说：“我国政府一味腐化，不求自立，因之地位日降，受人轻视。回国的事情，思前想后，反复思量，唯有选择先后，用以取舍。在国内某一政府部门任职或者做技术工作没什么意义，不但得不到新的经验反倒还会在学术上退步，更何况每月薪金也不足以养家。或者尝试进入官办事业，比如农业部门或实验所，但这样的事业单位太小，经费太少，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人发挥才能和所学。目前政局尤其混乱，更无稳定工作可言，故不如缓归为上。”

一九四五年后，国际形势有所好转，至少在欧洲是这样。然而中国却在日本投降后爆发了内战，回国还是不安全，仍需等待。就算范岁久曾认真考虑回国的事情，一九四六年八月份父亲的那封信也会使这个计划被搁置起来。在丹麦，他有工作和家庭。如果回国，妻子并不能立刻融入自己在中国的大家族，而他在中国也几乎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更何况收入是否够养家糊口还成问题。这个小家庭也许要移居到遥远的中国去——丹麦岳父母对如此令人不安的未来忧心忡忡，这不难理解。尽管后来有很多亲戚唤他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范岁久最终还是留在了丹麦。

在梅地希纳尔科（Medicinalco）工作的那些年让范岁久受益匪浅，他的工作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他认识了一起在此工作的实验室主任即后来的教授、医学博士埃瑞克·雅可布森。此人在几年后与药学硕士彦斯·哈尔德共同研发了对酒精产生作用的安塔布司（戒酒硫），并将其用于戒酒，因此颇有名气。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范岁久深受启迪。这份工作还让他能学以致用，范岁久和抗生素打交道，检验用于制药的各种产品。同时，他在埃瑞克·雅可布森的带领下研究维生素B12。

范岁久在梅地希纳尔科实验室一直工作到一九六〇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宝隆洋行麾下的多美滋购买了梅地希纳尔科企业，范岁久的工作条件随之发生了变化，他对此不是很满意。关于当时的情况，范岁久在一九八五年这样写道：“我们这些梅地希纳尔科的老员工，觉得自己多多少少被忽视了，升职的前景一片黯淡，因此自一九五七年起我就开始考虑另找工作。一九六〇年，在还没找好下一份工作的情况下，我就辞职了。”

辞职后范岁久继续在多美滋做兼职咨询顾问，月薪五百克朗，与此同时，他也开始了新的研究项目。这样一来，他既有一定的经济保

范岁久、妻子伊丽莎白和幼小的
丽生。摄于一九四六年。



障，又有时间从事自己的项目。这个项目很快就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一九六六年他辞掉了兼职工作。

家庭生活

一九四六年初袁仲符在信中写道：“长媳已孕数月，约在四五月间分娩，孙儿的到来慰我老境之心，这孩子应继承范姓，如果有第二个孙儿则姓袁，之后若有更多孩子，则都照此例类推。”这封信收到后不久，家书又至：“生男生女都应速即告知以慰远念。”

一九四六年四月，女儿出生了。她的名字是袁仲符起的，唤作“丽生”，依其发音，对应的丹麦语名字叫Lissen。

伊丽莎白的父亲克里斯蒂安·纪兰德—布兰德给范岁久的父亲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说伊丽莎白生了个闺女，并表达了自己家因为有范岁久这个女婿而备感欣悦之情。信中他说范岁久是个“杰出的中国男儿”。

一个月之后，袁仲符的回信到了。

“我亲爱的亲家父，纪兰德先生：

一直以来我很想给您写信问候健康，但是生活和生意琐事甚多，使我拖到现在，我深感抱歉。

昨天从杭州回上海的路上，我再次展开了您写在美丽信纸上的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您强烈的情感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欣喜地获悉您阖家康宁。

您接受了我们微薄的家财和我儿子所达到的菲微成绩，愿意把女儿嫁给他。这场婚姻结合了两位成长背景和民族文化迥然不同的年轻人，它无疑将成为中西合璧的榜样。

我希望他们彼此扶携，夫唱妇随，比翼双飞，丈夫勤奋工作，妻子贤淑持家。您的家庭将会和谐兴旺。

我们也欣喜地获悉儿媳于上月二十八日产下女儿，母子平安。我们要向亲家您表达万分感谢，您在时间上、经济上给予了这对年轻夫妻很多照顾。我们常常想，儿子在丹麦得到了那么多关心和善意，真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报答。

眼下我们只能通过书信传达对彼此的敬意和问候。希望国际形势能马上好转，交通也能恢复正常，到那时我们一定邀请亲家您来我们国家，并亲口致以诚挚的谢意和感恩。

最好的问候

袁仲符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七日。”^①

一九四九年三月，儿子出生，范岁久为他取名“本德”。这两个汉字合在一起，其发音对应的丹麦名字是Bent。儿子的诞生意味着家族香火得以传承，这对中国人来说意义重大。伊丽莎白·范仍然记得儿子出生后第二天，范岁久要去中国公使馆吃晚餐时的自豪感，在那里他将向人们宣布自己有儿子了。父亲在听说长孙的名字未定时来信说他觉得孩子应叫“汉丹”，不过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一九五六年次子汉明（Hemming）出生了，“汉明”的意思是“中国之光”。

范岁久的父亲收到了从丹麦寄来的照片，至今家人还记得袁仲符为他的丹麦亲家和孙儿们感到自豪的神情。这些照片被家人和亲戚们看了又看，一大家子一直关注着远在他国的亲人。

范岁久一直对摄影很感兴趣。这些年下来，他已经成了一位出色的



一九五三年二月，范岁久入丹麦国籍证明书。丽生和本德之前一直为中国籍，他们从这天起正式成为丹麦公民。丽生记得，她和弟弟共享一瓶汽水庆祝这一天。

^①此信的中文内容是由丹麦语原书中的丹麦文字再次翻译成汉语的。原函请见附录一。



在那些年里，范岁久
很少给父亲写信。这
是一张袁仲符寄来的
明信片，向儿媳询问
儿子的消息。

Dear Elizabeth:

I have not received letters from my son for a long time. (more than three months)
I am eager to know how is his condition recently. Please give me a reply as soon as possible.

With many wishes, I am
your father-in-Law,
T. V. Yuan

肖像摄影师，经常为家人、朋友和同事拍照。范岁久当时住在奥德如普的狩猎路，有两间半房，厨房很小。铁匠法格贝尔（我们稍后将谈到他）帮他做了一个折叠式的移动显影室，这样范岁久就可以在厨房里洗照片，洗完后再把显影室折起来收好。

中国的命运

一九四九年本德出生后的第二天，范岁久受邀参加中国公使馆举行的一场晚宴，那场晚宴是为了庆祝陈大使到任。公使馆于一九一三年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关闭。一九四七年公使馆恢复后，新公使被重新派到丹麦。范岁久在丹麦的这些年里和公使馆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帮忙做翻译及其他事宜。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后丹麦即承认新中国政权。由于政权更迭，公使馆里的工作人员从此不再代表新的中国政府，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选择回国，走向不确定的命运，另一些人则选择留在丹麦。

这时还没人知道共产主义会带来什么，范岁久一开始以为共产党会统一中国并带领国家向前发展。他在《日德兰邮报》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的采访中说：“那时我们和共产党一条心。在我们眼中，共产党是唯一能统一中国的人。”他也曾帮助新政府整修新的大使馆。丹麦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而中国也早在一九五一年就已经往丹麦派出使节代表了。

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之后，陈公使偕妻子及五个女儿回国。他还有一个女儿，名叫帕特丽希雅，一九四七年时得了小儿麻痹症，曾被送往美国治疗。陈公使被派驻丹麦时，把她也带来了，她在小儿麻痹症研究

所接受专家治疗。回国前，父母考虑到中国的未来太不确定，决定把她留在丹麦。范岁久决定做这个女孩的监护人。虽然他事先没有征询妻子的意见，不过伊丽莎白自然是同意的。一九五〇年一月份，她抱着帕特丽希雅和范岁久一起在哥本哈根中心火车站送别陈公使一家。这家人的前景令人担忧。与陈的想法截然相反，回国后没人想用他这位拥有国际专业知识的前使节，作为前政权官员，他的财产被没收，他本人则深受怀疑。若干年后，一家人试图从澳门离开中国，但没能成功。陈在试图搭船去香港的时候失踪了，他的妻子和女儿们幸存了下来，后来成功地与范岁久取得了联系。帕特丽希雅在丹麦长大，一直和范岁久及其家人关系密切。

范的父亲袁仲符也深受新政府的怀疑，起初还风平浪静，但随着一九五一年的到来，作为“资本家”的他成为了新体制的敌人。尽管他在较早前的那个时代里曾经是位革新者，为国家创造了财富，作出了贡献，可如今这些都无人再提。

“一九四九年后情况又有变化，新的人民政府为了改变旧中国的落后面貌，要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做彻底革新，民族资产阶级因此受到限制，面临改造。二舅父大半辈子生活在旧社会里，虽然他的思想还是向前的，但终究年龄不饶人，难以跟上新时代，适应新形势。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杭州，每次来沪，我只觉得他黯然无助。我问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他却总是摇头。”

表弟周世南描述的是新时代里的袁仲符。意识形态的潮流冲击着历史的河道，清除旧有沉积物。袁仲符被迫面对这一时代对他生平心血的毁坏，他无法承受，最终崩溃。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间打击官僚、地主、资本家的政策极为沉重地打击了袁仲符。为了整饬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军队、党派中的道德风气，“三反”运动的确打击了贪污腐败、浪

费和官僚主义，然而它也导致了很多人的灾难命运。同时开始的“五反”运动开始针对此前尚得苟安的资本家，任何雇主都有可能被检控，袁仲符也被送上了法庭。运动的发展开始与运动的初衷产生了出入，指控各种各样，从贪污腐败、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物、偷工减料到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些指控可以安在任何人身上，目的自然是迫使资产所有人让出他们的工厂，从资本家那里把钱要回来。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通过指出共同的敌人来实现团结，同时要肃清那些被视作是革命障碍的有害公民，并从那些检举揭发自己前雇主的人当中发展党员。

不管什么人，只要曾开业做过生意就会成为政策改造的对象，而独立开业的人很多，袁仲符就是其中之一。他妹妹的孙儿回忆袁仲符生命最后的那段日子，说道：“只要他在上海，就常来我家。有一次他老人家神色很忧愁，对我说：‘这次来不是什么好兆头，以后可能不会再来了。’当时正值‘三反’、‘五反’运动，二舅公作为资本家一定会受到冲击，我就宽慰他说：‘事情总会弄明白的，至于目前有什么困难，我们这些小辈都会帮忙，你老人家不用担心！’他走后我越想越不放心，第二天一早就去他家看望，见他老人家与平时一样，我也就放了心。不久他便去了杭州。过了一段时间，噩耗传来，他老人家已在杭州谢世，我闻讯后不禁痛哭失声。”

袁仲符实在厌倦了，他受不了如此逆境，无法忍受群众运动中遭受的人格侮辱。他在池塘里投水自尽，被人救起，不久后，于一九五二年七月七日死于投水引起的后遗症，终年八十岁。

来自袁仲符第四位妻子的信给范岁久带来了父亲的死讯。继母张启明生于一九〇六年，比丈夫小三十四岁，只比范岁久大六岁。张启明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化学专业学位。青春期时她曾有过一个恋人，但恋情无果而终。她失去工作后和袁仲符结了婚。袁仲符在抗日战争中失去了



一九四八年从中国寄来的家人合影。图中后排为范岁久的异母弟弟椿一和他的妻子，前排是范岁久的父亲和继母启明，中间是椿一的两个孩子。

前两个妻子，和张启明相遇后不久两人便决定结婚。

信中说，袁仲符已在杭州去世。当时继母在上海，收到电报说袁仲符出了事便立刻赶去杭州，在他去世前的最后一刻赶到了他身边。

当天她写信告知范岁久袁仲符去世前后的情况。

“最近半年里你父亲的精神压力很大，因为茶厂的案子、厂里的‘五反’运动和其他问题，他每天都被人骚扰。他不堪其扰，看来是想一死以求解脱。悲剧发生之前，他对亲友说，生活中再也没有比想要寻死更惨的了。我们劝他、照看他、守着他，但还是没能阻止这件事情发生。他们对我说，他最终决定自杀之前，曾去了三次小天竺，又去了一次至木。太悲惨了。”

听到这噩耗，你肯定悲痛欲绝，不用说，父子之情永难忘怀。但我还是希望你节哀，与你的家人一同度过这艰难的时刻。我和你父亲做了十年夫妻，生活并非就此停止，可是没有了我们的夫妻之爱我又该如何活下去？在我的余生里，我又到哪里去寻找他曾经给我的慰藉？一想到这些我就伤心，越想越伤心。这伤痛是那么强烈，仿佛快了我的命。可生活仍要继续，尤其是必须有人来料理后事。

我仍和椿一家生活在一起。家里经济十分拮据，菲薄的收入只够买一百公斤米，勉强够一家五口人糊口，至于其他花销，诸如孩子的学费和清波门的房产税、地产税，仍然没有着落。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除了同舟共济，想办法共渡难关之外，也无他路可走。

在我嫁给你父亲的这十年里，他与上海、杭州和其他地方的亲友们合做生意，其中经历了一些苦处。他每天梦想着黄金，最后却失去了全部积蓄。我好几次试图劝告他，但都没有用，最后不得不放弃，不再管他的事情。尽管现在已经太迟了，我仍后悔自己没能阻止他，常常自责。在他的学习手册之上有遗笔二句：烦恼最闷人，金尽最苦人。可见

他的痛苦就是在这事情上。

你父亲一生朴素，他的葬礼也很简单，只花了差不多三百万元（约一百五十美元），这都是亲戚朋友们凑出来的钱。墓地就在东岳乡杨家牌楼的青龙山上的罗景仁老伯坟旁。罗二哥很仗义，让我们用这块地，但我想，我们以后要按价付钱给他……

答应我，你得知这噩耗和你父亲生前的惨淡生活后不至过于悲伤。如果可以，请经常来信，我们能像一家人那样保持联系是你父亲的愿望。他每次收到你的来信，尤其是丽生和本德的照片，都拿去和亲友们共享这份快乐。他从不掩饰对你的想念，只恐此生再难与你相见一面。有时他凝视着照片喃喃自语，然后转过来对我说：“好婆……岁久……”一家人分离，无法团圆，这多么悲惨。

有朝一日能再度团圆的希望也许是治疗悲伤的唯一药方，但愿这一天能在我有生之年到来。

我觉得心灰意乱，头昏眼花。字不成行，还望见谅。草草搁笔于此。

愚继母袁张氏泪书”^①

关于袁仲符辞世前后的情况，范岁久的外甥女丽丽做了些补充，说他在工厂附近的池塘里投水自尽。在此之前他曾让妻子在上海筹钱来满足政府的要求，但她没能弄到钱，袁仲符在绝望中去世。

一九四九年之后，丹麦和中国的通信日益困难，好在家里人和浙江大学图书馆关系很好，而图书馆有与国外联系的许可，通过这条途径，书信在最初几年里还能寄发和收取。但这也变得越来越难，在寄到丹麦的最后几封信里，范岁久几乎不能从字里行间察觉到父亲的艰难处境，那个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令人震惊的噩耗传到丹麦，范岁久没能再见父亲一面，没能按照中国习俗在父亲的最后时日里在病榻前尽

^①这并非原信中的文字，而是由丹麦语文本中的丹麦语翻译再次转译成汉语，因为复印件边缘部分缺失，所以取用译文。原信复印件请见附录二。

孝，这毫无疑问是范岁久心底里一辈子的痛。

内战结束后，尤其是父亲去世后，中国对于范岁久来说已经不再有什么值得他回归的了。父亲的产业不复存在，而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儿子，在新中国也不会有什么机会。截至一九五二年，他在丹麦已经住了十七年，在这里扎下了根。他申请了丹麦国籍，这里成了他的归宿。

继母在后来的信中讲了许多中国的进步。当然，那时中国人给海外写信，措辞是相当审慎的，政治上的不小心往往会为自己和家人带来灾难。以此为背景，我们在她的来信里读到许多正面的内容，她说自己在分配工作时受到了信任，得到个好职位；在工厂干活的椿一涨了工资；对于失去的资产和证券，家里人得到了些补偿。一九五三年启明在来信中充满信心地讲述了正在召开的五年计划会议及正在修造中的新房舍和工厂，她写道：“中国不再是落后的国家，中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光明的未来。”这听上去就像是照本宣科，而事实是家里人遭受歧视，作为早期资本家的家庭成员，他们只能做非技术性的工作。

启明成了家里的主心骨，将一家人凝聚在一起。她最能体现中国女人的地位。范岁久的外甥女丽丽回忆：她曾说在旧社会女人应把她们的名字和生日深藏于心，不让丈夫知道，这样才会给家庭带来繁荣与富贵。

两边的通信一直持续到一九九一年启明去世。范岁久往中国寄钱，而继母则在他需要时帮忙提供酱油配料的相关信息。一九五七年，她写信说，人们为海外华侨建造了新的宾馆，她让他回国探亲。但是直到十五年后，范岁久才认为回国探亲的时机成熟了。

第三章 大龙





哥本哈根非勒西路上的大龙公司，包春卷的女工们在休息。汽车后第一层为生产车间，第二层为餐厅，右侧第二层为办公室和簿记室。

竹园餐馆

大龙公司成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但是范岁久的创业历程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和大多数海外华人一样，范的生意从餐馆起步。

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大约有几百万，他们中大多数来自中国的贫困地区，希望在异国他乡通过努力过上好日子，赢得更好的未来。他们主要集中在东南亚、美国和欧洲等地。与其他国家相比，丹麦很晚才有中国移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范岁久来到丹麦的时候，丹麦华侨的数量很少，主要是海员、商人，时而也有像范岁久这样的留学生。根据米德·图努（Mette Thun）一九九七年所撰写的一篇关于在丹麦的中国移民的博士论文所提供的数据，一九四九年在丹麦的华人不足四十名。后来这一数字有所增长，这是因为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很多中国人选择留在丹麦，同时也有不少丹麦人携带他们的中国配偶回到丹麦。之后的几年里，来丹麦的中国移民主要是为了和家人团聚或投奔亲戚。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哥本哈根开设有七家中餐馆，这些餐馆需要中国厨师和工人，当时中国大陆的国门还没有对西方世界敞开，因此这些工人主要来自中国的台湾地区。

对于在哥本哈根开中餐馆这一想法，范岁久是积极的发起者和支持者之一，这源于他与彭安毋（音译：An-Wu Peng）的相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的时候，彭安毋是中国公使馆的三等秘书，作为前政府的公务员，他隐约感到自己在国内不会有前途，因此便没有跟随公使及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回国，而是选择留在丹麦。他与另一名公使馆前雇员一同开了一家“彭与王”汽车租赁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监管环境下做生意很不容易，对两个华人企业家来说就更难了，他们需要范岁久的帮助。尽管彭安毋精力充沛，但汽车租赁的生意实在太累，于是他转行去了瑞典，在宾馆里销售中国工艺品，也做邮购业务。他与范岁久一直保持着

联络，范岁久有时会去斯德哥尔摩拜访他。几年后当彭安毋与几个中国人一起打算在哥本哈根开中餐馆的时候，范岁久鼎力相助。四个中国人各投入两万克朗，范岁久投资了一万克朗，还有位缪勒太太也投了一万克朗，她之后做了竹园衣帽间的主管。竹园餐馆于一九五五年开张，很快成为一家有着浓郁异国情调的著名饭店，厨师刘万成（音译：Liu Wan-Cheng）向哥本哈根人推出中国饮食。餐馆的门面以中国特色的圆形窗户和竹子做装饰，在哥本哈根的餐馆业中别具一格。不过竹园并不是哥本哈根的第一家中餐馆。一九四九年，一位荷兰华侨受丹中协会的邀请来参加一个活动，他注意到哥本哈根没有中餐馆，于是他和八个朋友一同在色彩街开了第一家中国餐馆，取名“中国之家”。

丹中协会于一九四八年成立，范岁久是发起人之一。成立大会于一九四八年四月八日在国家展览馆的讲堂举行，人们一致推选范岁久做协会理事，在这个位置上他一干就是很多年。

创业者

“我的成功源于辛勤工作和简单的生意经，就是说，赚进一块钱的时候，至多只能花掉八毛钱。”这是一九九七年大龙公司取得成功后，范岁久对《日德兰邮报》讲的话。他确实是这么做的，所以才能走到今天。

他的成功要从竹园餐厅讲起。中餐需要酱油，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丹麦根本就买不到酱油，没有工厂生产这种中国调味品，于是范岁久决定面向中餐馆生产酱油。身为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他觉得自己的有能力。他在梅地希纳尔科的实验室里进行了一系列试验，成功地培育出了发酵过程中要用到的一种特定的菌类。下一步是将菌种放到盛有黄豆的大缸里发酵成熟，这需要足够大的场地。岳父家住在斯科夫侯

沃德的福利利希路上，他们那幢小别墅有间地下室，范岁久把这里用作实验室，他设计和制作了各种设备。酱油的制作程序主要包括发酵、成熟和离心过滤，每道程序都需要用心监测和搅拌。最后将成品倒进一个二十五升的容器里，就大功告成了。制作过程中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家人不但从不抱怨，还经常给收垃圾的工人塞几瓶啤酒，好让他们收掉生产过程中剩下的豆渣。这听起来虽然不算什么，但是一九五七年的这第一瓶家庭自制酱油展示了范岁久的能力，是他迈向大龙的第一步。

春卷是由竹园餐厅的厨师刘万成引进丹麦的，最初作为晚餐的主餐来销售，但因为价钱太低，于是后来只作为晚餐的前餐和午餐来卖。有一个名叫黑尔格·尼尔森的人对竹园的春卷很感兴趣，他在趣伏里游乐园里开了两个卖棉花糖和香肠的摊子，如果竹园愿意送货上门的话，他也很想销售春卷。但竹园人手有限，没办法满足这个要求，于是范岁久接过了这项生意，由他来生产趣伏里游乐园所需的春卷。范岁久从竹园的厨师那里得到了一些初步的指导，之后在斯科夫侯沃德的地下室里试了很多次，终于做出了令他满意的春卷。做春卷最关键的窍门是和面和做馅料时肉和蔬菜的比例，蔬菜用的是卷心菜。一九六〇年秋天，范邀请黑尔格·尼尔森来品尝他做的第一批春卷。从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起，范岁久做的春卷和自制的佐餐酱油开始在趣伏里游乐园销售。

一九八五年，范岁久简述了春卷产业的开始过程：“一九六〇年秋天我被介绍给一个有兴趣在游乐园里销售春卷的人，我们开了个会。我得知这位先生叫黑尔格·尼尔森，他在游乐园里有两个摊子，主要卖香肠和棉花糖，他是著名的国家斯卡拉大厦（National-Scala）的约尔恩·尼尔森的儿子，安娜丽丝·伯克（游乐园前经理）的兄弟。我在家里的地下室试着做了些春卷，邀请黑尔格·尼尔森来品尝，他认可了。从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起我开始给他供货。”



| 范岁久于一九五七年左右自制的第一批酱油。



早期的春卷制作工坊，位于布伦斯豪伊。

一九六〇年，范岁久和伊丽莎白买下了岳父母在斯科夫侯沃德的福律利希路上的房子，而岳父母则搬进了范岁久在奥德如普的狩猎路的公寓。现在他可以使用整个地下室，但很快他发现要扩大春卷生产还得需要更大的地方。于是，他在布伦斯豪伊的艾伊旺又租了一个地下室。他的当务之急是清除这个地下室中原来生产橙汁饮料时留下的污渍。最大的两个孩子丽生和本德，还有家里的帮佣小妹和几个表兄弟被找来干这件令人头痛的活。当然，范岁久在付报酬的时候非常慷慨。范岁久的公司叫“范的产品”，向游乐园提供第一批春卷之后，销售情况一直不错。没过多久，范岁久就需要在当地再招收几位女工。十四岁的丽生和帮佣小妹利用暑期帮忙做春卷皮。六个煤气炉每天可以做三四百个春卷，星期六和星期天也不休息。“在游乐园关门时间之前，我们可不能因为缺货而停了生意。”黑尔格·尼尔森说。直到游乐园关门，春卷供应都不能断。

范岁久的第一个雇员是薇妮·威登白恩，早在梅地希纳尔科的时候，她就开始在范岁久手下工作。范陆续又雇了四名女工，之后增加了几名男员工。范岁久从一开始就实行男女同酬。

在布伦斯豪伊的生意不好做，因为只有一个固定客户，一旦游乐园开放季节过去，就几乎没人订购春卷，范岁久不得不想办法另寻新客户。他找到了一些愿意出售春卷的小酒馆和小餐馆，其中较大的一个客户是薇莉广场，这是个有名气的地方，年轻人很喜欢去。另一个大客户是蒙玛特尔爵士楼，当著名的爵士音乐人在这里表演的时候，往往座无虚席。一年之后，给游乐园发货的生意停了。黑尔格·尼尔森已经偷学到配方，开始自己做春卷，只有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才叫范岁久送些货过去。范需要联系到更多的客户才可能赢利。

“在一九六二年游乐园的开放季节，我给黑尔格·尼尔森送货的数

量非常小，因为他和他手下的女孩子们弄明白了做春卷的方法，开始自己做，我只在周末他们很忙的时候才送货。好在我仍然受雇于多美滋，当时的情况说起来还算可以。”范岁久在一九八五年回忆说。

一九六三年，范岁久几乎打算放弃春卷生意，一是因为工作量太大，二是因为利润太小。工人们要从早上七点一直干到下午三点，四小时换一次班。每天的工作从和面开始，然后是切蔬菜，根据季节变化他们要选用不同的应季蔬菜，最后还要炸肉，同时九个平底锅里还烙着春卷皮。从一九六三年起，范岁久改进了设备，有一台专门的机器用来生产春卷皮。春卷的馅本来需要工人用勺子舀起来放进春卷皮里，一九六二年，范岁久购买了一台制肠机取代了这一工序。春卷被放入冰箱冷冻，之后，被装进内衬羊皮纸的纸盒子里，日产量达四百多个。

范岁久觉得自己不擅长销售，但是对生产技术革新非常得心应手。酱油的制作情况非常好，春卷的生产也没有问题，现在他着手试验用豆芽做馅料。如果要以此为生，单凭高质量的产品是不够的，销售非常重要。因此，范岁久开始与张作和合作。张作和是彭安毋的朋友，也是竹园餐厅的投资者之一。张作和愿意作为范岁久的合作伙伴负责产品销售。“我们分工：我负责生产而张负责销售和运输。那时不了解深冻技术，我们只生产可以在冰箱里存放两至三天的新鲜春卷。”范岁久在一九八五年说。

之后不久，范岁久开始了深冻春卷的试验。如果产品能够长期储藏，那么产量就能提高。另外，如果能够扩大生产品种，那么销售也会更好。范岁久和张作和对于开发罐装中餐非常感兴趣，这需要进行很多试验和尝试。范岁久非常幸运地得到了农业大学同事们的帮助。他当时考虑做罐装咖喱鸡，他的一位同事弗利兹·拉尔森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帮助检测咖喱鸡的质量，大龙公司成立之后，他受聘负责大龙产品的质量控制。



张作和、他的妻子汉娜以及范岁久在上海饭店。
摄于一九六五年左右。

罐装中餐没能打开局面。张作和找到当时丹麦最大的罐头公司之一的布歲（Beauvais）公司，希望与其合作。可布歲感兴趣的并不是罐装中餐，毕竟布歲的主打产品就是罐头，相反，他们愿意在深冻春卷这个项目上与大龙合作。“我们逐渐忙于生产深冻春卷，以至于几乎忘记要生产罐头了。”范岁久在一九八五年写道。

随着公司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现有的生产车间太小，必须搬到更大的地方。这次他们选择了哥本哈根非勒西路上一个废弃的火腿蒸煮工坊。清理装修之后，他们得到了健康卫生部门的许可证。一个叫钟（音译：Chong）的中国人加入了公司，担任生产主管，专门负责做春卷皮和馅料。

开发产品确实需要时间，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范岁久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公司的运营上。工作之余他喜欢和自己的同胞一起泡在竹园餐厅（当时竹园是酱油产品的主要客户之一），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范岁久不是那种每天晚上回家吃饭睡觉的男人，尽管有时候夫妻之间少见面有助于维持婚姻，但太不着家也会给婚姻带来负面影响。范岁久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孩子们主要由伊丽莎白照顾。

“我们看见范岁久的时间不多，但是在孩子们小的时候，他是个好父亲。”伊丽莎白·范说道。

范岁久很爱他的子女，家庭收支也由他负责，但他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居家男人。他有自己宏伟的计划，喜欢和中国朋友们在一起，喜欢自由的生活。他经常不跟家里人交代就出了门，妻子根本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他对家庭中的男女地位肯定有着相当传统的看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范岁久的收入还不是很稳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伊丽莎白既要做全职教师来保证家庭的日常开销，又要独自照顾孩子们。范岁久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他对家庭生活的理解与丹麦人的生活规范不

完全一致，他也许仍抱持着旧中国的传统思想：男人享有一切，而女人甚至没有使用自己姓名的权利。

一九六二年，岳母瓦尔堡去世。范岁久一直非常敬重瓦尔堡，而瓦尔堡也很欣赏自己这个中国女婿。范岁久为岳母的逝世感到很难过。他没有征询伊丽莎白的意见便径自邀请他的岳父克里斯蒂安来家里，每天和他们一起吃晚饭。

“范的产品”——春卷

范岁久的长子，本德，在孩童时期就经历了从生产酱油到生产春卷的初期尝试阶段。本德后来成为了一名工程师，受雇于丹麦国家铁道公司。回想当年，他还只是个对酱油生产充满好奇的小男孩。

“我对父亲的工厂的最初记忆差不多是在一九五四年，按照现在对工厂的定义，那根本不能叫做‘工厂’。一天晚上我和母亲一起去外公外婆家，他们住的是幢别墅，离我家的公寓差不多半公里远。在外公家的地下室洗衣房里，父亲正在忙着制作两个梅森奈特纤维板大柜子。这看上去真有意思，但我却不知它们有什么用场，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它们是生产设备的一个部分，从一九六二年起它们就被用于酱油生产。我见识了‘酱油工坊’后，常获准晚上和父母一起去福律利希路。最初我只是看着，后来他们允许我搭手帮忙。我最开始的一项任务就是把混在大豆里的玉米粒挑出来，这固然是个无足轻重的活儿，但有个事儿干我也就不会添乱了。

我很近地看着那些原料——大豆和大豆秆、小麦粉和盐，经过不同的处理——蒸煮、发酵、陈化、离心过滤，变成了产品。相对于当时能在外面买到的中国酱油，这是非常优质的产品。

趣伏里是哥本哈根的一座游乐公园，于一八四三年建成。园内有餐馆、游乐设施，还有音乐会和节目表演等，是哥本哈根最具吸引力的景点之一。园内的建筑风格富有异域情调，既有中东风格也有中国风格，在范岁久初到哥本哈根的当时，趣伏里是最具人气的约会地点。因此，当时机成熟，在趣伏里游乐园内卖春卷也就并非偶然了。摄影：Jesper Stormly Hansen。



发酵过程是决定酱油质量的关键，发酵用的菌种是父亲在梅地希纳尔科的实验室亲自培育出来的。梅地希纳尔科的铁匠兼勤杂工法格贝尔是个多面手，他帮父亲制作了许多生产零件。发酵过程在一个梅森奈特纤维板柜子里进行，这要求精准的监控（我常常得到许可，在父亲的指导下，测量一天的温度，以便在一个给定的时刻关掉暖气，打开通风机）。

发酵之后便是陈化，这通常在一个大搪瓷锅里进行，搪瓷锅被放进另一个纤维板柜子里。柜子需要持久保温，即使不用的时候也得按外公说的，贴上铝箔纸隔绝保温。我最熟悉的事是，锅里的东西要充分搅拌后才能放进那温暖的柜子里。”

范的女儿丽生后来学了助产专业。和弟弟一样，她对最初那些年也有印象，回想起孩子们主动参与生产，她说：

“我对父亲制作春卷的记忆是从试餐开始的。春卷有时是香菇馅的，有时是笋干和鸡丝馅的，有时加些咖喱，品种很多，都很好吃，只有某些味道浓烈得不太合我们胃口。我们这些孩子对改善伙食总有很大兴趣，对父亲亲自下厨我们倒并不惊讶，因为他有时也会做饭。我们从没想过他在地下室里摊那些薄饼到底有什么用意，至于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就更没想过了。

我隐约地记得后来我们有了另一个‘活动中心’，那就是布伦斯豪伊的艾伊旺。我们帮忙打扫那些房间，真是脏得无法形容。那地方曾是个澡堂。

父亲安装了许多设备，有六个煤气炉、平底锅、一只盛油的大钵，一个自制的用来给锅底抹油的大鼓槌，还有一个用来发面的大锅。

当春卷供不应求的时候，尤其每逢趣伏里游乐园的营业季节，父亲就会一个电话打过来对我说：‘坐出租车回来，帮我烙饼。’

我那时才十四岁，又刚好赶上暑假，很难逃脱这差事。一想到自己



一九六一年，出生于中国的绮云·艾斯克仑（Chi-yun Eskelund）和她的女儿在趣伏里游乐场吃春卷，中间是黑尔格·尼尔森，他在游乐场销售范岁久的春卷。

要站在热烘烘的炉边，手上缠着布条，摊那些即不能太薄又不能太厚的煎饼，我就故意不打出租车，改乘火车拖延时间。烙饼的时候我得特别小心，饼的边缘得是软的，如果太脆，卷起时就会折破；我还得确保饼真的烙熟了，要不然他们就会黏在一起，诸如此类的注意事项很多。直到现在，每次我给自己的孩子烙饼，就会回想起在艾伊旺的那段时光，想起自己手中正在做的东西曾经被称作‘范的产品’。”

约恩·罗特贝尔（Jrn Rothberg）是位批发商，他还记得和范岁久的第一次会面，当时范岁久正为自己的产品寻找买家。

“一九六〇年前后，哥本哈根市内只有两家中国餐馆。那时我们很年轻，好奇心旺盛，想研究中国的烹饪艺术，常去这些庙宇一样的中餐馆品尝正宗的中国春卷，每周去一次。作为食品批发商，我觉得要是这些春卷能变成商品就太棒了。我们学着做春卷，可惜尝试以失败告终，只好放弃了。

一九六六年的一天，我带着货在一位客户家里喝啤酒，这位客户正是大名鼎鼎的赫尔卢浮·坎普·拉尔森，他住在圣瑞格纳街的一栋老房子里。这栋房子被唤作‘蒙玛特尔爵士楼’，颇有名气，全世界最好的爵士乐家在这里轮番演奏，场场满座。

突然门开了，一个穿着合身的黑色大衣的小个子男人走了进来。他举止文雅，手里拿着一个旧文件包，包上面还有一只用带子绑着的铝制平底锅。这个男人自我介绍说姓范，在布伦斯豪伊有间小工厂，用自己造的机器生产春卷。然后，他把锅放在煤气灶上，往锅里倒了些油，点着煤气。他从文件包里抽出一个糖果盒，打开盖子，我们看见盒里面有两排精致的冷冻春卷，看上去很美味。春卷被放进锅里，不一会范先生就请我们吃上了味道正宗的春卷，我们胃口大开。范先生告诉我们，他挨家挨户去餐馆推销，所有高档餐厅都欣然接受并愿意尝试推出这些春卷。那可是一九六〇年，他的勇气真可贵！

我非常感兴趣，就问这位范先生，能不能让我做他的批发商。考虑到生产规模小，他当时不愿对我许诺，不过他答应等产量够大的时候再和我联络。

过了半年，我以为范岁久已经把我忘了，但有一天他打来电话说：‘您来做我的第一个批发商吧，罗特贝尔先生。’第二天，我的商店橱窗里满是打开的糖果盒，盒里装着春卷，一个新的时代从此开始。”

创立大龙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丹麦已经不是范岁久初来乍到时的样子了，它已经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农产品和食品在丹麦工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社会福利提高了，丹麦是一个为无助人群提供福利帮助的国家。社会氛围越来越国际化，许多人去欧洲旅行，对世界各地的关注越来越多，社会也变得开放。丹麦把美国看做是伟大的理想国家，但是对中国，除了“这是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和“一场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之外，大多数丹麦人并不知道中国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哥本哈根大学和奥胡斯大学都设立了中文专业，越来越多的丹麦学校开设了中文课，也有人写了各种有关中国文化的书籍，人们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大，关注越来越多。可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几乎没有人会预想到这样的变化，范岁久当然也不会料想到。那些年里，他正忙着建设企业，让中国春卷进入丹麦厨房。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张作和和范岁久的企业更名为“大龙”（Daloon）。一九六四年启用的位于非勒西路的厂房上挂起了写有这个名字的招牌，全部用大写字母拼出。香港有个城区叫做“九龙”，这两个名字多少有些关联，九条龙合成一条大龙，是帝制中国的象征。而且“大龙”在许多语言里都容易发音，是个叫得响的品牌。尽管这名字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才启用，但一九六〇年被视为大龙的奠基年，因为第一批春卷就是在这一年出产的。

随着春卷产量的提升，生产设备也有了改进。厂里新增了春卷皮机、一个速度很快的切碎机，还添了一个卷心菜蒸煮锅用以配合制肠机，但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春卷还是用人工手动包出来的。曾是大龙的注册客户的普鲁姆罗丝（Plumrose）公司和布歲公司在罐头市场上你争我夺，后来两家达成协议，普鲁姆罗丝允许布歲和自己的一个分包商做生意，而相应的，布歲让普鲁姆罗丝插手春卷销售。一九六六年，布歲收购了普鲁姆罗丝，这给春卷销售肃清了障碍。罐装中餐的设想被放弃，冷冻中餐的计划也以短暂尝试告终，而春卷历久弥新，成为大龙的主打产品。员工人数增加，其中有许多短期雇来的外国人。“守法”是基本原则，在厂里，“守法”的具体形式就是严格遵守每一条卫生规定，至于外国劳工是否从丹麦移民局拿到了工作许可，厂方的态度很宽松。作为雇主，范岁久受儒家“以身作则”的影响很深，他领导下的企业采取父权家长制，这有其正面意义。员工们不会困惑“谁是领导”，无论在工作上还是人情上，领导者也很清楚自己对员工的责任。范岁久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他即使不怎么发话也没人会误解他的意图。在员工需要的时候范岁久总会出手相助，他甚至还帮忙操持过员工的婚礼。在大龙工作其实是种生活方式。

公司又添了一位新客户，这是家名为莱科拉（Lecora）的瑞典公司。一九六八年莱科拉买下一百万个春卷，这笔订单开辟了大龙走向国际市场的道路。另外，在丹麦国内，范岁久和张作和投资了两间咖啡馆，一间位于哥本哈根公民街（Borgergade）和女王街的拐角，另一间在北桥街。他们还于一九六八年买下了老广场上的上海饭店。

纽堡的新工厂

一九七〇年是关键的一年。在非勒西路上的老房子里，大龙的运作状况很好，是时候考虑扩展规模、寻找新厂址了。他们原打算在哥本哈根附近地区找找看，但这时有人出价卖一块工业用地。这块地皮位于菲英岛的纽堡，条件优越，价钱也不错，每平方米十克朗。卖家是大龙的一个分包商，叫DATSchaub。DATSchaub手中有这块地，想让大龙来做邻居。另一个邻居将会是纽堡速冻，该企业后来帮大龙保存冰冻春卷。搬迁到菲英岛是个明智的选择，那里有许多优势：工资支出较少，成本费较低，与出口市场的交通也很便利。对纽堡市政厅而言，招徕前景看好的企业自然是一件好事，市政厅里的人已经准备谈分期付款的条件了。其实没必要分期付款，范岁久有现钱，需要做的只是算出数目，当场现金交易。

买地是一回事，把厂房设备运过来是另一回事。不管怎么说，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是不太可能的，他们必须向银行贷款。这事后来也办成了，就是过程很有趣。关于当年第一次与银行打交道时的场景，最高法院的律师约尔根·君特·彼特森在十五年后的《大龙纪念书》中作了生动的讲述。彼特森曾是范岁久的法律顾问，一九七一年三月大龙股份董事会成立后，他担任首任董事长。

“范岁久已经把该做的准备都做好了，他打算在纽堡建造一家真正的工厂。此前，春卷生产一直在非勒西路的那些房子里进行。那些机器，有一部分还是范岁久自己制作的，虽然用着还不错，可在外行人看来它们简直像是斯多姆·P^①的笔下之物。纽堡新厂将淘汰那些古怪的厨房设备。

①Robert Storm Petersen (1882—1949)。丹麦漫画家、作家、画家、幽默家。他画出了许多斯多姆·P机器，这些机器通过许多不必要的繁复和滑稽的动作系列来完成简单的工作。

新工厂需要资金，这些钱得从银行贷款。我和范岁久去找哥本哈根最大银行的一位行长。首先我们得向这个大人物解释，春卷到底是什么东西。和大多数丹麦人一样，他从未听说过春卷。我们一开始就先解释说春卷是种吃的东西，然后才介绍范岁久的生平。银行行长看上去有些疑虑：范岁久如果在医药工业里做一名实验室的化学专家，那么毫无疑问，他足以胜任，但是，这个从来没有办厂经验的人现在要做企业家，能成功么？诚然，他在非勒西路做过几年春卷，但那其实更像个家庭作坊，银行会对这样的东西感兴趣么？

银行行长很友好，想进一步了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表示愿意支持新事物，只要这种新事物具有可持续的生命力，足以值得他去期待。用于纽堡的厂房和机器的贷款倒是批下来了，但这只意味着工厂可以建起来，机器可以装配上，至于企业能否生存下去又要另当别论。无论如何，银行一方已经拿到了信贷抵押，我们接下来得说明春卷打开局面的机会有多大。要让这位行长听明白可真有点难，因为他还没弄清楚，春卷到底是一种类似聚会时人们吃的杏仁糕那样的零食呢，还是某种更为日常的餐桌食品。他让我们报报数据，比如在非勒西路生产春卷时的赢利，想要从数字上了解情况。

范岁久一一解释，什么是春卷，哪些人购买它（当年的主要客户是小型食品商店、香肠摊和咖啡吧，后两者日后被归纳进餐饮行业）。他也报出了一些数字，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能记住这些数字。银行行长并不了解范岁久这个人，何况坐在行长这个位置上，他显然对那些虚报数据以便获取贷款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了，他并不认为范岁久报出的这些数字能与银行审核后的结果保持一致，所以只是耐着性子对范岁久投以友好的微笑。范岁久也回报以友好的微笑。对经济情况的介绍差不多快结束时，行长说，他希望范岁久提供书面数据。范岁久于是微笑着从衣袋里掏出一个蓝色的信封——那种小店里出售的便宜信封——在反面写下了一些数字，然后交给行长。行长显得既吃惊又怀疑，不过他仍然保持着微笑，解释说这些都很好，只是在给出最终答复前还需要让会计

坐落于纽堡的改建后的大龙公司。





在一九九六年“大纽带桥（Bro Storebaeltsbroen）”建成之前，西兰岛与菲英岛之间的交通一直依靠轮渡。一九七〇年大龙公司落户菲英岛后，范岁久曾多次乘坐渡轮。他在有生之年也曾经过这座新桥，往返于两岛之间。摄影：Joachim Ladefoged。

师来核对一下，这倒并不是说他在怀疑范岁久，他补充道。从他的眼神里我们很清楚，他其实非常怀疑这些数字的正确性。

他的秘书把我们谈话中的要点记录下来，脸上挂着和行长一样的微笑。我们和他们告别。银行雇了位会计师来审核范岁久提交的数据，审核结果寄到了行长那里。令人叹服的是，蓝色信封上的数字与会计审核的结果相差无几，银行行长非常诧异。

信用是没有问题了，资金到位，纽堡的工厂建立起来并开始正常运作。让银行行长、我，还有其他人都感到惊诧的是范岁久对于整个企业了解得那么透彻，他脑中所记和口中所言都是准确的。

此后，银行行长与范岁久的友情延续了很多年。范岁久与别人思路不同，他能做到大多数人做不到的事。更难得的是，他待人热情，一直很和善。”

新工厂斥资五百二十万克朗，于一九七〇年七月六日启动。前文提到，大龙是一个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有范岁久、张作和、任董事长的最高法院律师君特·彼特森（Günter Petersen）、任经理一职的宝隆洋行的古纳·布克（Gunnar Buck）和在宾馆业里鼎鼎有名的奥斯卡·彼特森（Oscar Pedersen）。

纽堡新厂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地方够大，能容纳新购置的机器设备。事实上，范岁久的企业直到这时才拥有了真正适用的机器，原来那些生产春卷皮的机器就像斯多姆·P笔下的东西，它们被淘汰了。新的机器里有一只不锈钢卷筒，用来烙制春卷皮，这极大地提高了产量。春卷皮日产量达两万五千张。李阿塔（音译：Lee Ah-Tah）是生产负责人，他跟随范岁久从哥本哈根来到纽堡。他还负责扩大“苹果甜球”的生产，大龙从一九七一年开始生产这种丹麦传统甜点，产品销路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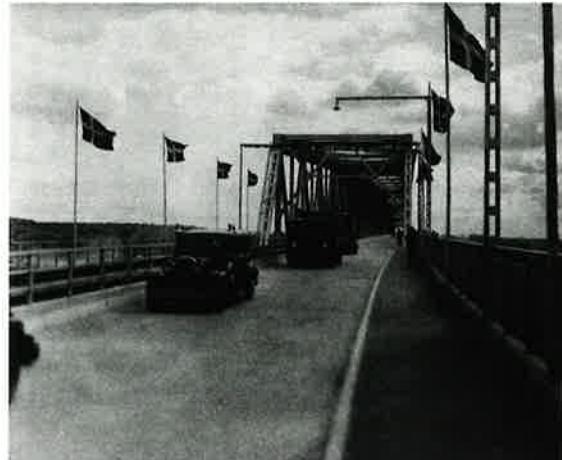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大龙已成为一家重要的出口企业。在瑞典那

边，情况也很好，一九七一年大龙在欧尔布罗的斯多罗开办了一家新厂，于是在瑞典也可以生产春卷了。

一九七一年，大龙开始与英格兰的连锁百货公司Marks & Spencer合作。英国人喜欢吃咖喱风味的春卷，市场开拓得很顺利，尤其在一九七六年大龙强化其领导层之后，出现了扩大生产的良机。大龙在英格兰设立了一家独立工厂，产品在英格兰市场上的销量一直很好。一九七三年，大龙的第一个国外销售分部在德国设立，这就是大龙食品股份有限公司（Daloon Lebensmittel GmbH），它位于汉堡附近的艾尔斯霍恩。

在纽堡的前三年里，产值翻了两番还多，从九百三十万克朗增长到两千五百万克朗，赢利将近百万。

大龙迁至纽堡也是范岁久私人生活的转折点。一九七一年，范岁久搬到菲英岛时，他的家人没有跟着一起搬迁，他和伊丽莎白最终分居了。范岁久很快适应了菲英岛上的一切，他参加了工厂周边的许多社交活动，并且很快建立起了良好的人脉关系。渐渐地，他成了纽堡城的一位名人，走到哪里都受到欢迎和尊敬。他仍然慷慨地照顾着家人的生活，与妻子和孩子们保持着家庭联系。



丹麦是一个多岛之国，轮渡与桥梁将丹麦诸岛相互连接。图为丹麦早期大型桥梁建设项目之一——连接菲英岛和日德兰半岛的大桥。该桥于一九三五年建成并投入使用。范岁久曾多次在这座桥上经过。
摄影：Holger Damgaard。

重回故土

与中国阔别了三十七年之后，范岁久终于重回故土。一九七二年，他决定从领导位置上退下来。没有了领导责任，他准备回国探亲，这时他已经六十岁了。这次回国他不是作为一个回家探望老父亲的儿子，而是作为一名成功的海外华侨。他实现了当初的预言，成为了一位大商人。要实现这个预言，需要付出辛苦的劳动，需要才智谋略，也需要主



一九八八年范岁久在杭州西湖。

动出击的魄力，这些范岁久都做到了。以中国的标准来评价，他的成功经历是个真实的励志故事。

这时的中国正从“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严重危机中走出来，创痛仍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为了巩固政权，整顿党政机构。可是后来事态发展失控，这场活动演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清算，变成了对整个中华古老文化的摒弃。在那个时期里被毁掉的东西无法估算，书籍被焚烧，寺庙被亵渎、里面的陈设被损毁、各种瓷器连带它们所承载的文化价值一并遭到毁坏。这是一场浩劫。这里用一则小故事作为象征性的事例。一九四八年，范岁久的表弟斯颂声在他的婚礼上从袁仲符那里收到了一个瓷瓶：“……上面亲笔写着一首七言诗，诗句我已忘记，大意是勉励我俩和谐相处，祝贺我们白头偕老。然而这个值得纪念的宝蓝色花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损毁了，不胜痛惜之至。”

毛泽东于一九七六年逝世。范岁久第一次回国的时候，毛泽东还在台上。那时候，袁仲符是一个资本家，加之他的儿子又身在国外，整个家族都受到政府的怀疑。“文化大革命”针对一切古旧的或者与外国有关的东西，这对于一家人来说可谓是雪上加霜。在范岁久探亲之前，继母启明被抄了家，房子变成一片废墟。家里人想修房子，去申请许可，结果却是连支撑房顶的房梁都被没收了。一位表妹说，每天晚上都有人扔砖块石头，想打碎窗玻璃。家里人不得以在窗户上钉些竹篾，屋里因此非常阴暗。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继母不敢再给国外的范岁久写信，直到一九七二年通信才恢复。同年，范岁久来信说他要回国，家人很担忧这事能否顺利，只盼到时没人向他们扔石头。所幸政府设法作了安排，没有出现什么恼人的状况。

这位表妹还记得自己和范岁久的继母一起去火车站迎接他，她们怕时隔太久认不出范岁久，还随身带了张范岁久的相片。但是，范岁久从

火车上一下来，她们就认出了他。范岁久也见到了弟弟椿一。椿一事先向厂里请假，假条是批下来了，不过领导也下了严肃的指示，让他注意自己的言谈。这对命运不同的兄弟终于得以重聚。

范岁久到了杭州，当然要重游旧地。他泛舟西湖，也去了出矿泉水的虎跑，这些都是杭州的必游之地。他总结说，西湖虽美，无奈城市破旧。家里的房子翻修后已经认不出来了，他还是更喜欢从前的老房子。他认出了那棵他小时候经常攀爬的树，如今已经长得很高了。

家里人记得，范岁久还高声朗读过毛泽东诗词。家族坟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因此范岁久这次回来没能去坟上祭拜。他嘱咐家人设法重修墓地，费用由他来出。父母的坟墓重修后，范岁久和他的孩子们才终于可以去扫墓，凭吊祖先——这是中国人的一桩大事。这桩心事算是了结了，接下来另一件大事就是编写父亲的传记。在这本家族书中甥侄、甥侄女，以及他们的子女们讲述了记忆中的袁仲符。这本中文传记给本书的作者带来了极大的启发。

一九七二年的那次回国探亲为他日后的一系列访问开了头。中国政府对那些为国争光的成功华侨同胞们展示出友好姿态，范岁久为此感到高兴。毛泽东逝世后，人们对中国的经济形势有了新的认识，态度也随着观念的转变而转变。一九七六年，范岁久和张作和一同回国，他们被当做官方嘉宾，还接到了献花。他们被问了许多关于丹麦的问题。范岁久的外甥女丽丽记得，晚饭过后，范对她说：“丽丽，这些官员用公家的钱请客真阔气，二十盘、三十盘高档菜一眨眼工夫像蝴蝶一样旋即不见了。他们的问话特别多，我就没怎么吃，真费劲。”

毛泽东逝世的这一年，范回国旅行，得了一个纪念品：一株兰花。它成功地通过了丹麦海关，被种在了纽堡的家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修葺后的袁仲符墓。



修葺后的范母墓。

接下来的那些年里，范岁久与中国的联系、与在国内家人的联系更为频密，这让他很高兴。一九七九年他又一次回国探亲，一九八三年、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八年他都回过国。一九八八年他回去了两次，和以前沪江大学的老同学们聚会。一九九三年也回国两次，去给父亲扫墓。一年后由家人整理出了袁仲符的传记，范岁久为其作序，写道：

“一九九三年新春之际，我去父亲坟上凭吊。我徘徊坟前，少时记忆涌上心头，父亲对我的严格教育，成年后对我的悉心培养，均历历在目。而今我事业小有所成，他却已溘然长逝，未能亲睹。每念及此，我实不能不怅然于怀，悲怆难忍。”

一九九五年，全家人——伊丽莎白、儿子、女儿、孙子和孙女——都去了杭州，给范岁久的父母上坟。范岁久后来分别于一九九九年和二〇〇〇年回国探访，这是他最后两次回中国。

大龙的危机

“范岁久是一个谦逊的人，很清楚自己的长处与不足。记得我被聘用的时候，他跟我说，销售和市场归销售经理负责，工厂经理负责生产，我负责财务、人事和IT，他本人只负责产品开发和在支票上签字，就是这样了。

他非常重视工厂内的卫生状况，厂区内的任何地方都须保持干净整洁。屋檐下的鸟巢被一次次清除，他还建起了专用仓库储藏卷心菜。他也很重视食品卫生，长期以来与负责全国牲畜检疫的兽医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范岁久对于账目和预算细节不是很感兴趣，但每一季度的预算他都卡得很紧，绝对不允许有无法达到的预算数额，我经常不得不根据范岁久的意愿来削减企业的预算结果。”

以上是大龙公司后来的首席财务官汉斯·纽兰德斯特德（Hans Nylandsted）对范岁久的管理风格的描述。范不仅仅重视产品质量，也注重生产设备的革新，这是大龙公司的建厂宗旨，即使在面临危机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一宗旨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由于一九七三年的一场严重火灾和七十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公司不得不搁置扩展计划。可喜的是大龙春卷的销售情况一直很好，因此公司开始专注于市场开发和推广。在此之前，除了大龙春卷，公司还销售以其他名字命名的食品，但是随着市场竞争愈演愈烈，公司考虑统一使用“大龙”这个名字，并使之成为高品质的代名词。同时公司尝试增加两个新品种：卷心菜包馅和烙饼冰激淋。卷心菜包馅的销售情况相当不错，而烙饼冰激淋虽然味美，但很可惜没有为公司增添可观的赢利。

后来范岁久讲道：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肉价涨了两倍，工资翻了五倍。我们无法以五倍的价钱来销售春卷，因此必须设法实现生产机械化。

我们开始研制自动包春卷机，通过多次试验，终于成功了。

我们和丹麦技术学院的一些工程师合作，其中一位建议让机器借助高压来包春卷。试验结果很不错，高压包春卷的方法非常适合春卷皮的质地。我们获得了该方法的国际专利，公司拥有了全世界最先进的机器。很多时候事情看上去令人绝望，可我们不能轻言放弃。”

一九七六年，大龙得到了为德国库克律弗尔（Kochlöffel）公司供货的合同，公司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逐步赢得了德国市场。同年，大龙的销售额从两千七百万增长到四千六百五十万克朗，几乎翻了一倍。尽管如此，账面上仍有两百六十万赤字，这意味着大龙不得不再次推迟扩展计划。范岁久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是，在自己手中持有大龙多数股份的前提下



大龙公司最畅销的产品：春卷和苹果甜球。

下，这个企业还能不能作为股份有限公司继续生存下去？

早自一九七二年，范岁久就将公司的领导权交给了一位执行董事，然而时隔几年后，他认为自己应该重新坐镇，和销售经理一起管理公司的日常运营。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二日他写给董事长、最高法院律师约尔根·君特·彼特森的信中，他明确地指出公司陷入困境的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我认为，一九七六年糟糕的经营结果必须由执行董事承担责任，解释或推诿责任是没有用的。面对银行，我们已经再无借口，没有退路，我们面临着失去银行信任的危险。银行一旦作出过激的对策，大龙就岌岌可危。另外，债权人开始对我们的信用度产生怀疑，这也会导致大龙的厄运……”

一九七七年，范岁久对企业的未来忧心忡忡。由于公司的折扣价过低，导致客户的仓库里堆满了存货，销售情况非常糟糕，问题相当棘手。销售经理因此丢了职位，执行董事也不得不辞职。原因之一也许是因为范岁久没有住在纽堡，无法亲自管理公司。现在他搬来这里定居，赤字应该会得到控制。在信中，范岁久总结道：“通过在纽堡四个月的考察，我有信心断言大龙是个好企业，只是没有得到好管理。”

范岁久从外表看是个温和的人，但他也会生气。当公司处于危机的时候，他有足够的能力作出正确决定。

董事会的奥斯卡·彼特森等人向范岁久施加压力，让他考虑出售股份，筹集新的资本。有很多企业愿意购买大龙的股份，董事会还讨论了与美国食品联合企业凯洛格斯（Kellogg's）合作的可能性，甚至还有人提议干脆把大龙卖掉。经过艰难而慎重的权衡，范岁久否决了这些想

法。他从大龙的三名员工那里借来了一大笔资金，再加上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的一些小额贷款，他成功筹到约两百万克朗，正好可以帮公司度过危机。

当时，丹麦酿酒厂有兴趣收购大龙，该厂的经理保罗·黑皋和范岁久进行了会谈。关于这次谈话，他回忆道：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丹麦酿酒厂正处于鼎盛时期，那时正流行生产多样化的想法，酿酒厂原本就有食品加工（尤指土豆）和煎炸工序，所以除了酒厂本身的生产发展外，我们的议题也包括收购相关企业。经过市场调查，大龙公司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一是因为春卷的制作过程跟土豆加工过程很相似，二是因为一九七三年那场火灾严重影响了大龙的生产，三是因为作为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大龙的营业利润一直不尽如人意。

作为酿酒厂的行政经理，我的任务就是搞清楚范岁久是否愿意出售大龙公司。我的文件包里装着一份我们董事会通过的收购计划书，报价既客观又颇具吸引力。

我完全以公事公办的形式联系了范岁久，但却得到了非常正面的回复，我于是应邀去纽堡面谈。一位面带微笑个子不高的中国人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他请我吃了顿美味的午餐，还开了瓶很好的红酒。其间范岁久只讲创业的各种甘苦，对我这次来纽堡要谈的正事却只字未提。最后，我觉着是时候告诉他我的拜访目的了，我介绍了酿酒厂的经营状况和策略，说我们有兴趣与他协商收购大龙，而且我们知道，范岁久年纪大了，他的两个儿子都没有接手企业的计划。谈到这里，范岁久显得有点不自在，他解释说企业不景气的主要原因是前面提到的那场火灾，然后他强调，中国人不会因为企业运作得不好就轻易将它卖掉。我于是问，如果在企业运转不错的时候把它卖掉，中国人对此有何看法。我得到的回答是‘那他肯定不卖’。这次会面在非常积极的气氛中结束，虽然收购这家企业的可能性明显不大，但我们得到了‘优先购买权’，就

是说如果范岁久改了主意，那么他首先会联系酿酒厂。

我认为这次会谈的结果并不理想，但不能否认这是令人愉快的一天。我认识了这位很有魅力的中国人，知道了他为什么来到丹麦，为什么留在了纽堡，他怎样开始春卷生产，以及他如何组织销售。我感觉范岁久身上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他的革新能力，这不仅仅指生产过程中的革新，更主要的是他直觉到了产品开发的重要意义，而且在开发的同时注重质量。

接下来的好几年里我没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突然有一天我收到范岁久的一封信，说公司经营状况非常好，问我是否愿意进入大龙的董事会。我认真地权衡着这件事，也去征询了酿酒厂董事会的意见。考虑到一旦大龙公司要被出售，酿酒厂就可第一时间买下，董事会便认可了我的决定。

几年之后，大龙公司很显然不会被出售，范岁久的儿子汉明准备接班。

我渐渐喜欢上了这个企业，尤其喜欢与范岁久共事。许多人描述了范岁久这个人，讲了很多他的好品性。在这里我只想提一件事，就是几年前我们一起去中国出差，范岁久尽管不认同政府的某些做法，但仍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为中国的发展感到骄傲。虽然上了年纪，他仍不知疲倦地向我介绍沿途的风景以及他孩提时旧上海的模样。他的叙述娓娓动听，他的知识非常渊博，他是我所接触过的最积极乐观和慷慨大方的人。”

范岁久对一九七七年这一年度的状况很不满意。在一封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八日寄给外甥女丽丽的信中，他写道：

“最近一直为工厂的事情忙碌，心情很不好。这几年，西欧一直受通货膨胀的影响，通胀以每年15%的幅度递增，你恐怕想象不到，商品价格竟涨了700%。自去年石油上涨后，许多工厂倒闭，失业人数增多。幸亏工人的工资由政府负担补贴，失业后仍可领到90%的生活费……”



| 做春卷馅用的豆芽。

范岁久自己也承受了大龙危机的后果，前首席财务官汉斯·纽兰德斯特德叙述道：

“范岁久绝不是一个吝啬的人，但他非常节俭。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大龙出现经济问题之后，他从一幢大别墅搬到了位于纽堡集市广场的一套简朴的公寓。公寓中暖气不足，冬天里他常常每晚洗三四次热水澡来保暖。

除了曾经在伦敦买过两件柏帛丽大衣外，他很少把钱花在买衣服上。总见他穿这两件大衣中的一件，没见他穿过另外一件，他说要把身上那件穿破再换新的。

范岁久在工厂有间大办公室，办公室有扇门通往厂房大厅。我有一间带写字台和柜子的小办公室，与簿记室相连。范岁久不喜欢独自坐在办公室里，他更愿意和簿记室的女孩子们聊天。于是范岁久对我说，我开会的时候一定需要个大点的地方——就这样我们调换了办公室。乘火车去哥本哈根时，范岁久一般都坐区间火车的旅游座位，这样就省下了订座的钱。”

这一点范岁久很像他的父亲。当初在上海和杭州之间往来时，袁仲符也总买便宜的火车票。

接下来的几年里，部分生产实现了自动化。一九七七年，厂里有了第一台春卷皮机，机器取代了人工包春卷，八十四个工人不得不被解雇。企业需要利用丹麦灵活的保障机制来保证生产，维持员工人数和生产需要之间的平衡。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范岁久就和张作和合作。一九六八年他们一起买下了上海餐馆，一九七三年张作和把自己所持的一半大龙股份卖给了范岁久。一九七八年两人商定，范岁久继续做大龙的领导，而

张作和则接手了上海餐馆，这意味着他们之间的经济伙伴关系正式结束。他们的合作关系在最初那些年里对双方都有着极大的好处，然而随着大龙日渐成长壮大，公司需要更有效的领导层和组织结构。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眼下公司的前景并不乐观。在一九七八年圣诞节前夕给丽丽的信中，范岁久写道：

“正值严冬，大雪纷飞，元旦即将来临，恭祝你阖家新年快乐！今年是欧洲最不景气的一年，经济停滞，失业率上升，经济困难，政府不得不补贴失业人员的生活费用，我的工厂去年情况不好，希望今年能有好转。”

一次访谈

大龙公司在菲英岛上建厂十周年之际，范岁久接受了纽堡当地报纸的采访。范不是一个健谈的人，在这次简短的采访中，他概述了一些自己的人生观，谈到了一些对历史的看法。

记 者：你研究过许多历史，也包括丹麦的历史吗？

范岁久：我们应当在历史中寻找真相。丹麦人民一直被征以重税，还得为战争埋单。在弗雷德里克七世和立宪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记 者：你深知丹麦历史，还有世界史，作为丹麦人我们感到很惭愧。

范岁久：历史是不断重演的，以史为鉴嘛，越了解历史，我们看得就越明白。这地球上总是有一些地方发生着战争，这样的情形无疑会继续下去。

记 者：丛林法则吗？

范岁久：是啊，聪明人总是想去愚弄不怎么聪明的人，强者总希望战胜弱者！

记 者：接下来，我们可否谈谈你最喜欢的人之一，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和他的理论？

范岁久：达尔文认为自然界中存在极多的剩余生命，同一物种中的一些个体身上显示出一定程度的遗传变异，使得这些个体比其他没有变异的个体更适应于生存竞争，而那些不能适应的个体就会灭绝。

记 者：人生来平等，你认为是这样吗？

范岁久：是这样。不过，正如英国工厂主、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所说的，有些人做得更好些。越来越多的人肯定他的这个说法。

记 者：大家都知道你已经六十九岁了，但你看上去好像只有五十岁。我们的许多读者都想知道你保持青春的“秘方”？

范岁久：哦，这很简单，首先人应当知道自己的局限，不要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其次，要保持积极活跃的生活态度，稍稍做些运动，比如打打羽毛球。再有就是精神生活要丰富，没事的时候我喜欢听听贝多芬、莫扎特，尤其是巴赫的音乐。

除了他所提到的这些因素，范岁久长寿的原因还包括丰富广泛的社交生活、诚信以待的朋友圈子、营养的膳食、在咖啡馆里的舒适时光，以及与异性的良好关系，这些就是他的长寿秘方，正如他的名字所预示的。



■ 大龙公司里范岁久的办公室。摄于二〇〇〇年。

范岁久基金会

一九八二年，范岁久成立了基金会，其目的是支持大龙企业和资助中国留学生，让他们在丹麦完成学业从而报效祖国，而这也正是范岁久初来丹麦的目的。基金会原名叫“大龙基金会”，二〇〇三年范岁久去世后更名为“范岁久基金会”。今天，基金会继续资助旅丹的中国留学生。随着中国的飞速发展，中国留学生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得到来自国内

的资助，因此，基金会开始将重心转向支持丹中文化交流，赞助丹麦学生赴中国的短期游学，并赞助丹麦国内推广中国文化的活动。基金会现有资金约九千万克朗，约合一百五十万美元。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龙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出口市场情况一片大好，而丹麦的国内市场则僵滞不前。大龙试着开发酥皮蔬菜，一九七九年这个新产品为公司带来两百三十万的赢利，从而缓和了局面。至于更大的进展，此刻还未到来。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一年间，哥本哈根的中国咖啡馆被卖掉。这之后企业才在丹麦国内和欧洲市场上迎来了不错的进展。

一九八二年四月，范岁久写信给外甥女丽丽，在信中他比往常更明朗地表达了自己对大龙领导层以及各种相关问题的看法：

“.....”

我生性不喜往返奔波，尤其是长途旅行。你来信问道，我何时携家眷回国，我恐怕近期无法成行。眼下手头吃紧，世界经济不景气，有心积蓄也还需时日。你们不了解此处情形，纸上是说不清的。

今冬甚是寒冷，我受了风寒，整天头晕，血压又高。椿一弟去世之时，我正卧病在床，只能托你带去我的哀悼。经过两个多月的休养，我已恢复健康，唯缺少运动，比以前胖了些。

我领导着一个食品厂，肩上负有重任，工作很忙，有很多劳心费脑的事情。不但要让一百二十多名员工有饭吃，还要让他们吃好这碗饭，这真不是件易事。丹麦贫富平均，钱多的人要养钱少的人，生活水平要平等，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都奉行‘食物为先，赤字其后’的原则。我出外公干，吃、住、交通都要有票据，没有票据的花销就得自己承担。税务局对账目管得很严。前年小儿汉明为本厂办事，去了一趟美国，税务局坚持要

我个人承担他的旅费，原因就在于我和他之间有这层父子关系。

我必须得承认，丹麦的社会福利办得很好，譬如看病或住院均是免费，另外人们还有养老金，高达百分之九十的普通工薪者享有失业救济保障，即使是非工会会员也能享受社会援助。丹麦总人口约五百万，而失业的就有三十万，政府花销很大。不过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的钱来自老百姓缴的税。

六年前随着工厂搬迁，我由丹京搬家到纽堡，家里人不愿同来。那时工厂濒临倒闭，正是要紧关头，我顾不得艰苦，独自生活，经管工厂。多亏全体同仁努力工作，现工厂情况转好，一切稳定。我眼下正在考虑继承人选。汉明二十六岁了，明年将从商学院毕业，现在航空公司任事，他有意来厂里做事。这关乎工厂未来，待秋季再作裁决。

.....
今天是西洋清明节^①，是个宗教性质的假期。正逢大雪，交通受阻。”

一年后，一九八三年五月，他写了一封信，信中第一次表达了搬回中国居住的想法：“我了解到祖国现在情况很好，政策重心放在了稳定、统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人们努力生产，这都让我们这些海外华侨感到自豪。如果这样的形势持续下去，我或可归国安居。待秋季去杭州时面谈。我身体健康勿念，只是工作太忙。偶有闲暇还得料理花园，一年四季都得照料。我很喜爱兰花，香气馥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大龙在英国市场的发展相当可观，年销售三千五百万个春卷，为在英格兰建立独立生产厂家创造了契机。工厂于一九八四年在纽阿克开张。

大龙这些年的发展背后，潜藏着一种企业家精神。汉斯·纽兰德

^①复活节。



一九八六年，大龙公司被授予弗雷德里克奖。图为范岁久与亨利克亲王。亨利克亲王曾于一九九三年莅临大龙公司。

斯特德写道：“我一九七九年进大龙工作。那时还在用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七年安装的四台包春卷机生产每只一百克的春卷，这些机器运转不错。但那些一百五十克每只的快餐春卷却仍然是人工包出来的，这让范很烦恼。他认为这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细菌学上的问题。他想方设法弄来了新设备用以生产每只一百五十克的春卷。

一九八一年又弄了两台包春卷机。在机器设备更新换代方面，范岁久总是走在最前面。不过，港口罢工和运费上涨给丹麦出口带来了巨大的麻烦，纽堡厂里也面临着空间紧缩的问题。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英国市场上大龙的销售量直线上升，英格兰的工资支出成本也相当低。

范岁久想在英格兰建厂，去那里考察了好几家废弃工厂。他坚持要先买断一块空地皮，然后按照丹麦的厂房标准在这块地上盖起一套全新的厂房——丹麦的规定标准要比英国的严格得多。一九八二年十月份董事会成员去纽阿克的时候买下了这块地，他们还从丹麦和瑞典分别订购了包春卷机和回旋冰冻机。这期间纽堡的生产能力达到了极限。位于鲁德库秉的世博菲英的厂房被关闭了，范岁久闻讯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决定租下这些厂房（因为有优先权）。大龙马上开始改建鲁德库秉的厂房，原本为英国的工厂订购的机器被要求提前交货，运来安装在了鲁德库秉的厂房里。范岁久非常积极地推进鲁德库秉项目，他要确保新厂房在质量和卫生上绝对过硬，不能有丝毫怠慢。一九八三年三月二日，工厂开工了。给纽阿克厂配备的新机器马上被重新订购。一九八三年十二月，英格兰的工厂开始了生产。”

范岁久的小儿子汉明负责管理英格兰纽阿克的工厂。汉明毕业于哥本哈根商学院，拥有商学硕士学位（cand.merc.）。纽阿克新工厂生产的产品提高了大龙公司的年产量，满足了丹麦市场和其他市场，尤其是德国市场的需求。

在建英国工厂的同时，范岁久也在考虑进军美国市场，但这次没有

取得同样的成功。汉斯·纽兰德斯特德叙述说：

“范岁久希望在纽堡一个废弃的乳品场建造一家专门生产豆芽的工厂。一九八四年工厂建成了，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豆芽工厂，一个有着绝对最佳卫生条件的全自动控制的工厂，这是范岁久的骄傲。

作为一个中国人，范岁久希望在美国开一家大龙的分公司。于是，大龙与另外三家丹麦工厂，还有一名愿意移民到加州的大龙女销售经理，共同尝试在旧金山地区设立一家销售公司。然而，不幸的是，另外三家丹麦工厂因为各种原因退出了，大龙的经理们和汉明建议放弃该计划，但是范岁久不愿意丢面子，于一九八五年成立了大龙食品（美国）有限公司（Daloon Foods〈USA〉Inc.），那名女销售经理成为大龙在美国的唯一一名职员，董事会则由范岁久、首席执行官安德里阿斯·尼尔森（Andreas Nielsen）、范汉明和我组成。美国市场上到处都是当地华人生产的春卷，而美元兑换率则从十二克朗迅速下降，一九八六年我们不得不艰难而痛苦地说服范岁久关闭在美国的公司。”

一九八五年是三喜临门的一年，这是范岁久来丹麦的第五十个年头，大龙公司成立二十五周年，也是公司搬到纽堡的第十五年。此外还有令人高兴的事，那就是在英格兰和鲁德库秉的新工厂运转情况很好。一九六〇年大龙刚成立的时候，春卷的年产量只有五万五千个，到了一九八五年，春卷的年产量已达七千五百万个，产值从差不多五万克朗增长到一亿六千二百万克朗。大龙的成功得益于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简化日常烹饪，愿意购买熟食和冷冻食品，这类产品的销售量随之上升。生产方便、健康、美味的食品正是大龙的优势。

一九八六年十月，范岁久在给丽丽的信中写道：“……几年前我与国内的食品行业取得联系，之后事情骤然增多，很多事来不及处理，再加上厂里的事情，每天都很忙，有时感到自己在为人做嫁衣，但如果搭



一九八九年的范岁久。

建友谊和良好关系非常重要的事，我愿意牺牲一点个人利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大龙在丹麦销售了两千三百二十万个春卷，这意味着鲁德库秉的工厂可以投资引进新的设备。一九九二年大龙在德国的销量增幅很快，由于有麦当劳和阿尔蒂这两个大客户，德国市场占据了大龙百分之四十的销售量。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情况发生了变化，德国市场的需求量退减，大龙不得不进行一系列调整，这显示出依赖一两个大客户是多么的危险。

范岁久对自己的企业非常满意，企业取得的巨大成功和获得的认可让他倍感欣喜。大龙因其高质量的产品和出口创汇能力荣获了很多奖项。员工数量从一九九一年的两百三十五人增加到一九九五年的两百八十四人，产品销量从十三点九吨增长到十六点八吨，产值从两亿八千六百六十万克朗增长到三亿三千七百八十万克朗，资本净值从一亿三千四百万克朗增长到一亿七千万克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大龙是一家地位稳固、财务状况良好的公司。

一九九二年，范岁久把企业的领导权交给了他的小儿子汉明，但他无法只是赋闲在家，他仍像往常一样每天去公司，看看这个他亲手建立的以产品质量、领导素质和人性化工作环境为原则的企业。

一九九五年是范岁久在丹麦的第六十个年头，这些年来范一直支持着丹中协会的工作。丹中协会用中文发表了一段文字来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在这段文字中当地华侨和一些朋友表达了对范岁久的问候。编辑徐沅潮这样描述范岁久：“他酷爱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写一手颜体书法，对唐诗宋词背诵如流。他喜爱读书，知识广博，卧室的书架上摆满了中国的史书和名人传记。每读一部好书，便爱不释手阅至深夜。读到中国历史上国家遭受列强凌辱，宫廷腐败，民不聊生时，不禁掩卷长叹，不忍卒读。”



通过电视广告，范岁久获得巨大成功。

除了以上爱好，范岁久还很喜欢足球、鲜花和大型轿车。梅赛德斯500一直是他钟爱的汽车。每年收到的三百多张圣诞卡片也是一种喜悦。当然，一年一年下来，要亲自回复这些明信片也是件很累的事。

大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为了知名品牌。一九九六年，范岁久在电视上的一则广告显示了他的影响力，使大龙食品上了家家户户的餐桌。在这则一分钟的电视广告里，范讲述了自己的童年和有关春卷的故事，加上他使用的“佳肴置腹 (ligger godt i maven)”这一说法，都让这则广告引起了轰动。片中那条龙说出的“大——龙 (Daloo-oo-o-n)”成为全丹麦家喻户晓的广告词，听得太多几乎都令人头疼了。广告里的范岁久就是他平常的样子，而正如在其他场合里范岁久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平常状态正是他的最佳状态。成功的广告效应为大龙公司带来广泛关注，订单像雪花一样飘来，大龙一时间措手不及，以至于无法满足订货要求。

“我身体仍然很好，充满了精力，”一九九八年范岁久在给丽丽的信中这样写道。范岁久一直保持着健康的体魄，直到生命的最后。

范岁久于二〇〇三年去世，享年九十岁。同年，他的企业创造了又一个业绩高峰。然而在之后的若干年里，这样的高度无法保持。食品市场受到行情变化的严重影响，市场上出现了许多竞争者，而春卷这个产品也早已失去了最初的新鲜感。每只春卷上得来的利润不大，所以重中之重就是要在保持产量的同时降低生产成本。大龙近几年来走得并不顺利，利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春卷这个主打产品，即便如此，大龙在春卷的销售价格上、生产成本上都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要让春卷这个产品继续保持下去，质量是关键，但要提高质量也就意味着要加大成本投入。企业经历了一段生产和技术上的调适过程，如今这个艰难的阶段已经过

范岁久肖像画，女画家张朵朵（音译）作品。在大龙基金会的赞助下她于一九九〇年来到丹麦。



去，大龙将重新走上发展之路。

大龙精神

范岁久领导企业的独特方式成了员工口中的“大龙精神”。汉斯·纽兰德斯特德发现，在许多事情上都能找到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

“根据东方传统，大龙一般不辞退好员工。在大龙，资历被看得很重。在办公室实习生的问题上，我和范产生了第一次大分歧。范认为实习结束后公司应该留下这些人，而我则认为他们该另谋他路。最终我们达成了一致：如果大龙确实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们可以把原来的实习生招回来。要是一个能干的员工离开企业另谋高就，范岁久会感到非常遗憾，把这看成是信任关系的断裂。范岁久认识而且记得厂里所有的员工，甚至常常想起这些人的子女。范岁久很关心那些处于弱势的员工，比如收发室的女工某天忽然有太多邮包要投递，他便会施以援手，帮忙贴邮票，帮忙开车去邮局送包裹，他将这些事视为理所当然。他常在厂里四处走动，人们对此也很欢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大龙经历的那段艰难时期里，员工们没有‘滑脚开溜’，以不旷工回报了他。员工对他意义重大，这一点也可以从范岁久基金会规章中看出来。基金会向深陷困境的员工或者他们的后代提供资助。大龙能成为菲英岛上最令人羡慕的工作场所，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客户和供应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那段艰难时期里也向范岁久展示了忠诚。客户们留了下来，供应商们则在信用预支等方面给予大龙极大的信任。尽管资本净值几乎为零，多数的大供应商都延长了信贷时间。作为回报，大龙信守协议。万一大龙做不到，那么在最后期限到达之前也可以联系供应商约定新的时间期限。一九八一年，大龙终于全额还清了来自DATSchaub的高信用额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纽堡厂

两场火灾的问题上，范岁久觉得大龙的保险公司‘新丹麦罗伊德（Nye Danske Lloyd，今天的Tryg）’真是待他不薄。后来无论别家保险公司提供的条件多么优厚，他都不愿意更改选择。

一九八二年为了在英格兰建厂，首席执行官安德里阿斯·尼尔森和我一起跟六家银行（丹麦的和英国的）开会，我们要寻找的是一家敢于承担风险的银行。大龙以前的合作银行不愿冒险，只有私人银行（Privatbanken，今天的Nordea）非常热心，他们信任这个企划、信任大龙公司（Daloon A/S），也信任大龙董事会。从此之后，私人银行就成了大龙集团的合作银行，范岁久从不更改这个决定。直到他去世，范岁久和大龙管理层每年都被邀请参加银行的年会。

我也见识过范岁久的果断。早年间有一次我们在我办公室里开会，当时的厂长拒绝趁暑假关厂的机会对厂房进行改进装修，于是这位厂长被要求在一小时之内离开大龙。

有时候范岁久也很怕发生正面冲突，尤其在最后的那些年里。如果他对厂里的一些情况不满意，通常他不会直接去找相关者面谈，比如并不直接去找工厂经理。相反，他会请另一个管理层成员或者另一个领导人和他一起去厂里，然后指出他不满意的地方，如此一来，他的意见就被传到该对此真正负责的人那里。每天范岁久都会来我办公室好几次，如果哪天他忽然不来了，我敢肯定，一定是我做了什么让他不满意的事，那我就得马上联络他，搞清楚到底是怎么了。”

一九八五年，大龙举办了二十五周年庆典，庆典书中前首席执行官安德里阿斯·尼尔森问道：“二〇〇〇年以后，大龙还能继续吗？回答是‘能’。”

安德里阿斯·尼尔森强调，大龙的三大支柱是生产发展、市场推广和高科技。大龙人要自信、求知、不畏惧危机、努力工作。只要有了这些品质，他认为，“我们一定能在二〇〇〇年、二〇一〇年、二〇二〇

年后作为独立的私人企业继续生存下去”。

安德里阿斯·尼尔森尤其强调了“我们奇妙的大龙精神和所有员工的热情”。他对这个企业充满信心，他认为，这是一家专注于自身所能的企业，是“金玉其质的团体”，这就是范岁久的创造，它已经发展成资产上百万美元的大企业。大龙精神深刻影响着企业，令企业赢得了许多荣誉，这些荣誉都应属于范岁久。企业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出了范岁久的品格，能让人走长走远的品格。

当然，如果市场的行情走势长期趋于另一个方向，大龙也许会面临诸多无奈。范岁久的企业算是熬过了二〇〇〇年，至于它能否在接下来的几个十年里继续生存发展，只有时间才能为我们揭晓答案，正如那位有远见卓识的中国人所说：“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范岁久用其毕生心血书写的企业童话是独一无二的，是真正丹麦式的。大龙跻身于丹麦企业之林，这些企业都发源于创业者的灵感，从无到有地被创立起来。范岁久的创业历程是一个关于努力和尝试的故事，尝试虽小却为今后发展大企业奠定了基础。在这个过程中，范岁久的各种品质融合为一体，共同起着作用。这些品质，有些来源于他的中国背景，有些则得自于丹麦教育。那些见过范岁久的人都觉得，他是个特别的人，是那些我们有幸认识的最聪明的、有吸引力的人之一。当年的民校校长和范岁久都认为，中国人和丹麦人并没有很大差别，也许他们是对的，毕竟大家都是人。然而，范岁久并非常人。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或是九十年代的某次谈话中，范岁久总结了自己的创业过程，并由此引发出他对“大龙精神”的看法。

“生活中，一个人要有运气，要敢于趁势向前迈进。但是，对于企业来说，成功的秘密则是合作。



在这幅丹麦地图中，一些对范岁久有着特别意义的地方被标示出来：首都哥本哈根（直至一九七〇年左右，他一直在这里学习居住）、赫尔辛格、考岭和阿斯寇夫（他在这里上民校并结交了许多朋友）、纽堡（大龙工厂坐落于此）和欧登斯（诗人安徒生的出生地）。

大龙规模适中，人数不多，我们大家相互都认识。野心勃勃、排斥他人在大龙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前一天你责骂了人，后一天你就得恢复友好的态度，得掌握这个平衡。

所有的大龙员工要真诚、热情。我们应亲如一家。”

资料文献

关于自己的生平，范岁久没有留下完整的文献资料，我们的主要依据是一九八五年出版的《大龙——二十五周年庆典——1968—1985 (*Daloon-25-års-jubilæum-1968—1985*)》和二〇〇一年出版的《龙的传说：大龙的故事和图片 (*Dragens fortælling, Daloon i ord og billede*)》。书中收录了他对自己生活经历和大龙的发展历程的叙述。

本书中的引用资料来自家族成员间的谈话和个人叙述，其中有很多是范岁久的私人信件，来自他的父亲、外甥女丽丽和其他亲友。关于袁仲符生平的主要资料来源是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家族书，书中有家人的中文叙述，也有英文翻译。丹中协会于一九九五年出版了（二〇〇一年再版）一本献给范岁久的书，书中的很多小文章也被引用。范曾经在不同的场合接受过报纸采访，详见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二日的《当地报纸》、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九日的《菲英地区报》（*Fyns Stiftstidende*）、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的《菲英州报》（*Fyns Amts avis*）、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的《日德兰邮报》（*Jyllands-Posten*）和二〇〇二年的《柏林时报》（*Berlingske Tidende*）。有关中国历史，我们主要依据John King Merle的著作 *China—a New History* (1998)。关于中国帝制废除后的经济发展和新兴精英群，资料主要来源于Marie—Claire Bergère的著作 *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1937* (1989)。有关浙江省的资料主要来源于R. Keith Schiappa的著作 *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Zhejian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1982)。关于在丹麦的中国移民，详见Mette Thunø的著作 *Chinese Migration to Denmark:Catering and Ethnicity* (博士论文1997)。关于上海的历史面貌，详见Christoper Bo Bramsen的Generaldirektøren Vilhelm Meyer—en dansk forretningsmands liv i Kina 1902—1935 (Gad 1993)。

附录一 袁仲符致亲家纪兰德书

此信的中文内容是由丹麦语原书中的丹麦文字再次翻译成汉语的。

原函如下：

吉藍達親家大鑒久恩修札奉候 起居以業務紛繁稽遲
 迄今殊歉昨由杭返申展閑 繡簾臨風環誦悱惻絲情溢于言
 表並稔 潭第安經無任欣慰 閣下前以不嫌輒生家境平寒更
 與小兒學識粗淺謬以 令媛字與小兒為從此秦晉聯姻播為中
 西佳話更望夫唱婦隨和聲常咏彼勤此儉門楣延祥弟與拙荆直寄以
 莫大之希望寫上月廿八日 令媛安產一女母子皆安尤為遙喜一切又要偏勞
 賢伉儷之 大神五哀殊覺不安小兒在母時承 閑拂誠令人謝不勝謝惟有
 留諸日後再行圖報 鴻雁得便尚希時錫 教言俾資 南針並望國
 際交通使早日正常恢復當冀迎賢伉儷遠歸敝國一遊兼圖面晤請
 潭經 聰弟袁仲符書于 五月廿七日
 親家太太均此不另

“吉藍達親家大鑒久恩修札奉候 起居以業務紛繁稽遲迄今殊歉昨由杭返申展閑 繡簾臨風环誦悱惻絲情溢于言表並稔 潭第安經無任幸慰 閣下前以不嫌輒生家境平寒更與小兒學識粗淺謬以 令愛字與小兒為從此秦晉聯姻播為中西佳話更望夫唱婦隨和聲常咏彼勤此儉門楣延祥弟與拙荆直寄以莫大之希望寫上月廿八日 令愛安產一女母子皆安尤為遙喜一切又要偏勞賢伉儷之六神五哀殊覺不安 小兒在母時承 閑拂誠令人謝不勝謝唯有留諸日后再行圖報 鴻雁得便尚希時錫 教言俾資 南針并望國際交通使早日正常恢復當冀迎賢伉儷遠歸敝國一游兼圖面晤請賜酒宴 聰弟袁仲符”

附录二 继母张启明致范岁久书

这并非原信中的文字，而是由丹麦语文本中的丹麦语再次转译成汉语，因为复印件边缘部分缺失，所以取用译文。原信复印件如下：

歲人
接六月八日欲空裏信如汝令袁安好可憐汝父已於此晨不適世嗚呼
傷哉全事主中接危電即弄喪歸來幸見最凶而告憐汝父為人
處一為人捨利人而今走此一路於主我等而告憐
近半年中多參觀之新舊樂件(紙糊保體真)及美觀立室閱半載及武城
前老賤情誼等問題尤以易天憂到精神廢折而痛苦極深不下山
走山東一百三十里事前苦向我善與諸親友說做人事時莫忘於此人
終於還是耽擱大家卷心功懿代為解釋暗中看管着但終無因事去之
請勿憂我病重三次至本二脉不浹死一鳴呼傳氣嗚呼痛哉
汝若聞此應轉空裏傷心不已父之恩情永難忘也勿失停言望汝以保家鄉
節哀烏龜君之恩汝勿忘年時易逝夫妻恩情難捨難忍海洋三
而愈多身痛之病生惡痛病不能坐但以汝又而有遠事之人負
此你須補一勞日康無此其收入(微)月入二至三錢月支袁庭經濟困難自不待
但家五口伙食尚能维持其他之用以及小錢上學醫藥及居處繕修差使高
薪虛度太家困難惟有大哀努力克服圖難矣
全人被家十年古所一頭生得這樣中治甚痛甚汗被寒氣入骨發冷微寒
人被寒全晝夜甚苦所有痛苦極甚大病蓋我身在奇物多不收得且
者嘗個性向甚懶惰所為及至今日自覺已過兩月之時甚多不及詳言此
立雪習牛牛上有遺草二句煩惱最向人全盡最苦人可見其之痛至
即在此意
汝父一生節儉身止一粒米皆用之不苟焉著魏主功名化錢少收
做古東廠辦事將校青龍山上關景仁老伯故考一例亦乞乞之故止地熱
羅二秀送我書以心再煩你徐付三色(田賦才考為封)區城
羅汝開此書聽君言以上一段將史事折多遇於悲傷望汝常宣
汝父在日每得汝書信及病生及少德相先必通利各親友始處古者並
如何如今作些生悲相見面一刻不空着想片着便寄說此事(歲久
嘗識吾家人生最痛事骨肉事往往有是而今日可至我沒有金面之希望)
以解我心灰意亂動半壁元空欲成行不果終不革印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卷的童话：大龙创立者范岁久传 / (丹) 塔姆著；
艾晰，肖卫华，京不特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213-05104-3

I. ①春… II. ①塔… ②艾… ③肖… ④京… III.
①范岁久 (1912~2003) —传记 IV. ①K835. 345. 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9413号

书名	春卷的童话
	——大龙创立者范岁久传
作者	[丹麦] 迪特列夫·塔姆 著 艾晰 肖卫华 京不特 译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0571) 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王芸
责任校对	戴文英
封面设计	王晓云 鞠磊
电脑制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980毫米 1/12
印张	12
字数	13万
版次	2012年9月第1版 · 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13-05104-3
定价	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